

[意]拉菲尔-欧利阿尼 李卡多-斯达亚诺◎著 邓京红◎译

“不死的中国人”

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
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书籍·定制

BOOK DESPOKE

百万本书籍应有尽有

淘宝店铺入口



PDF DOWNLOAD

您需求、我制作、自助下单【全网最低】

文献港查询, 部分阅读, 即可制件

400页以内的书是2元请拍2件;

500页以内的书是3元请拍3件;

需要几件就请亲拍下几件~

拍下·联系店主·书籍信息·24小时内回复·下载



728610292



songlianyan66

【文献港】<http://www.szdnnet.org.cn> (复制在浏览器中打开)

[意]拉菲尔-欧利阿尼 李卡多-斯达亚诺◎著 邓京红◎译

“不死的中国人”

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
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邓京红
知
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死的中国人”：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 (意) 欧利阿尼, (意) 斯达亚诺著; 邓京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97 - 2635 - 8

I. ①不… II. ①欧… ②斯… ③邓… III. ①华人 - 研究 - 意大利 IV. ①D634. 354.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4827 号

· 当代中国研究译丛 ·

“不死的中国人”

——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著 者 / [意] 拉菲尔 - 欧利阿尼 (Raffaele Oriani)
[意] 李卡多 - 斯达亚诺 (Riccardo Staglianò)
译 者 / 邓京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李 洋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单远举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4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20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635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1 - 508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个米兰的工匠把店铺转让给了中国人，他说：“1.5 亿里拉的现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数清楚，总共是 3000 张 5 万里拉的票子……感觉像是在电影里。”

白君毅，意大利华裔协会（Associna）的创建人：“我们逃税？说这话的人难道不知道，意大利在这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也许我们没遇到好的榜样……”

“仔细想想，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但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不过总之，中国人永远不死。”

吴（Salvio），工会组织 SiCiNa 的创建人：“头几次黑社会的人到店里索要保护费时，店主们假装听不懂意大利语。后来，为了把意图表示清楚，2005 年，他们烧了我们七间店铺。即便如此，我们没有低头，上千名中国人一起上街游行，要求加大力度维护治安。”

马泰拉（Matera）的华人企业主说：“如果我去投票，我肯定投给贝卢斯科尼。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是一个会干活会挣钱的人。他会让我们这样的企业主日子好过一些。可惜我没去投票，因为我没时间。”

威尼斯赌场的的一个中国玩家说：“一根手指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变成一只手就能让你随心所欲了。如果你没有关系，你就什么也不是。如果你不是手的一部分，你就是个死人。”

“对那些东方打工者的三部曲，我们也算了解清楚了：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

译者的话

自从1993年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读工程博士，我就与欧洲这个古老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1998年结束在大学的学术研究后，我进入企业界工作，十几年来奔波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投身于两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洪流之中，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为两国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做牵线搭桥的工作。

2010年底在博洛尼亚休假的时候，我去图书馆读书，被书名“*I CINESI NON MUOIONO MAI*”吸引住了，为什么叫“不死的中国人”？意大利人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好奇心使我翻开这本书，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本书是写给意大利人的，让他们了解生活在他们国家的中国人——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他们在意大利做生意，开工厂，改变着意大利。但意大利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很少，无知滋生出偏见和谣言，进而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关系。

作者是意大利最重要报纸的两名记者，他们从北到南贯穿整个亚平宁半岛，追踪中国移民的足迹，做了大量实地考察。这本

书收集了他们的采访和调查记录，包含大量信息，涉及中国移民在意大利从事的各行各业以及生活、教育、投资等方方面面，并且对意大利人自己的问题提出反思。

读完之后我有了翻译这本书的想法，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一下欧洲人的视角，至少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不带种族偏见的视角，了解一下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说法以及中国人在意大利的真实生活。

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能说稀少，但大多局限在历史和艺术的学术级别，虽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和渗透着，但两国人民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对方的名字，很少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也是从这本书里了解到许多不曾听说的事情。

在国内经常听到那些知名的民族工业巨头们谈“走出去”，没想到他们的欧洲据点有很多是在意大利，比如说中国远洋、海尔、华为、钱江摩托、中联重科，还有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手机公司 H3G。

国内的人们经常把出国当成发财致富的道路，以为只要出了国就进了天堂，为此宁愿负债甚至偷渡，这本书对偷渡者的艰辛生活有真实的描述。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中十个有九个是浙江人，福建人也在逐渐增多，很多都有非法移民的过去。中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在意大利移民种群中是比较低的，因此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他们除了能吃苦和勤俭节约的美德之外，还有赌博、偷税漏税、行贿走私、黑社会，等等。本书以数据为依据，以实地调查为佐证，将事实真相客观地展示给读者。

这本书涉及中国人在意大利从事的各行各业，在山区开采大理石的石匠、稻田里的除草工、垃圾处理厂的工人、沙发加工、皮革作坊、服装工厂、酒吧、餐馆、理发店、中国产品的批发生意，等等。

还有浙江人的民间信贷体系。

精神方面呢？有宗教。

还有意大利的工会组织带领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活动。

本书以特别的关注对中国移民的后裔“第二代”做了多方面的调查，例如中国孩子们在意大利学校里遇到的困难：家长们只顾忙着挣钱，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们，除了有成长的烦恼，还多了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把孩子寄养在意大利人家里，只有在这里，只有跟中国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移民请一个当地人做保姆。这样长大的中国“第二代”又是怎样的呢？

文化层次低，为生存不择手段，可以概括第一代中国移民，但欧洲人是通过他们来了解中国的，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中国形象的代表。

这本书的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不死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永远不死”，它是当地人之间有关中国人的众多谣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种说法还被写进了一本纪实性的畅销书，谎话说了千遍就要成真了，可惜的是很多西方人都相信它。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绝大多数时间是崇尚思想文化的，现在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管闷头发大财，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事实上，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尊重不是白给的，而是赢得的，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

前 言

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老龄化了。思绪到达终点的时候，会比出发时更加清晰，谈论罗马要从北京开始，本书基本上是这样写成的。出发的时候，我们想讲述我们国家的一个部分，那个神秘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群体，就是中国人。后来我们发现，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们自己。镜片反射的是我们这种类型，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身影。这些，在一开始，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看着他们更换城市，更换工作和改变生活；而我们只会更换手机，再就是算算在短短几年里，长了几公斤肉，多了多少皱纹。抛开尴尬，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他们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了解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弄清楚我们自己。

沿着意大利半岛从北到南，我们追随着那些有着巨大发展机

遇的地理轨迹。在库内奥（Cuneo）^①的山里，我们看到累弯了腰但赚到了钱的中国人，他们在加工古老的石材，这一行业曾被当地人判了死刑。韦尔切雷泽（Vercellese）^②的田野，自60年代以来，从没像现在这样拥挤和活跃。在小腿深的水里和像赤道地区一样的潮湿里，除杂草的中国人挑战着当地的纪录，却因工作不够多而感到恼怒。还有他们的跨国公司，在我们停滞的经济里，发现一系列的商业机会。他们拥有很多金钱同时又很谦虚，他们拯救了许多老字号。在勤劳的东北部，中国人与当地人有着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这让警惕的北方联盟无话可说。同样的世界语让南方认识了他们。在马泰拉（Matera）^③，当时沙发制造业开始显现衰败，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到来，肯定逃脱不了灭顶之灾。当地的工人排队下岗待业，他们却合伙开工厂。当米兰^④和普拉托（Prato）^⑤的某些地区开始荒芜时，它们就会很快变成中国城。他们先让卖给他们房子和商铺的那些人，赚了个心满意足；然后让那些不够机智而留下来的人牢骚满腹，发现新来的邻居是如此喧闹、勤奋和不同。

更不用说他们的孩子了：聪明到有些狡猾，礼貌到有些腼腆，在学校里经常比意大利的孩子学习好，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中帮父母干活。完全是另一种姿态。当我们的年轻人梦想着稳定的工作岗位时，他们则甚至会觉得受到冒犯，如果有人想为他们提供一个这样的工作。中国人拼命干活，拼命攒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②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③ 位于意大利南部，属于巴西利卡塔行政区。

④ 意大利重要的工业城市，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⑤ 位于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中间地带，亚平宁山脉西边，属于托斯卡纳行政区。

钱，直到决定退休的那一天才开始生活，也许回到可爱的中国，因此在这儿的移民很少是富人。在一个像我国一样有困难的国家，非常有理由发展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阴谋理论和广泛的社会嫉妒。人们说，他们非常封闭，不跟外界交往。即便如此，但老实说，你们试过接近他们了吗？跟我们交谈过的一个女孩抱怨说，在她开办房屋中介的两年时间里，隔壁的两个商店从来没有人跟她打过招呼。当然，他们不像南美人那样开心，不像摩洛哥人那样更像我们的堂兄弟，但指责他们也未免牵强。

如果只观察他们还不够，那就看看他们背后强大的祖国，每年刷新经济纪录，让你们感到更大的威胁。弄明白的唯一办法，就是走近了去看。这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和他们会面，和他们长谈，我们认识了他们的家庭，推测他们的亲戚网络。当然一开始，他们不会总是在你敲门的时候开门迎客。但在他们的客厅，我们喝的绿茶，比一个意大利人一辈子喝的都要多。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们检验了许多在出发的时候只能想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众人的传言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用来作为本书的标题，它几乎概括了所有我们关于他们的说法，因为对哪里没有认知，对哪里谣言就会四起。

最后，他们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坏良心”，有用的角色，但几乎没有好感。在追踪他们的过程中，我们试着获取他们最后的秘密，那就是保持年轻的秘方，我们意大利人似乎已经遗失很久了。这个秘方跟虎牌清凉油、姜药或蛇汤无关，它是一种偏执狂的生活，掺杂各种不同的才能，再加上巨大的牺牲精神。这道菜苦涩的余味，使人们不愿跟着学。但特别容易打动我们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那种乐观精神，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有强

烈的愿望。包括从遥远的浙江农村，出发时只有一个纸箱子；四十年后，带钱回去买下一座摩天大楼。他们把遇到的困难看做是一时的，就像身体有时会有头疼脑热一样，而不是瘟疫。如歌德所说，强者并不是那些从不跌倒的人，而是那些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人。在我们国家生活的中国人，几乎个个的膝盖都被磨破。只是这些内容就值得一读。但对于有耐心读下去的读者，还有更多其他的内容。有时候客人的活跃，只要不是无礼，是为了让主人明白，他客居的这个地方是多么美丽富饶，多么令人兴奋。在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的交流中，我们得到一些这样的感觉。因为这些，我们感谢他们。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 他们是谁，他们做什么，他们从哪里来

第 1 章 谎言和偏见

——对意大利人来说最具神秘色彩的东方移民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3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4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6

我们不理解他们？... 7

中国人永远不死？... 9

中国人死得很少... 11

第 2 章 愿望、饥饿和胆量

——群体的力量和顽强的执著

第一佐料：劳累... 14

“谁让你要那么做呢”... 16

来意大利的价格昂贵... 18

关系，抵挡次贷危机... 20

黄金婚礼... 21



- 比银行强多了... 23
- 对他们来说，意大利很小... 25
- 勇敢的失败... 27

第3章 他们从哪里来

——中国移民家乡的地理位置

- 浙江人... 30
- 熙熙攘攘的义乌，便宜商品的中心... 31
- 中国的地方主义者... 32
- 混乱的语言... 33
- 当开路先锋的省份... 35

第二部分

从阿尔卑斯山到马泰拉： 中国人的另一个意大利

第4章 中国人在西北，石材工业的新生

——幸亏中国人来到巴纽洛-皮埃蒙特，
当地这一传统工业才得以存活

- 巴尔杰和巴纽洛的奇迹... 39
- 露赛娜石材... 40
- 石匠是个苦差事... 42
- 老板和工人：四分的利益，一分的好感... 43
- 父亲出发了，孩子们跟过来... 45
- 年轻的企业主：400欧元的生活费，梦想着40万... 47
- 石头擦石头：收入增三倍，中介减半... 49
- Maurizio 和毛利... 51

第5章 没有中国人，就没有意大利的大米

——田里新来的除草工

- 除草工回来了，但他们是中国人... 53
- 从“一把野花”到猎捕河狸鼠... 55
- 少说了两个Z的水稻专家... 57
- 中国来的维内蓄稻米... 59

这些中国人是疯子... 61

第 6 章 米兰，意大利的中国首都

——萨勒匹路著名的中国城

在原先有阿尔法汽车厂的地方... 64

中国人也罢工... 65

中国人干的工作值更高工资... 66

萨勒匹有 90 岁... 68

庞大的批发生意... 70

从哪儿来的钱? ... 71

意大利人赚钱的好生意... 74

“在您这儿做流产要多少钱?” ... 77

年轻的中国犯罪团伙在壮大... 80

“不在萨勒匹，在伽里亚酒店见” ... 83

第 7 章 如果老板是中国人

——关系非常重要，这是做生意的秘方

海尔家电，一个无名的巨人... 87

中盛光电也在意大利... 88

那些逆向投资的企业... 89

董事会的孔夫子：不表现在面上的发号施令... 90

跟大海打交道的人，从痰盂到体育比赛... 92

“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地球人!” ... 94

特雷蒙蒂，中国龙和温驯的欧洲... 95

复活的贝纳利学说“你好” ... 96

第 8 章 中国人在赌场

——在绿色赌台上跟在工作中一样，从不疲劳，而且乐观

大家都去威尼斯... 99

穿运动鞋，玩 21 点... 100

什么时候心跳，由赌场主持人决定... 101

一个另类中国人的危险计划... 103

在赌场，总算有人欢迎我们... 105

别说话，由数字说话... 107

自设赌局... 109

第9章 普拉托，中国人最多的意大利城市

——艰难融合的故事

下雨了，中国贼... 111

皮斯托耶泽路，浙江某地... 112

多语种药店的全套服务... 114

工业协会的吉佩尔先生：从底层到宫殿... 116

当普拉托保持和平相处的时候……… 118

中国的中国人对抗意大利的中国人... 119

“税？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 121

意大利人，教逃税的“坏老师” ... 122

“利用未成年人？那只是儿女对父母的爱” ... 124

手会变紫的工厂，怀念“非典”时期... 125

“未来？只有忧伤，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 127

第10章 第二代的挑战

——班级里的前几名，长杏仁眼，取意大利名

中西餐之间的年轻华人... 130

首先，不同于父辈... 131

从阁楼到大学毕业... 132

非常优秀，可能太过优秀了... 133

一个全是数字和纪律的学校... 135

“请不要再捉弄我们了！” ... 136

人人为自己，得罪其他人... 137

等爸爸的时候，小小店主在长大... 139

“我们，是世界的脐带” ... 141

“我们永远有另一副面孔” ... 142

第11章 罗马，权力的剧场

——首都的生意人和其他成功的中国人

金王朝，从贝林贵到阿雷曼诺... 146

“从按摩师到进出口商，我们的社会阶层是这样划分的” ... 149

埃斯奎利诺的进口商，塔尖的中国人... 150

买和卖之间隔着海洋... 152

刘，佛罗伦萨心理学家的女朋友... 154

橘子花、多宝鱼和人头马... 157

在中国人的嘴里淘到金子的意大利人... 158

第 12 章 除了工作，还有宗教信仰

——福音派、天主教、耶和華见证派，还有佛教

艰苦生活和精神世界... 162

福音派信徒的多疑... 163

英的信条... 165

耶和華的大家庭... 166

通晓多种语言的耶和華见证派赢得市场... 168

不能容忍达赖喇嘛的佛教徒... 170

第 13 章 那不勒斯，雾中的码头

——宋先生的可疑行当和进出口生意

去中国，不需要护照... 172

“萨维亚诺在说什么？”... 173

仿造品，在传说和事实之间... 175

“海关硕鼠”... 176

“其他费用”疏通监管... 176

Gulliver 和码头生意... 178

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181

中国市场的贝卢斯科尼，其短暂兴衰... 182

中国人最恨的人，阿勒吉尼市场的老板... 184

我是吴，我来解决问题... 185

第 14 章 为中国人服务的那不勒斯保姆

——太多的活儿要做，孩子就由那不勒斯妈妈带大

颠倒的世界... 188

普玛柔拉西红柿酱的家... 190

玛努艾拉和萨拉，非亲非故的“小姐妹”... 191

法律无情... 192

“Lubetto”，嘎归洛家的复活节... 194

“在温州，他们把我当马可·波罗招待”... 196

样样都干的保姆，受命去中国... 198

他的意大利化？对妈妈不敬... 200

第 15 章 最后一站，马泰拉

——在合法和违法之间

- 中国人做的沙发：马泰拉的另一个纪录... 202
- “这里，我发誓，只有八小时一个班！”... 204
- 楼上的宿舍... 205
- 奢侈的橄榄油... 206
- “印度人”、工会和老板... 209
- “你们认识打印居留的人吗？”... 211
- “200 欧元？那不是贿赂，是伤人面子”... 212
- 原青田县长的兴衰... 213

第 16 章 他们，我们

——最后的面孔和启示

- 终点... 216
- 意大利的中国小姐... 219



第一部分

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
他们是谁，他们做什么，他们从哪里来





第 1 章

谎言和偏见

——对意大利人来说最具神秘色彩的东方移民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好时候了，老移民们对这一点十分肯定：他们比以前富裕了，子女比父辈生活更好了，那种“疯狂和绝望”地工作的时期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20 世纪）90 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友情。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每一个（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

张先生还清楚记得 90 年代初那些美好的时光。他取名卢卡（Luca），全家人都喜欢用意大利名。他曾经在姐姐的餐厅里刷盘子，妻子伊拉利亚（Ilaria）在米兰尽可能多地到处打扫楼梯，两个 3 岁和 4 岁的孩子整个下午自己待在家里：

“那些年真是可怕，如果没有我们的意大利邻居，我们根本熬不过来。”今天说起来，声音里还带着恐惧。

“我们在瓦格纳广场（Wagner）的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熬不过来。每天下午他们上楼，敲开我家的门，给孩子们端来热可可，帮助两个独自在家的小孩”。15年过去了，子女变成了三个：埃莉莎（Elisa）在大学里学经济，恩里克（Enrico）快高中毕业了，萨曼莎（Samantha）在准备考高中。

张家现如今生活在都灵^①，他们在巴利耶拉地区（Barriera di Milano）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经营一家女性内衣批发店，继续紧张地工作着，但和从前相比，就如同是在度假：

“整个星期天都是自己的自由时间，这还不够吗？”

总之一切都很好，除了意大利人。是的，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再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了，一栋楼里住着的老年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当住在楼上的先生敲门进来的时候，张家以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访问，没等他们递上咖啡，客人的问话使气氛变得凝重，可见时代的变迁：

“我在院子里捡到这块牛仔布，你们把缝纫机藏哪儿啦？”

想想90年代初那些邻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以前多好啊，不仅仅是在米兰的瓦格纳广场。万先生来意大利有27年了，头发花白，嘴角淡淡的一丝微笑，让人想起李安电影里的阴谋家。他是个企业家，据说很成功，当我们问起是否还记得刚来意大利时的情景，他毫不费力地如数家珍：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帕维亚（Pavia）^① 笼罩在雾中，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今天从安徽的丘陵来到波河流域^②，旅途不算短，近三十年前就更加遥远了，而且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

“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随便向一个路人寻求帮助，他就会把我带到要去的工厂。”

许多年过去了，万先生看到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开花结果，养大了三个孩子，而且孩子们难以回答哪种语言对他们更容易，意大利语还是中文。同时万先生也悲哀地看到，意大利人的待客态度在转变：

“今天，如果我去佛罗伦萨^③，询问去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的路，我没有语言障碍，但没有人会回答我。”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美好时光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淘金胜地快要变成社会和人类的陷阱了。生意还好，其他的都不好：

“去年4月份，”万先生说，“我到米兰的圣保罗（San Paolo）医院做胃镜。本来就紧张，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来了一名护士，用手指着我吼叫道：‘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上个星期你在萨勒匹路叫喊着对抗意大利，现在你到这儿来看病：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万先生住在米兰郊区，结交了许多意大利朋友，外出吃时喜欢托斯卡纳^④食品，萨勒匹路每个月只去一次，买点姜和粉丝。2007年4月12日，当一群中国商人跟米兰市政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② 波河是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起源于阿尔卑斯山，穿越意大利中部流入大海。

③ 位于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中间地带，亚平宁山脉西边，属于托斯卡纳行政区。

④ 托斯卡纳行政区的首府是佛罗伦萨。

时，他在别的地方做他自己的事情。但他的一双杏仁眼，足够点燃一个波河护士的怒火。万先生的胃镜总之是做了，但心情还没有好起来。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换句话说，昨天，中国人的劳累因同情而得到减缓；今天，中国人的成功因敌意而被损害。让我们来看看成功的状况：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Unioncamere）的统计，7个外国企业中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五年以154%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5个中国人中有1个自己创业。比如说普拉托的徐秋林：时装品牌吉佩尔（Giupel）的创始人，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Confindustria）的中国企业家。再比如年轻的张方瑞（音译），学会了石材加工工艺，但不再像他父亲那样在石头上累弯了腰，26岁就拥有了两个公司，在全意大利销售珍贵的巴纽洛-皮埃蒙特的露赛娜（Luserna）石材。但是，在中国也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

黑社会、仿造，直至米兰市中心堵塞人行道的手推车，所有这些都损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他们选择在此生活、工作和生儿育女的国家：

“非常遗憾！”毛强（音译）叹息道。

他是来自南京的电子工程师，住在布里安扎（Brianza）^①有20年了，已获得意大利国籍13年，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问他，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关系哪里不对劲时，他似乎后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悔拿了意大利护照：

“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好，工作上得到赏识，孩子们从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每次我打开报纸，总有一种感觉：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理解他们？

在意大利人眼里，那个逐年增大、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华人社会的群体，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神秘未知。在罗马^①，在普拉托或者米兰，他们在猪去鼠来的新年里挥狮舞龙，其余的时间似乎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总能让观察他们的人恼怒，咕哝咕哝，弄不明白。

在意大利的主要移民，特征一栏都有明确的标识：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指责他们暴力；吉卜赛人是偷窃；中国人主要是神秘。他们在自己的批发商铺的阴影里活动，消失在餐厅后厨和车间，干活，挣钱，他们没别的企图，但是他们有可怕的群体力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单个的中国人了，现在只有一群中国人：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队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用纸盒子和货柜车武装起来的“蚂蚁”，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但是所有的统计都显示，在给成年移民开设的意大利语课程中，中国人是最用功的。

^① 意大利首都，位于意大利中部，属于拉齐奥行政区。

《周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 记者戴维·兰德尔(David Randall) 写到过一个神奇的美籍总编，负责一个小报，专门刊登那些哗众取宠的消息。一次他听说有个大胖子，用自己的肥肉把儿子碾成了肉酱，兴奋的总编温和地请编辑核查一下消息来源。显然调查毫无结果，怎么办呢？那个故事是如此吸引人，怎么能丢掉这样一条荒诞无稽的消息呢？为言论自由着想，总编给这条荒谬的消息找到了解决方案：

“就写发生在玻利维亚，刊出！”

今天在意大利，几乎可以总结出这样一句话：

“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不可理解，不可接近，在我们国家的中国人，调制泡沫咖啡，制作匹萨饼，修剪发型，但是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带着距离，距离滋生猜疑的鬼怪。它使我们被假象迷住双眼，看不见事情的本质。今天在意大利合法居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有非法移民的过去，有数据为证：根据意大利社会福利机构(Caritas) 在2006年的调查，仅2002年的大赦就让华人增加了一半多，从6.2万人增加到9.7万人。

在意大利的所有外国移民，几乎都存在不同比例的非法移民，2002年中国人在主要的非法移民种群中排第六位，处于中等。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中国人经常干黑活，计件取酬，什么活儿都干，原因是：你别无选择，如果你身无分文而只有债务，为了穿越丝绸之路之路上重重边境而欠下的债务。有些指责更是无端谣传，说米兰的中餐厅，为一个小圈子的客户烹饪圣伯纳多小狗(San Bernardo)。但这样的消息却在全国主要的日报中得到广泛的流传，还加上恐怖的细节，如小狗通过互联网购买，然后在食客面前烹饪。这种消息一定会让戴维·兰德尔讲的那个总编垂涎欲滴。估计《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 会有些失望，米兰卫生保健机构

(Asl) 的技术人员这样回答：

“这就是那种地铁里的传闻，什么给客户烹饪狗特别是猫等等。但从来没有在检查餐馆的时候遇到过，甚至没有在厨房里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如相似的动物骨骼等，来对传闻进行印证。”

中国人永远不死？

到处都有中国人，可我们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从雾中浮现出什么，那就是令人担忧的、负面和怪异的传闻：不说我们的语言，只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什么都吃，或者，什么都做给我们吃。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中国人的神秘在挑战逻辑，在折磨大脑，在给优雅的餐桌撒下怀疑的种子：

“那是一个晚宴，什么都聊……”文燕陶窠（音译）对我们说。

她是金融专家，移民的女儿，穿梭于米兰、伦敦和上海。

“聊的时候大家很亲热，但实际上谁也不是朋友，开始还在说米兰，到哪里去玩，马上又转到这个假期做什么。通常我是一群人中唯一的中国人，在最后快喝咖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对我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向你问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

真是不可想象：在晚宴上向同桌的中国人问这种问题，那得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被该问题所迷惑，被报刊折页里的黑色新闻所恐吓，说的是存在一种在死者和生者之间交换护照的生意。

因此就问了这种问题。对于问题，中国人总会去回答。也许是对偏见已经习以为常，在意大利华裔协会的在线论坛上，年轻

一代华人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阐述观点，拿数据举证，统计死者及平均年龄，确认谁都有一死，同样适用于从地球另一端来的人。文燕陶窠那天无法在晚宴上深究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律师又接着说：

“仔细想想，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的葬礼……”

仔细想想，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不过总之，中国人永远不死。不知道为什么，在罗马的一号门墓园（Prima Porta）安息着两个姓林的，四个姓陈的，四个姓吴的，两个姓胡的……文燕陶窠的爷爷不在那儿：2000年因暴病去世，葬在米兰纪念墓园（Monumentale）。

“你们要写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不知你们是否晓得，据说他们永远不死。”

“谢谢您的直言，我们会注意的。”

当然了，我们也听说了。所有人都这么说，包括那些只在中餐馆遇到他们的人，在自己的企业里雇佣他们的人，每天早上走进教室跟他们打招呼的人，承认他们是慷慨租户的人，跟他们做成生意而改变了命运的人。开始是死人，然后是黑帮，接下来是狗肉：多多少少就是这些臆想出来的东西，构成大众对意大利华人的普遍认知。

再加上萨维亚诺（Roberto Saviano）写道：

“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

这是《那不勒斯的黑手党》（*Gomorra*）的引言，发行量超百万册的文化小说。第二代华人质问，为什么一本如此严肃和纪实的小说，在讲到中国人的时候，就满足于“据说”的水平。在意大利华裔协会的网站，伊德拉（Idra）的帖子静静地在那里说，

在那不勒斯^①，如果怀疑有人运送尸体，当局会进行深入的调查，同时声明：

“无论是我、我的亲戚、我的熟人、我熟人的熟人，都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真是奢望，那些谈论“中国人”的人，谁会记得伊德拉、她的亲戚、她的熟人，和她熟人的熟人？

中国人死得很少

“是的，但他们永远不死。”

没耐心的传言总是这样重复。在巴纽洛-皮埃蒙特^②，1月份一个周日的早上，当地的中国人被召集到佩丽扣剧场（Silvio Pellico）开会，告诉他们晚上骑自行车必须开着车灯，穿上反光背心：因为在几个月里，马路边撞死了三个人。还是在巴纽洛（Bagnolo），一个不幸的31岁的中国人，在威拉墓园（Villar）33号向人们微笑：2004年5月12日死于心肌梗死，人们还记得他的隆重葬礼，32只花圈，望不到尽头的车队，亲戚们把头伸出车窗拍下所有场景，风水先生专程从米兰赶来，确认他的人葬遵守天地力量的流向。

汉学家和社会学家科洛尼（Daniele Cologna），是意大利有关中国移民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经提到米兰市政府的一项调查，关于1997~2001年间埃及、菲律宾和中国移民的人口变化，测算出后两者的平均死亡率相同（0.6‰），埃及人稍高一点（0.8‰）。

“也就是说他们死得很少……”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南部与中部的衔接地带，属于坎帕尼亚行政区。

②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是的，本来就该如此：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在2006年的统计，意大利人的死亡率是9.9‰，外国人的死亡率是1.2‰，至少低8倍。国家统计局（Istat）在《2006年人口统计报告》里说：

“外国人的死亡率非常低，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意大利人年轻很多。”

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属于更年轻的部分，病人和老年人更愿意返回祖国。对于第一点，在合法居留的中国人中，超过60岁的占2%，而意大利全国平均超过20%。年龄越高差别越大：90个米兰人中有1个是中国人，但2000人中才有1个超过70岁的中国人，3000人中才有1个超过80岁的中国人。对于第二点，他们如果生病，第一代移民更愿意回国治疗，用中医，或者只是为了落叶归根，这是中国人最传统的说法，意思是：叶子落了要靠近树根。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传统也会被融合之风吹走，但目前还是如此：老年人离开这里。因此，死亡是有的，但比意大利人的标准要低。鲁国庆（音译）医生，住在瓦雷泽（Varese）省^①的加拉腊泰（Gallarate），他是心病科医生、植物药疗和针灸专家，他就此话题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

“对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谨慎的人生选择，只有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很多人在出发之前，都会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鲁医生在他三十年行医生涯中，给中国第一代移民看病，从没遇到过心脏缺陷或先天性疾病，这不会只是巧合吧。

“不幸的是现实。”黑格尔（Hegel）曾经对指责他和他不现实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实的神奇哲学体系的人如是说。

幸运的是众人的流言蜚语，为了哗众取宠，有时候会使用“中国人永远不死”这个传说。2006年春天，在都灵有一个中国人的隆重葬礼：林先生，新凤凰餐馆的大老板，在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第二天，多疑者动用言论自由：

“十八辆车没有一具尸体？”

简直是巨大的胡话，连莫林内特医院（Molinette）都出来辟谣，可怜的林几天前在该医院死去，但世界就是这样，当懒惰和想象力在纸面上相遇的时候：

“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11月份，监察员贝朗特（Piero Bellante），都灵警察局东方人犯罪科的权威专家，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的母亲因暴病去世：

“一份报纸的标题是《中国人也会死》。可以想象死者的儿子看后会怎么想。”

这位先生是个商人，融入了这里的社会，在这里也得到了—定的财富。也许他开始思考，是否选错了国家。



第 2 章

愿望、饥饿和胆量

——群体的力量和顽强的执著

第一佐料：劳累

当然，劳累本身并不是美德。如果我们是张家在都灵的邻居，当搞清楚在那个公寓里，没有人在以计件取酬的方式加工裤子，没有做那种损害国家工业的行为，我们应该回去敲门，聊聊一个家庭的历险经历。作为引子，我们先介绍一下意大利的中国移民的情况。尽管经历了这许多，他们存在于我们中间，也许将来他们就变成了以后的我们：（20 世纪）80 年代 2000 人，1996 年 3 万人，2000 年 6 万，今天 15 万，这只是合法居民的记录。几乎所有的人都从餐馆、店铺做起；每天 24 小时的生意，劳累，工作。

张家也是如此：

“1990 年我来到意大利，妻子留在国内。”卢卡说。

然后讲到他的妻子伊拉利亚，那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害怕在街上被人扭送去流产，躲在家里度过怀孕期，非常艰难。那个孩子就是恩里克，18 年之后，当父亲在尽主人之谊招待客人的时候，他快步经过，轻声跟客人打招呼，

像所有年龄在 15 岁至 20 岁之间的孩子一样。父亲接着说：

“生下孩子后，因为违反了规定，我们交了罚款，并且给医生送红包伪造绝育证明。生了二胎之后，在我们那里，要求必须有这个。”

恐惧，罚款，红包，作为故事的开场白。我们坐在客厅里，喝着绿茶，丈夫述说着，妻子在厨房里轻柔地做着家务，孩子们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商人的家完全是市民家庭的氛围，房子是用贷款买的，儿女们正在青春期。但张家确实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我们看来，他们就是中国人。如果不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跟他们交谈，而是在都灵萨沃纳（Savona）他们的内衣批发店里看到他们，会搞糊涂的，店里光秃秃的墙面，他们卖的便宜货物，跟意大利人、塞内加尔人或摩洛哥人的流动摊贩讨价还价，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卢卡 40 岁，黑瘦健康，富有好奇心，总是笑眯眯的；伊拉利亚是个漂亮女人，很难把她和一个快大学毕业的女儿联系在一起。他们工作，孩子们学习，一切都正常。但刮开表面会发现下面有些别的东西：

“想起我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商场的职员，工作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3 点……那真是天堂。”伊拉利亚叹息道，她重复说了不止一次。

先来意大利的是丈夫：是他姐姐叫他来的，在厨房里工作了几天，每天 13 个小时连续洗盘子，一个人，对周围一无所知，他明白了，叫他来并不是为了他。如果不是这上万公里的距离没法轻易改变主意：

“我姐姐给我付了来的机票，我不能叫她再给我付回中国的机票。”

这样，卢卡待了一年，适应了环境，洗了无数的盘子，决定

叫妻子和两个孩子来意大利：

“那时候我每月挣 60 万里拉（约合 310 欧元），光房租就要 40 万（约合 207 欧元），我和妻子两人马上明白了，我们做了件疯狂的事。但现在我们四个人，回去的机票就更贵了。”

那么只能加油干了：他日夜在厨房里工作，她在家里缝制领带，孩子们在身边跑来跑去，涂得到处都是，浪费不少时间。比疯子还要疯狂，可以用来形容张家：看到在家里干活，每天最多挣 1 万里拉（约合 5 欧元），伊拉利亚决定去别人家做清洁，每天下午，把两个 3 岁和 4 岁的孩子独自留在瓦格纳广场的家里：

“每每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你别走，我们害怕。’我能怎么办？如果我不出去挣钱，我们吃什么。”

“谁让你要那么做呢”

别无选择，张家到这儿是来干活的，为此他们付出一切代价。即便在心底知道，做出牺牲并非总是件好事，有些努力总之于事无补：

“就像打仗一样，”今天伊拉利亚回忆说，“而我们必须打拼。”

真正的战役是在张家夫妇的事业取得一个大跃进的时候：在意大利待了几年，他们明白了怎样运作，决定自己开业。1997 年他们在米兰市中心开了一家餐厅，在一对中国夫妇的眼里，获得一张一周七天营业的执照真是太棒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在张家的手里，它变成了一年 365 天营业，从早上 10 点到夜里 1 点，无论 8 月份还是圣诞节，无论元旦还是复活节。做的不多也不少，总之天天工作：

“后来生了老三萨曼莎，我们把她送回中国，在爷爷那儿待了两年，因为不能把她独自留在家里。”

1997年到2002年经营餐馆的这几年，父母和子女只有在晚饭的时候才能见上一面，自然是在餐馆里：

“快6点的时候，孩子们离开家，手牵手来到萨沃纳路（Via Savona），我们一起吃晚饭，吃完饭，他们回家，我们开始招待客人。”

这样过了五年，每天如此。三个孩子独自走在米兰的街道上，两个大人淹没在工作的海洋里：

“你们认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但其实在我们国家，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伊拉利亚着重指出。

看来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确实得到运气的偏爱。有些经济上的骤然升起，似乎很难解释。当他们买房子的时候，谁知道从哪儿来的钱，如果一家中国人能开商店，通常好奇者会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黑帮势力，另一派认为是国家的经济扩张计划。

米兰的一个工匠说：“相信我，这些人从他们政府那儿拿钱！”

另一个商人说：“很显然，这些人的商店得到犯罪团伙的资助。”

就算没有明确的观点，也会嘟囔一些怀疑：“谁知道是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

我们想搞明白，但我们先搜集作为中国人成功基础的第一手资料，任何形式最后都概括成：超常的、近乎病态极限的牺牲精神。

张家的故事是随便一个普通的故事，有个好的结局：他们卖掉了餐馆，买了家商店，现在工作少了，星期天可以跟朋友聊聊天，或到市中心散散步。而且在家庭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孩子们在学习，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唯一一次跟学校的摩擦，是那天校长带着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小气神情说：

“你们肯定吗？在高中班有个中国人？”

总之，都还好。伊拉利亚也还好，自从搬到都灵，她常去罗马路（Via Roma）的服装店买衣服，抱怨说：

“再也找不到不是中国制造的范思哲（Versace）或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了。”

卢卡也还好，回顾往事，他告诉我们说，现金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谁也不会卖一只劳力士表而接受支票付款。”

如果到他们家做客，在客厅里喝上一杯米酒，可以感觉到他们还在为过去的经历而颤抖：

“从来没有看过电影，从来没有放过假，没有一个小时跟孩子们在一起。这是不正常的。”

这就是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共同的故事，劳累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而他们的成功，经常留有这种不可救药的努力的余味。

来意大利的价格昂贵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幸运的从零开始。但很多人是从负数开始的。比如说惠芳（音译），在普拉托的一个制衣厂，每天工作15个小时：来这儿三个月了，当我们走进厂房看见她和其他工人的时候，她面色尴尬，不会一句意大利语，她的堂兄给我们解释道，受益于2007年的移民法案，他帮她办来意大利。为了答谢这个帮助，女孩要给亲戚——老板支付1.5万欧元，显然她没有钱：

“没问题，”他说，“我们是堂兄妹，只要她白干一年，债务就抵消了。”

债务？抵消？对于年轻的企业主来说没什么不好的，用她一年辛苦的劳动，换取他的一个签名和几欧元的印花税；当我们把这件事讲给一个在帕多瓦（Padova）^①的中国企业主听时，他证

^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属于威尼托行政区。

实，这种签字—欧元—劳动之间的交换，在意大利各地都是通行的惯例。改变的只是价格等细节：

“那个女孩付得算少的，因为帮她来的是她的堂兄，”帕多瓦的老板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亲戚关系，需要1.8万到2万欧元。”或者15~18个月的工作，一周干7天。

“20世纪90年代是2000万里拉（约合10329欧元），”米兰的一个中国朋友证实，“然后，价格也随着欧元的到来作了相应的调整，靠签证生意致富愈演愈烈。”

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不把高声宣布的国家边界当回事。

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1.5万欧元、负2万欧元，宁红（音译）甚至从负3万欧元开始。她30多岁，跟其他七名女孩一起住在热那亚（Genova）的一个阁楼上，晚上从阁楼望着城市的屋顶，一片大海和警察局的大楼，想着自己的债务。宁红和其他几个人在市中心的餐馆里工作，早晨有人8点、有人10点开始和面包饺子，晚上有人8点、有人10点再出现在厨房里，然后离开餐馆，脚步轻快地直奔家门。每天都是如此。对离家两步远的警察局望而生畏，担心总有一天，只需一掌就会把这一切击个粉碎：当警察们经过这里时，阁楼里的姑娘们屏住呼吸，紧靠墙壁，心里祈祷着非法移民的上帝。

跟绝大部分在意大利的中国人不同，宁红来自北方的辽宁省，在意大利没有亲戚，和她的7个同伴一样，是纯粹的非法移民，也就是说没有哪个企业主叫她过来：根据意大利法律，她不该出现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考虑她来自的省份、行程安排，以及偷渡组织者的胃口，一般价格会翻番：为了来到这个国家，宁红支付了3万欧元，这些钱用来打点北京那边的人，让一个出示伪造的瑞典签证的乘客，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还要打点巴黎这边，不能让人注意到，在斯德哥尔摩的市郊，没有一个叫 Charles De Gaulle 的地方。

到达法国后，宁红等着偷渡组织者的电话。手机是路标，在出发之后引导移民从边界、检查、海关、签证和机票的迷宫里走出来。要保持开机，总有信号，因为只要一次没有接通，蛇头就会切断一切联系。电话响了，宁红马上接听，那边给了她一个号码，让她到机场商店买一顶阿迪达斯的帽子，戴着它在商店门口等候。蛇头终于来了，对上号码，然后把她带到里昂车站（Gare de Lyon），在那里宁红上了一辆宽敞的TGV车，踏上了在意大利的居留之路：给一家纺织厂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

完美的服务，有保证的结果，昂贵的价格：3万欧元是个天文数字，宁红的一帮亲戚凑钱借给她的，指望她有一天成功后可以偿还。现在她已还了一半，再过几年她就可以开始为自己，以及为那些把她送到这个国家来发财的人工作了。希望她真的能够走运，现在她离开干了16个小时的厂房，回到热那亚的阁楼。也许和她的意大利男友在一起，两年里他一直在跟官僚机构作斗争，希望把这个吓坏了的东方偷渡客，变成开心的中国女朋友。

关系，抵挡次贷危机

惠芳和宁红今天爬的这个坡，是许多中国人多年来爬的同样的坡：

“现在有人干一年就行了，”梅斯特雷（Mestre）^①的一个小伙子说，“2001年的时候，在佛罗伦萨我干活的餐厅，办来意大利最低的价格，是洗三年的盘子，没有工资。”

价格在变化，移民在继续不断地涌入意大利，他们今天低头踩

^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属于威尼斯托行政区，是离威尼斯最近的陆地城市。

踏缝纫机，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可以开始真正地工作，并尝试自己创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如何从负三年，或负1万、2万、3万欧元，到几年后成为市中心酒吧老板的呢？

需要辛勤劳作，当然了。但是只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除了工作能力以外，中国人提高社会地位靠关系：

“一根手指能做什么？”威尼斯赌场的一个中国玩家问我们，“看，连个骰子也拿不起来。但变成一只手就能让你随心所欲了。”

手指，代表一个中国人，就跟不存在一样。如果没有关系，你就谁也不是；如果你不是手的一部分，你就是个死人。至少在意大利，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相比学识，更看重活动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需要建议、能力，尤其是金钱。如果没有最后这一项，中国人一开始都没有，需要有人借钱给你：这就有了一种地下信贷系统，似乎很原始，却完全免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一个由关系联结的网络——把单个的中国人联结在一个家庭、合伙人、同事和朋友的网络中——抵抗失败，因为是熟人之间的借贷，别想借钱不还。如果违约，惩罚就是将其逐出所有的经济活动，相当于文明死亡；或者成为一个“黑人”，失去人们的尊敬和信任。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坏名声，如同银行判定的“无偿还能力者”。

黄金婚礼

这是新东亚（音译）的一个重要日子，在米兰北部郊区设宴酬宾。新娘穿红色，新郎一身黑色，证婚人在十几张桌子间忙着敬酒，碰杯，高兴。有人已经开始算账了：

“我在这里参加的最近一场婚礼，来了106人。”都灵的一个朋友说。

“我当收银员，告诉你，收了4.6万欧元。”

佛罗伦萨联合会主席的女儿出嫁时，收到50万欧元。参加一个年轻朋友的婚礼至少得给400欧元，如果你是新郎的叔伯，你得出最多，然后是朋友和亲戚们无数的电话，试图了解婚礼收到了1000、1500、2000还是更多欧元。

一切都在进门处进行：客人到达，有人来拿外衣，有人引领座位，有人接纳给新人的红包。红包打开，由收银员保管，将客人姓名和金额记录在一个专门的册子上。然后客人收到两条香烟，作为家庭和团体的一员，今天付出，下次就会收获。婚礼是爱的节日。更是那个非正式的信贷网络的主要窗口，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中国人通过这个信贷网络周转资金，远早于银行和金融机构注意到他们。

不能总是负债，也不能总是持平：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国外，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总是不断地处于给予和被给予、借和贷的状态；婚礼只是一个高潮，但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我叔叔在韦尔巴尼亚（Verbania）^①刚开了一家餐馆，”普拉托的一个年轻企业主说道，“他投了20万欧元，我给了他1.6万。”

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都没有。下次该是别人来帮助我了，虽然还是让我父母打电话比较好些，因为……我还太年轻，没有资格去要钱。”

如果需要钱，年轻人就结婚。“我妈妈总是对我说，”米兰24岁的学生井（音译）笑着说，“我被你的堂兄弟们搞晕了，现在该轮到你让我们弄点收入了。”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比银行强多了

我们问米兰中国城的一个朋友，是否婚礼可以用来赞助开业。

“是否可以？”他一副惊讶的样子。

“是必须。”

因为中国人的家里非常简单，没有暖气，墙面光秃秃的，几件从家乡带来的纪念品，一个沙发，一个书架，不能缺少的平板电视，总是放在卫星频道 CCTV4。显然，朋友和亲戚们给的钱，不会用来买家里的东西：

“用婚礼的钱买房子，除非已经开了间酒吧。”

这一定律得到我们朋友的证实。其实很简单：我们意大利人只看见，突然变出 10 万欧元的现金，一个中国人却依靠 100 个朋友和亲戚，每人给他 1000 欧元。最近一圈的熟人不要利息，第二圈的要付点利息，第三圈经常就是高利贷了。

这样，餐馆得以转手，工匠的店铺变成了批发商店，酒吧招待也能成为服装厂的老板。一切都要感谢关系制造出的现金，有十几个朋友，经常比银行取款机还有效率。如果等着意大利银行……

“对中国人，银行几乎不给贷款。”服装厂的企业主王易群（音译）说。

“一年最多两万欧元。这点钱能做什么？”

关系这种机制使他们可以创业、发展、繁荣，但和所有的互助会系统一样，如有需要，必须出手帮助，不能拒绝：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保护网，但也是一个不可推卸的义务。”王先生继续说。

“比方说我是老板，有 20 名雇员，如果有一天我的一个工人

要自己创业，我要出资赞助。”

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两个月前，我的工头在巴里（Bari）^① 买了一个电器商店，我给了1.2万欧元。”

同样，张家夫妇在1997年开始经营米兰萨沃纳路的餐馆时：

“单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办起来的。”卢卡说。

“朋友和亲戚给我们赞助了1亿里拉（约合5.2万欧元），还有2500万里拉（约合1.3万欧元）用于装修。”

完全的信任，有保证的成功。显然，这样一种机制能够运转，必须是所有人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比银行强多了。”张先生确认。

“因为它是靠人情。在‘非典’时期，许多餐馆都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债台高筑，没有客户。如果告诉银行就会失去餐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帮一把：重要的是，借钱给你的人看到，你在全身心地投入。”

所以，每天工作15个小时，跟子女只能见上半小时，在晚饭的时候，在餐馆里。

中国人之间，更重要的是借出，而不是收回。

社会学家科洛尼说：“经常有人，刚刚还完来意大利欠的债，就开始借钱给别人。有人一个月挣900欧元，把自己的支出压缩到最低，借出500欧元开始培养网络，五六年后他就可以举手说：我要开家餐馆，需要10万欧元。”

欧元就像河水一样流过来，买地产、商店、加工厂，改变米兰的萨勒匹路、罗马的埃斯奎利诺（Esquilino）、梅斯特雷的但丁路（Via Dante）、普拉托的皮斯托耶泽路（Via Pistoiese）、

^① 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南部，属于普利亚行政区。

德里亚斯特 (Trieste)^① 的波尔沟 - 德勒夏诺 (Borgo Teresiano)、那不勒斯的都凯斯卡 (Duchesca)、马泰拉的帕依普 (Paip), 使之成为中国城, 他们还在这些地方建立新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效的机制, 唯一不满的是债权人的子女, 因为他们已经“意大利化”了, 越来越不赞赏这种拿自家钱“公用”的做法:

“别跟我讲这事!” 米兰中国城的一个女孩生气地说。

“我父母借给一个好朋友 10 万欧元, 几个月后他关了商店,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能吗? 不是一个严密的机制吗?

“不可能!” 一个做了很多年的企业主反驳说。

不会有人不想还钱吗?

“不是, 是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他们来说, 意大利很小

至少在意大利, 确实很难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中国人到处都是, 攀上朋友和亲戚关系, 基本上就是一伙人。井 (音译) 生活在米兰, 当他如母亲所愿举办婚礼的时候, 至少有 150 位“意大利”亲戚要邀请:

“兄弟姊妹, 堂表叔侄等三十几人, 然后还有其他的。”

海 (音译) 现在住在梅斯特雷, 但他在意大利的头八年, 走了很多地方: 一年在博洛尼亚 (Bologna)^②, 两年在米兰, 然后在佩鲁贾 (Perugia)^③ 待了一年, 罗马四年。林建易 (音译) 的父母,

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是弗留利 - 威尼斯朱利行政区的首府。

②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 是艾米利亚 - 罗马涅行政区的首府。

③ 位于意大利中部, 是翁布里亚行政区的首府。

20年前跟四个兄弟姊妹合伙开的第一家餐馆在圣雷莫（Sanremo）^①；后来散伙各自开业，建易随父母转战克雷莫纳（Cremona）^②、罗马和玛丽亚诺-科门泽（Mariano Comense）^③。

第一代移民很难区分成罗马的、米兰的、那不勒斯的或普拉托的中国人，他们到处都去，根据个人需要和地区的大趋势。极强的流动性，使意大利的观察者们心神不定，似乎证实了那种说法，他们都一样，彼此可以互换。除了偏见，中国人的流动，也造成了一些具体后果。

“经常，他们的孩子刚开始练习语言并融入班级的时候，突然就走了。”在马宁（Manin）中学，人们对我们说。该中学位于罗马的埃斯奎利诺，中国人居住区。

“给他们做房贷和贷款，我总是很沉重，因为他们经常失踪，改变地址、城市和手机号码。”莱昂纳迪（Annalisa Leonardi）证实说。

她是学中文的，现在管理那不勒斯银行的外国人窗口。她的出现在三年内使波乔马力诺（Poggiomarino）分行的东方储户从10人变成700人，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他们严谨，准时，守规矩。但一旦失踪就难了：顺着朋友和亲戚的链条，现在即便是上千公里的距离，我也能找到他们了。不过，管理他们的财产确实有点累。”

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幅员辽阔的祖国，十几亿的人口，56个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意大利对他们来说很小，他们可以迅速地沿着半岛迁移，根据他们所感应到的、市场温度的微小变化，蜂拥而至或迅速撤离：最近几年，马泰拉成为那些替人制作沙发的中国人的重要目的地；普拉托开始萎缩，因为遭遇中国本土同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西南端，属于利古里亚行政区。

②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③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胞的强劲竞争。

“我跟我父母可能去德国。”一个带有清晰的托斯卡纳口音的小男孩对我们说。

而米兰现在处于一个微妙时期，市场饱和，跟市政府关系紧张，意大利人已经不能忍受。离开和到达地图上的城市、省或国家，就像盛满或倒空机会、事业和商机的容器：

“我姨妈 1988 年来到意大利。”并说。

“当齐奥赛斯库倒台的时候，她认为罗马尼亚肯定有机会，就去了那里，果真发了财。”

世界不大，意大利就更小了：陈明（音译），检察院和警察局出色的翻译，他认为很有可能米兰的布朗曼特路（Via Bramante）不能继续成为批发商在市中心的集散地；都灵的朱利奥 - 恺撒（Giulio Cesare）地区开始出现一排排汉字，现在还只是有些迹象，不久，这一中心交通干道将成为中国人开的商店、餐馆、酒吧、金融机构、理发店和洗衣店的天下。地理位置和商业的起起伏伏是常见的，但这次有些事情让人担心：通常，中国人的扩张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都灵，似乎推动力是单向的、强劲的，来自于遥远的地方——在中国银行的一个账户上，皮埃蒙特（Piemonte）首府的警察截获到一笔 1920 万欧元的汇款，收款人是一个借用名字的意大利人，用途是“在都灵及其周边地区购买房地产”。这次，当地的关系只能让位给一条比他们更大的大鱼。

勇敢的失败

他们灵活，随和，反应迅速。而我们已经做不来了。谁能想

象一个罗马人移居到特雷维索 (Treviso)^① 的卡萨阔巴 (Casacorba)?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他叫王易群，意大利语讲得极棒，在这个深入东北的地方，他有一个厂房，20 名工人，和六十几台缝纫机器，厂房总是大门敞开，一见面他就说：

“我们敞着大门干活，我的工厂是透明的，所有人都是合法的。”

王不是替谁都做加工：主要为阿玛尼 (Emporio Armani) 生产，仔细加工每个月 5000 ~ 10000 条牛仔裤，工人被分成不同的工序，分别负责锁眼、翻边、口袋等等。王 34 岁，十几年前他的生意曾经高速发展。然后他换了城市，换了合伙人和工作，从头开始。

易群跟他的兄弟们，在罗马曾经有一个特别的餐馆：

“大极了，生意特别好，每天要做三百份餐，周末甚至五六百份。然后媒体曝出中国的虾里面有种什么东西，几天后餐馆没人来了，周末也就十几位客人。”

等了几个月，看到情况没有好转，就把餐馆卖给意大利匹萨店了：

“我们花 5 亿里拉（约合 26 万欧元）买的，三年后 1 亿里拉（约合 5.2 万欧元）就卖了。好在我们刚把债务还清。”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曲折故事。但在困难中顽强的中国人体现出自己的优点：依靠关系和他们超常的应变能力，失败一年后，三兄弟在几千公里外重起炉灶：老大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Siviglia) 开酒吧，老二在特内里费岛 (Tenerife) 有个餐馆，易群在特雷维索开服装厂。七年里服装厂为他和家庭提供了一切，还能让他在晚上去威尼斯赌场：

^①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属于威尼托行政区。

“那是个好地方，但不要有奢望：我靠工厂赚钱，玩转盘只是来放松一下。”

跟所有的中国企业家一样，王先生时间很紧，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不避讳谈自己的事情。他说生意不好做：

“两年来工作量一样，但利润减半。”（事实上他告诉了我们具体数字。）

他证实，灵活性是中国工厂的秘诀：

“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下班时间。”（他还告诉我们连续工作的小时数，不是个小数字。）

他说他的秘诀就是效率和规范：

“我付出很多，不能因为一个非法移民而毁了我的事业。”（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感觉他是少数几个这么做的。）

我们问他，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乡们能如此灵活：

“很简单，行动就是了。”

我们想难住他，就说不稳定会影响孩子们的成长：

“孩子们会很快适应的，我侄子们的西班牙语说得棒极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意大利人不能像中国人那样迅速发展：

“因为我们有愿望、饥饿和胆量。”

王易群和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在世界的另一边经历曲折的生活，但最终达到目标。我们看到并且还将看到，这种坚定执著有它的消极一面。但评论之前最好先了解清楚。因为，如果了解了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自于哪个区域，就不会对他们标志性的能量和愿望感到奇怪了。

第 3 章

他们从哪里来

——中国移民家乡的地理位置

浙江人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中，十个有九个出生在浙江，中国的 34 个行政省之一，右边靠下，在上海的下面。

在中国的版图里，浙江是很小的一块。但它的面积（陆域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是意大利的 1/3，人口（4700 万）只比意大利少一点。西边是山，东边靠海，这样狭小的地理状况，使他们不得不看着外面，沿着水路跨越大海。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冷战时期，有可能成为美国进攻的登陆前沿，谁也不会对一个死靶子进行投资。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做生意，在国内和国外都是这样。”

温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马金龙（音译），对《新闻周刊》（*Newsweek*）讲道：

“（20 世纪）70 年代，当时只有很少的省份有点生意观念，而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感到挺自豪，但当时是天大的秘密，绝对不能说。

熙熙攘攘的义乌，便宜商品的中心

那种动物的谋生本能，得到中央政府的宽容，结出果实。邓小平的新时代开始之后，1979年重新给商人恢复名誉，浙江人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当国家成为世界的熔炉，这个地区成为一系列便宜商品的超级市场。义乌，坐落于浙江的中部，是顽强、固执、不知疲倦的典型，是一个由大市场发展成的城市，商业氛围是别处不可比拟的。

现在有5万家店铺，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但统计总是在变，每个月都要更新。美国人把它叫做“袜子城”，因为它每年卖30亿双袜子给沃尔玛、普林格（Pringle）和迪斯尼。这个杭州以南100公里的熙熙攘攘的热闹地方，对全世界批发商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里卖的商品，其特点就是便宜和最便宜。开始时引领成功的是扣子、短袖衫和饰品，这里是全中国主要的生产基地。现在扩展到流动商贩的全部产品，商品目录包罗万象，从印有圣人头像的电子日历，到蛇形火焰的打火机。

会做生意的浙江人，抓住了宏观经济的瞬间机遇。人口排第十一位，贸易量排第四。当许多地方还处于官僚主义的瘫痪状态，浙江约3/4的生产产品和一半的税收来自于私营企业。温州在1988年开办了共和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在这里，现在企业通过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地下信贷机制筹措资金，似乎有些古老，却可以免受像全球经济危机这样的影响。

中国的地方主义者

浙江商人出口到国外的，还有朋友一亲戚网络。但真正管用的，是一个比想象要小得多的范围。如果认为意大利人是地方主义者，相比起中国人就算不上什么了。说是浙江人，那只是个宽泛的定义，两个不同的地区，即便相隔十几公里，文化差距也足够引人注目。

第一个断层就是地理位置。相似则相近，来自同一个城镇、同一个村庄的人，叫做同乡，汉学家车卡纽（Antonella Ceccagno）在其《意大利的中国人》（*Cinese d'Italia*）一书中对此作了说明。在罗马，超过1/3的中国人来自青田地区，距离文城80公里——比米兰到皮亚琴察（Piacenza）^①稍远一点，比罗马到萨包迪亚（Saubaudia）海边又近一点，而米兰和普拉托的中国人却主要来自文城。这个距离甚至改变了政治倾向。比如青田有一种国家主义的传统，因为曾经出过历史名人陈诚——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即便在海外，这种倾向也没有减退。

第二个断层就是城乡差别。生活在大城市温州的人，认为除上海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乡下人。

“他们认为青田人是粗人。”《世界中国》月刊总编胡兰波这样说。

青田是一个艰苦不宜居的地方，9/10是山区。当地一些人的粗俗举止，在中国的城里人看来，是素质问题，而不是地貌造成的：

“他们说话声音很高，也许是因为他们那里总是刮风，风很大的缘故。”这位总编认为。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属于艾米利亚-罗马涅行政区。

在这个地区有些村庄，几乎全村都移民到了意大利。比如里临（Lilin，音译），1000 居民移走了 400 人。这些移民受教育程度很低。总编沮丧地说，她知道在他们中间不会有她的好读者：

“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 0.5% 的人是大学毕业。想想看，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受教育程度要高出 30 倍！”

但那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胡兰波讲到那里沸腾的地产市场，每平方米 2000 欧元。消费完全西化：

“许多移民回国销售意大利产品，人们富裕起来了，这些产品销路很好。有无数的酒吧，现在意大利咖啡（Illy）成了经典。”

混乱的语言

还有语言。浙江人各说各的语言。说是方言，但跟普通话的相似程度，就像葡萄牙语和英语跟意大利语的情况。试着想想看，晚上跟里斯本的警察对话该有多么可乐。

“事实上不存在唯一的浙江方言。”佩多内（Valentina Pedone）解释说。

她是罗马大学讲师，《中国近邻》（*Il vicino cinese*）一书的作者。

“各个村庄的方言非常不同。在这里的很多人，说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因为他们各自的方言，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好的地位。他们也不知道该叫什么，有时候冠以‘我家那里的说法’，或者否认自己的方言，而用温州话更体面一些。”

为了沟通的需要，共同的语言是普通话。所有人都听得懂，至少懂一点。

“但他们不一定说。”学者继续说。

“文字书写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讲，两个人话说不明白，可以写明白。但是文盲很多，这就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了。”

说说文燕陶窠父亲的故事，就知道我们没有夸张。她父亲是上海人，刚来米兰的时候，听到萨勒匹路的中国人说温州话，他一点也听不懂，以为是在讲……意大利语！

“在他的头几封信里，”文燕陶窠说，“给我们讲了这个可笑的混淆，他用学来的温州话跟意大利同事打招呼，非常失望，因为意大利人好像根本听不懂！”

浙江方言跟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让人好奇，而椿力（音译）对此深感自豪，他是米兰商学院（Bocconi）21岁的学生，9岁时来到意大利：

“我们就像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的电影《风语者》（*Wind Talkers*）里的纳瓦荷族人（Navajo）一样：在同越南打仗的时候，北京用我们这里的人进行通信，因为谁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那不勒斯税务稽查署的重要探员，科雷拉（Giosue Colella）上校，就像越南人一样搞不清混乱的浙江语言：

“在调查他们的生意，或者翻译监听电话的时候，很难找到翻译。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听懂不同人的语言。”

他们相差几十公里就彼此听不懂了，更别说我们在世界的另一边了。

因此也就不奇怪，离乡背井的中国人按照家乡结成联盟。这不是因为他们更忠实于家乡，或者某种无聊的意识形态，而纯粹是实用主义。例如，温州的一个餐馆老板更愿意雇佣同乡做服务员，因为新来的人经常要在雇主的家里生活一段时间。工作关系延伸到个人关系。在店里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已经很重要，更别说还要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当开路先锋的省份

皮素（Renata Pisu）在《中国，一条跃龙》（*Cina. Il drago rampante*）中写道：

“长江把中国分成两部分，北方居民严肃而谨慎，肤色较白，喜食面……南方人喜食米，肤色较黑，灵活温顺，讲无数的方言或语言。”

浙江是南方的一个地方。她顺应外向的天性扩大交流，发展商业和贸易。为了加快流动和提高效率，浙江人刚刚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大桥：36公里长，6个行车道，联结上海和位于东北部的宁波工业区。投资16.4亿美元似乎很合理，将距离从400公里缩短到120公里，使这个已经很发达的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涉及建造楼宇或基础设施的时候，没人不在乎开销，比如在省会杭州市中心建造一个七星级的酒店，一个超级豪华的酒店，在建筑师的设计里，它的形象整洁利落，非常具有标志性，属于迪拜帆船酒店（Burj Al Arab）那种玻璃和钢铁的结构。工程由广州的一个建筑公司承包，2008年年底动工，2011年应该完工，投资6亿美元。

“这么奢华，不是与我们社会传统的节俭精神相悖吗？”有市民问道。

对当地政府来说，改变当地居民勤俭的思维方式并不容易。不过有些人还是看好这个项目，认为它有助于他们的城市成为旅游目的地，而不仅仅是商业中心。

在等待这个变化的同时，浙江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开拓创新，改革市场，打破常规。1999年阿里巴巴成为全世界批发商的

电子商务平台，在那里可以找到从伟哥到飞机零部件的一切商品。

由于通货膨胀和竞争激烈，当地的企业主们开始把生产转移到西部，寻求更低廉的劳动成本。对中国人来说，节约是无止境的。继续向左边移动的结果，就是找到了非洲。像以前别人来找他们干活一样，哈桑鞋厂（Hassan）把工厂建到了尼日利亚。企业主王建平（音译）对《新闻周刊》说：

“我们在那儿有一个工厂，经营得非常好。”

这不是个别的例子。浙江的工业界认为：

“我们开始到国外建厂，浙江到哪里，其他省份过一段时间就会跟过来。”

是否真是这样，习近平最清楚。这位耀眼的政治领导人，54岁，脸颊饱满，喜欢乘公交车而不是贵宾车，2002年成为这个疯狂的东南部省份的管理者。

他的职位上升跟他家乡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样快。2006年9月，当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访问中国的时候，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习。他想了解，这个私营企业最多的省份其一把手做了些什么。有人注意到，习穿着难看的袜子，白色的短袜，跟未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相称。但义乌的批发商们大概能认出他们的便宜货。西方观察员认为，习是中共选择的第一位现代政治家。他的主要功绩，温州大学谢建（音译）教授写道，是“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使浙江的经济增长率，比全国已经非常惊人的增长率高出3个百分点。

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自于这里，他们是这种文化的正宗和骄傲的传承者，他们有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在我们的国家，用同样的手法行事，并不是偶然的，那种兼具狡猾、劳累和胆识的手法，正在改变他们自己的家乡。

第二部分

从阿尔卑斯山到马泰拉：
中国人的另一个意大利



第4章

中国人在西北，石材工业的新生

——幸亏中国人来到巴纽洛-皮埃蒙特，
当地这一传统工业才得以存活

巴尔杰和巴纽洛的奇迹

酒吧招待的背后，排列着意大利各省的经典商标：萨布卡茴香利口酒（Sambuca Molinari）、南瓜开胃酒（Rabarbaro Zucca）、罗马涅老妇人的白兰地（Vecchia Romagna）、美丽岛橘子酒（Mandarinetto Isolabella）……前面一个人勉强挤出笑容说“酒拌咖啡”，将将伸出手指，示意要什么样的酒跟咖啡配在一起。两个世界相遇，除了买卖需求，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在地图上方左边，蒙维索（Monviso）^① 下面，这次采访让我们看到，那里的移民以紧迫的节奏生活着，当地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些疯狂的人向前推进。

米兰，短短几年，中国商人就占领了一片靠近中心的古老城区；普拉托，在整个城市的嘟囔声中，裁剪和缝制服装的工匠们，跟当地企业默契合作；南边的马泰拉，杏仁眼的工人们挽救了当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地濒临衰退的经济。但中国移民的力量，在巴纽洛 - 皮埃蒙特（属于库内奥省）这样荒废的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行政长官马纳韦拉（Flavio Manavella）说：

“他们到这里来之前，在电视里都很少能见到中国人。”

巴纽洛除了靠近巴尔杰，另一个在山谷里的小镇子，同样也有中国工人，离其他一切都远：远离城市，远离高速公路，远离都灵、库内奥，甚至皮内罗洛（Pinerolo）。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这里有他们的工作机会：肯定是听了某个堂兄的建议，说有个朋友的弟弟，认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另外一种说法更玄乎，说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人，在米兰偶然发现，工人们在铺的石板，跟他家乡的一样。

继第一个人之后，来了许多人：他们在自己家乡就开凿花岗石，他们身体精瘦，全是肌肉和筋脉，硬碰硬地敲打露赛娜石头。辛勤工作，保证成功。但除了石头之外，还有学校，还有家、广场、酒吧、商店，星期天要穿上漂亮衣服，冬天的夜晚在家里做许多好吃的东西，如同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描写 20 世纪 60 年代在德国的土耳其和意大利移民：

“我们缺少人手，人就来了。”

在巴尔杰和巴纽洛，有近千名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那儿默默地辛勤工作着。但当我们问酒吧招待对他们的看法时，她摇着头说：

“顶多喝杯咖啡，其他的就好像根本不存在。”

露赛娜石材

从露赛娜 - 圣乔万尼（Luserna San Giovanni）到巴纽洛 - 皮埃蒙特，再深入到巴尔杰，一路上都听到敲击石头的声音。是中国

石匠在将巨大的层状片麻岩，官方名称露赛娜石材，敲碎用来铺垫半个欧洲的道路，或者加工成薄片。显然，据说他们非常封闭。为了接近他们，我们想，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雇佣他们的企业主。但似乎也没那么容易。我们请镇政府帮我们联系一个加工石材的企业。这就好比在里米尼（Rimini）^① 见一个游泳救生员，在锡耶纳（Siena）^② 找个地区盟友。总之不缺素材。但却没有成行：

“他们很审慎。”行政助理非常客气地对我们说。

我们试着自己找，看准了那个最大个儿的，一个巨大的采石矿和石材加工厂，厂房和露天堆场占据了六个足球场的面积，有五十几个中国人，手拿切割机和凿子在工作：

“早上好，能跟负责人谈一下吗？”

“对不起，在开会。”

可能吧。第二天我们再试：

“唉，还在开会。”

这么巧。等了两天，继续试。

“总是在开会。”

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想，我们把整个公司（的负责人）逼进了一间会议室，可能还是个很小的、没有窗户的会议室。

我们不再坚持，寻找另一条路。我们给矿工联合会打电话。在巴纽洛，该联合会就像别处的政党，工会和工业协会混合在一起：

“问题是我们的会员比较审慎……”

非常有意思，中国人封闭，意大利人全都特别审慎。过了一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属于艾米利亚-罗马涅行政区，海滨城市。

② 位于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中间地带，亚平宁山脉的西边，属于托斯卡纳行政区。

段时间总算传来好消息：

“找到了一个愿意见你们的人，给他打电话吧。”

石匠是个苦差事

第一句对我们说的话是：

“我将不承认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隐去姓和名，只需要知道，我们的企业主是个年轻人，随和，石材世家的传人，对行业有丰富的经验，看待事物的眼光比较温和，帮助我们了解石矿以及巴纽洛和中国人的关系。他的企业比较小，六名雇员按种族分工：五名中国人加工石材，意大利人开卡车，把5吨或10吨的大石块拉进来，再把5厘米或10厘米厚的石板拉出去。

以前不是这样：

“十几年前我们用两名当地人。后来工人退休了，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打算关门了。公司本来就小，谁也不会觉得缺了它不行。这时候开始有中国人来到这里：

“听说他们活儿干得很好，从不惹是生非，而且他们的生产效率是前所未有的。”

连早上好都不需要说：只要给他一把凿子，再给几句指点，这些刻苦不倦的工人们，从文城的山里跨越半个世界，来到皮埃蒙特的山区小镇，找好花岗石的纹理，持续不断地以规则的节奏敲凿石块。

对巴纽洛来说，这是个转折点。加利福尼亚和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的知识全球化，开启了硅谷和微机的未来；在这个皮

埃蒙特的山谷里，劳动全球化拯救了它的过去：

“说好不透露我的名字，对吧？中国人来这儿之前，我的企业一年营业额只有7000万里拉（约合3.6万欧元），现在超过100万欧元。”

面对这些数字，不用奇怪，石匠行业已经彻底换了人：

“说我们不给意大利人提供工作机会，我确实试过，来干了两天，第三天就因为腰痛歇在家里。连罗马尼亚人、摩洛哥人都干不了：这活儿只有中国人能干。”

总是在野外工作，这个古老的行业，经历几个世纪，却没有采取什么技术措施来减轻辛苦：冬天，在工作的地方放一只铁桶炉子；夏天，用伞稍微遮挡一点阳光的照射。

这些年生意做大了，但除了中国人之外，其他的都没变：

“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剪切机和打孔机带有吸尘器，以避免产生太多灰尘。但寒冷、酷热、噪音和辛苦一点儿没变。”

这是个苦差事，企业主的表情足以让人明白有多苦：

“所以不奇怪，一个人如果25岁，读了书，有其他出路，不会愿意干石匠这个活。这个活就像是职业运动，不是业余爱好，很快就学会但需要天天锻炼。”

如同体育运动一样，有冠军，有普通运动员，也有无能的人，薪酬也是不一样的：

“以前工人们拿工资。自从中国人来到这里之后，都变成计件制了。”

老板和工人：四分的利益，一分的好感

按照产量的多少，多劳多得，每天丈量加工石材的尺寸和重

量。在我们的企业家这里，每 100 公斤的“马赛克”或用于装饰墙壁及人行道的石板付 1 欧元；100 公斤用于铺路的方砖付 1.4 欧元；最大的石板每平方米付 7 欧元。收入最高的，一个月能挣 3700 欧元；一般的少个 800 ~ 1000 欧元（也就是挣 2700 ~ 2900 欧元）：

“这里很多工作都是黑活儿：供货商、企业主和工人。官方工资每月在 1300 ~ 1400 欧元。多拿的部分都不交税。”

活儿很累。但黑活儿能多挣两倍的钱。意大利人怎么会真的扔掉这样的工作机会，即便不当最好的石匠，每月也能挣个两三千欧元？

“我总是跟我们的年轻人说：去都灵当工人，每月挣个 900 欧元有什么意思？他们回答我说，没问题：反正请病假。”

当巴纽洛的年轻人有其他的——不知道是否是更好的——事情去做的时候，石材行业完全成为意大利老板和中国工人的局面：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80% 的利益，20% 的好感。他们管我叫头儿，当我请他们称呼我的名字时，他们回答说：不喜欢头儿？那就叫老板。”

从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是最好的雇员：

“从来不要滑头，从来没有找我预支工资，他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干活，他们只想挣钱。跟我一样。”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样的态度，在不断消减那 20% 的好感，增强 80% 的利益：

“毕竟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笑话我总是待在公司里，对我说：头儿你为什么干活？中国的头儿跟小姐消磨时间。”

意大利的头儿不工作的时候却跟我们消磨时间……当我们的企业家跟我们讲述，这些跨海而来的工人拯救了露赛娜石材行业的奇迹时，他的雇员们在不停地敲凿着石头：缓慢，准确，连续。

似乎是个和谐的队伍，但事实上却极不稳定：

“我换过至少 35 人。因为，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第二天他们就会辞职。”

除了那个“超级冠军”，在车厢里躲了一个半月才来到意大利，十年来一直以同样的节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不，应该是兄弟：是一个难得的人，他在巴纽洛买了房子，有三个孩子，肯定他不会让孩子们再干石材了。”

中国的肌肉，意大利的思维：虽然钱挣得多，但到了 50 岁就是偿还的时候，腰损坏，肺里堵满灰尘。这不是一个让自己孩子接班的工作。

有时候在星期天，老板和工人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萨卢佐（Saluzzo）的中餐馆——迎春餐馆（音译）吃饭。但在巴纽洛，从不，连一起喝点什么都没有：

“有一次，我几乎是胁迫他跟我一起吃饭，他难堪极了：整个晚上没敢抬眼皮，连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承诺再也不这样做了。”

因为在巴纽洛工作的中国人，宁愿假装生活在别的地方。在圣彼得广场（San Pietro）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七月初，整个城镇沉浸在娱乐之中，烧烤，游乐，跳舞和卡拉 OK：“有些小孩子会去玩，但从没见过家庭。如你所见，他们非常封闭。”不会像意大利人一样审慎吧。

父亲出发了，孩子们跟过来

虽然他们封闭，却给我们打开了大门。通过老板在中间搭桥，

我们来到张家——浙江人中有很多姓张的，就像米兰人姓布兰毕拉（Brambilla），那不勒斯人姓埃斯波西托（Esposito）——家里住着妈妈、爸爸、三个子女、一个儿媳和三个孙子。老的和小的都穿着羽绒服，我们也宁愿裹着大衣，因为中国人的家里，即便是冬天的晚上，也不开暖气。

我们似乎是在一个想不起名字来的村镇。笔记本上写着：石礁山（音译），一个山区村庄，周围是花岗岩石矿，道路颠簸不平。母亲微笑着给我们递过来绿茶，父亲只是微笑着，我们不会中文，他们不会意大利语，大家只能望着鞋尖，电视里播放的是中文。我们的中国客人，电视里的中文播音员，中国茶，中国人的墙壁用一张山水画简单装饰。我们有点糊涂了，这是在巴纽洛还是在石礁山。

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张先生好像从来没有花过1.5万美元，坐了七天火车来到莫斯科，在那儿等了五个月，总算等到正确的飞机来到意大利，干上石匠的活儿。那是1993年的事，但是看见我们两个意大利人和四个中国人，挤坐在一张沙发上，无言以对，张家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厨房里传来方雪（音译）的声音，她在电话里跟一个朋友讨论明天的会计课程：

“我跟你说是两万，账款应该是两万，写在第118页了。”

父亲继续以中国人的方式微笑着，女儿在用意大利语热烈地讨论着：幸亏这些会计课程，时空从文城的石礁山，回到皮埃蒙特的巴纽洛。从中文的“你好”到“Buongiorno”（意大利语的“你好”），15年的时间不够用。众人一定要生硬地区分封闭和开放，一个小女孩就足以打破这些界限。父亲刚刚退休，但好像还是在中国，女儿1998年来到这里，马上就要成为意大利一所高等技术学校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他艰难地在前面开路，她轻松地到达目的地。那么孙子辈就不用说了：他们是阿莱西亚（Ales-

sia)、埃里克 (Erik) 和斯蒂芬诺 (Stefano)。

“他们是我儿子的孩子。”祖母说。

“他们都起的意大利名，因为生活在意大利。”

那么对谁封闭呢？

年轻的企业主：400 欧元的生活费，梦想着 40 万

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只见到了他的妹妹。事实上张家的年轻人，创造纪录的不止一人：17 岁的方雪是在巴纽洛的中国人中第一个可以上大学的，26 岁的方瑞（音译）是山谷里从石匠到书桌的五个中国人之一。“张方瑞露赛娜石材加工”的牌子，挂在他用来做办公室的预制板房外面，房子周围是灰尘的云雾和各种各样的石材。

在意大利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一般在 40 岁左右，如 Colaninno、Benetton、Barilla、Marzotto、Marcegaglia、Guidi…… 的子女。方瑞，年龄只有 26 岁，而且是一个中国石匠的儿子，他双手肿大，低头向着他的目标前进。他像父亲一样敏捷，身体精瘦，穿着磨破的牛仔裤，手机铃声像是周六晚上的迪斯科舞厅。搞不清楚他在看什么，想什么，但每次我们找他，都能找到他。他让我们走进他的工厂，跟我们谈他自己，还介绍了他的工人：可能他像他的国人一样封闭，但肯定不像他的意大利同事那样审慎。

年轻的企业主告诉我们，石材工业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经济危机使生意减半。当我们说到所有的企业主都喜欢在公众面前诉苦，然后私底下偷着乐时，他也笑了起来。他说，自主创业对他来说不容易：

“那时我 21 岁，中国的亲戚和朋友不愿意借钱给一个如此年

轻的人。”

他只能去银行，“押上所有的设备，借到了3万欧元用于开业。”

他成功了。如今他有两个企业，加工正宗的巴纽洛石材，雇佣了15名正宗的浙江人：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敲凿石块，现在我只搞管理，这样更好。”

方瑞给我们讲解，品质最好的石材是纹理不多的，品质不好的只能用来铺路；还给我们介绍了不需要特殊技能的普通设备和石匠师傅使用的大锤子。然后，我们决定开车一起去镇上转一圈，停好车后，我们步行去酒吧。真是不可思议，周围的人都盯着我们看，显然我们与众不同：这个镇子上有中国人已经十年了，但“封闭”和“审慎”的较量，使得这唯一的一次多种族的聚会是由记者撮合成的。我们问方瑞，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会不会比较紧张：

“从来没有。”

我们问他，意大利人会不会有些烦恼，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已经不局限于打工了：

“没有，但有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与其在这儿跟我们竞争，你干嘛不回到自己的国家？”

方瑞笑着回答了许多问题，但当我们靠近他的企业秘密时，他很干脆地拒绝：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好吧。实际上他后来都告诉了我们，包括他最后还是赞同意大利人的观点，打算回中国：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那儿的人更知足，大家经常在一起，都喜欢上街。不像这里，各自关在各自的家里。”

但需要至少 40 万欧元才能衣锦还乡，方瑞打算尽快赚到这笔钱：

“除了 8 月份的四天，我不停地工作。听说有的意大利人借钱去度假，简直不可思议。”

除了挣钱之外，还有节约：

“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花什么钱，大米买 20 公斤一袋的，偶尔喝杯咖啡，如果挣 2000 欧元又没有家庭，可以省下 1800 欧元。”

他有家庭，跟妻子和三个孩子每月花 400 欧元，如果花 500 欧元就算挥霍了。我们告诉他，五个人花这个数确实非常少：

“我知道，但我们就是这样。”

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但他在意的是别的纪录：

“他们告诉你，我妹妹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中国人了吗？”

石头擦石头：收入增三倍，中介减半

企业主高兴，工人挣钱，政府有收入，资金转起来，经济得到发展，如行政长官马纳韦拉所说：

“这里是（意大利）东北的一部分。”

但不知道他说的是石头，还是中国人，虽然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在这里，石材加工已经有几个世纪，但最近这十几年，仅在巴纽洛-皮埃蒙特这一个区，带动一片附属产业并使企业赢利的石头开采，几乎增加了百分之百，从 20.9 万吨到 39.9 万吨；同时新矿许可证的申请，从 10 个增加到 129 个。巨大的增长，利润从天而降。大家都应该满意。只可惜星期天的早上，巴纽洛的圣彼得广场（San Pietro）人来人往，都是意大利人，老年人。而下午就只有几小群人，是中国家庭和年轻人。并不是他们彼此仇视，

也不像狗和猫的情况，可能用水和油来形容更贴切一些。他们从身边擦过，但从不融合：

“从一方面来说，中国人是一群容易管理的移民，他们不惹是生非，不会威胁社会稳定。”行政长官对我们说。

“如果来一帮巴尔干人，肯定马上就混在一起，看不出区别了。但中国人更喜欢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

例证不胜枚举：他们的家庭从不参加守护神节，母亲从不到学校去，甚至不去拿孩子的成绩单，孩子们从不参加同学的生日庆典，成年人不去学习意大利语。伯阿友（Mirella Boaglio），环境和社会服务的行政助理，给我们举了个例子：三年前，政府召集中国人到佩丽扣剧院（Silvio Pellico），讲解垃圾分类收集、接种疫苗、道路安全等事宜。在会议室有行政长官、助理和翻译。来了一大群人，大家很满意。讲完话，回答完问题，政府邀请大家吃点东西：特意按东方人的口味，准备了炸米糕、炸虾片、青岛啤酒。还没等他们从讲台上下来，人已经走光了：

“150人只剩下那通常的十几个，我们感觉很不好。”助理接着说。

“我在教堂做志愿者的时候，就从事民族融合的工作。但中国人确实有些封闭。”

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是中国人的问题，可能吧。他们喜欢关在笼子里的文化，不喜欢外人介入。但巴纽洛-皮埃蒙特的情况，还帮助我们弄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意大利人今后怎样生活。最近两年，政府从石头上得到的收入从184.8万欧元增加到240.1万欧元，增加了30%。但同时，巴尔杰和巴纽洛唯一为中国人服务的文化中介，工作时间从每星期的23小时减少到12小时，几乎减少了50%。显然是预算的问题。如果把时间段放宽一点来看，我们发现，当地政府在十年的时间里，

从石头上得到的收益几乎增加三倍，现在可以覆盖 60% 的政府支出。东方移民对税收增加的贡献，几乎是 250 万欧元，但为他们开设的文化窗口，每周工作一个早上，政府一年为此花费 6500 欧元。

无独有偶，贝蓓 - 费诺友 (Beppe Fenoglio) 小学给中国小孩增设的两小时意大利语课程，2 月份停课了：没钱。同样的理由，“全世界的童话” (*Fiabe da tutto il mondo*) 项目也要被取消，该项目让意大利孩子和中国孩子在一起互相讲述童话：

“他们不知道这有多重要，让这些中国孩子融入环境。”一位沮丧的教师这样说道。

“融合？事实上是我们看着办吧。”

不看着办的，是我们前面遇到的意大利企业主。当我们问石材生意有多大规模时，他说是巴纽洛政府税收的 50 倍，也就是 1.2 亿欧元。难道就找不到一点资源来赞助文化中介？

Maurizio 和毛利

“幸亏有毛利。”

在巴纽洛的所有人都这么说，包括行政长官、行政助理、教师和年轻人。他是唯一不属于任何派别的，既不属于“审慎”派，也不属于“封闭”派；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工人。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叫毛里兹奥 (Maurizio)，姓博耶罗 (Boiero)。

“但是我的中国朋友给我取名毛利，我觉得挺好。”他说道。

面对我们已经说过的各种巨大资源，在巴尔杰和巴纽洛，民族融合的工作主要由这位 22 岁的都灵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做。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爱上了东方文化。三年前，因为那常见的不现实的缺钱而取消的、给成年中国人开设的意大利语课程，毛利和他

的朋友们借了一间教室重新上课了。

“从10月份至今，我们有了200多名学生。”

另外，初中的孩子们放学后没有去处：还是毛里兹奥（Maurizio）组织他们。

“虽然我们的空间和用具非常少，连个黑板都没有。”

不仅如此，毛里兹奥（Maurizio）是唯一的意大利人，去接近中国年轻人，跟他们交往，让他们从种族隔离中走出来。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关静（音译）、于乐（音译）和方雪：

“人们说中国人不愿意融合，但意大利人也没想去认识他们。”

语言是个障碍，因此那天晚上，我们去巴尔杰中学的一间教室，重新温习动词、虚拟句式和不定冠词。讲台上是关静，19岁，来意大利“六年零七个月”，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严肃的女孩，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但她还是注意不出错，这使她显得更加严肃。显然她是石匠的女儿，在这里给岁数大的同胞教授意大利语，5月的晚上，来这儿听课的主要是妇女：

“因为现在天亮的时间长了，男人们要更晚才收工。”

这些就是不愿意学意大利语的中国人：翻看3月份的花名册，有80名，刘、胡、陈，等等。回到教室不难看出，意大利语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难：语法，发音，词汇。感谢毛利和他的朋友们还在努力。在意大利由于预算的原因，那些靠移民而生存的地方政府知道有民族融合的问题，却不能给成年人组织意大利语课程。即便银库充实，盘中也可以无粮果腹；即便所有人都富裕了，资源还是寥寥无几。

因此“幸亏有毛利”，跟关静和方雪一样，有着年轻人的激情，另一个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为社会凝聚所花的每一块钱，都是自己掏的腰包，免费工作。

第 5 章

没有中国人，就没有 意大利的大米

——田里新来的除草工

除草工回来了，但他们是中国人

古语说，最重要的是土地，然后是水。冬天，一排排桑树将土地隔成一个个方块；春天，就变成了环礁湖，晃动着白鹭和水鸟的小脑袋。从比安德拉特（Biandrate）^① 到诺瓦拉（Novara）^②，从卡萨类（Casale）^③ 到韦尔切利（Vercelli）^④，到处都是水稻，田里一队队的机器，在意大利北方两个中心城市之间忙碌着。曾经有人幻想，让米兰的郊区跟都灵的郊区接壤，抹掉中间 100 公里无用的平原。但土地却坚持。3 月份灌水，4 月份播种，5 月份观察，6 月份调理，7 月和 8 月除草，10 月份收割。现在比以前更是如此。因为最近几年，“水田”带来从未有过的丰厚收益：2007 年农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②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③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属于威尼托行政区。

④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属于皮埃蒙特行政区。

民卖稻谷，每 100 公斤 25 欧元，一年以后至少 50 欧元。有很多工作机会，幸亏有人照料田地。我们讲的是意大利盛产大米的金三角地区，20 万公顷的波河平原，水稻产量占欧洲的 40%。这能不引起意大利的中国人注意吗？

比洛尼（Massimo Biloni），在国家水稻研究所做了七年研究员，现在管理一家给半个欧洲提供种子的合作社。我们在韦尔切利市中心见到他，一起坐在市场酒吧（Mercato）里，旁边就是意大利最繁忙的期货交易市场：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楼。每周二和周五，几百位种植户、加工企业和商人来到这里，争吵水稻的价格，为牛肉、猪肉、牛奶、禽蛋等讨价还价。

“这里一切都围着水稻转。”比洛尼简短地说。

他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西尔可纳 - 曼伽诺（Silvana Mangano）演的除草女工这几年被一大群东方的年轻人取代。就像（20 世纪）60 年代的除草工一样：一年里，其余的时间做餐馆跑堂，干家务活，在商店里帮工；七八月份带上行李，来到皮埃蒙特清理稻田。40 年前能来成千上万，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涌向田野，使平原的村庄改换一幅景象，现在只需要 300 人，很难有过去的景象了。

韦尔切利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严谨、能力和耐力，受到普遍的好评：

“从来没见过这样干活的。”路过酒吧的一位种植户这样说道。

比洛尼赞同他的说法，开始讲述“苦大米”之后发生的事情：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都是除草工一把一把地拔去杂草和有害植物。后来我们农学家称作‘绿色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在田里开始使用杀真菌剂：以前成千上万人干的活儿，现在只需要一台拖拉机喷洒化学除草剂。”

当地年轻人新的目标是进工厂工作，除草工也幸福地进了城。

“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中国人。”

问题是，水稻是一个持续的战斗，稍一松懈就功亏一篑：

“大自然比我们人类更狡猾，20世纪80年代末突然出现一种杂草稻——红稻。”比洛尼接着说。

“把我们完全搞懵了：重新起用除草工，经济上不可行，但其他的办法，是经过许多年之后才找到的。”

简单来说，现在这一问题通过“假种”的办法得以基本解决。还差的那一点就靠中国人了：

“他们就跟50年前的除草女工一样：在田里，三四米间隔一个人，一面向前走，一面拔掉杂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长时间暴晒在七八月份的太阳底下，脚浸在泥浆里，遭受蚊虫的叮咬，弯着腰，全神贯注在杂草上。需要很强的体力和耐力，还要有植物学知识：要拔掉所有该拔的草，要认识什么该拔，什么不该拔。这活儿收入不高：

“官方薪酬是每小时6.5欧元。”比洛尼确认。

“一天工作8小时。”

显然，清晰完美得像一个国家合同。但别跟那些水稻种植户去说。因为关于工作时间，他们心照不宣：

“少于12个小时的工作，中国人从来不会累。”

这还算说得少的。

从“一把野花”到猎捕河狸鼠

这样，中国的除草工来到了皮埃蒙特的稻田。如果那些消失了的、50年前的除草女工给你留下深刻印象，那么现在，这些重新出现的除草工也会给你深刻印象：他们的肩膀更宽，头发乌黑，

是长着杏仁眼的浙江人。比洛尼说：

“这里的年轻人也尝试过，但干不了多久。”

奇里奥（Claudio Cirio）有 200 公顷的稻田，每年夏天，五名中国人帮他把田地清理得干干净净。他记得曾经有两名女学生，特别兴奋地想在大学考试的间隔期间来做除草工：

“她们本应干一个月，但半天之后，她们来谢谢我，钱也不要，她们再也不想踩进泥巴里了。”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吗？也许他们只是跟以前的我们一样？

直到两年前，在卡萨贝尔特拉梅（Casalbeltrame）和卡萨沃洛内（Casalvolone）之间的诺瓦拉省，还有四位妇女做除草工。她们都过了 70 岁，最老的一位做了 65 年的除草工：

“12 岁就开始做，从没停过，即便是除草的活儿很少的时候。”

当地的一位水稻种植户告诉我们。

“夏天来临的时候，只要看见我就会拽住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种植户有了效率极高的中国人，只希望年迈的除草女工不要再想劳动了。但是怎么能拒绝一个劳动了 65 年、在这片土地上累弯了腰的人呢？

“田块总是分开的，因为她们不愿意跟中国人一起干活。她们说不相信那些‘蜗牛’。”但实际上她们做得更慢，眼神也不如人家好使。

而且还要让人看见她们干活了。有意思的是，弯着腰，脚踩在泥巴里，干了一两个小时后，“来，大家来唱歌”，一起唱起“一把野花”或她们教堂里的歌曲。

但是音乐结束了。也许是活儿太累，或者是薪酬太少，总之让老妇人们退了休，现在劳累的只有中国人了。当有一小会儿的

田间休息时，他们不是唱歌，而是去捕猎：

“我看到他们就这样，空着两只手去抓野鸡、兔子，还有河狸鼠……”

撇开猎人的嗜好不谈，据说他们非常有本事，从不踩坏水稻，从不出差错，拔掉该拔的杂草：

“他们的眼睛很敏锐，好像能看到后面。”

我们的种植户面露惊叹。

“为了不踩着水稻，他们有一种滑动的前移步伐，这儿没人见过：向前移动，拔除杂草稻，不留痕迹。”

从年迈的除草女工到年轻的中国人，可怕的是，事实上是我们，向前走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甚至没有拔掉杂草稻。

少说了两个 Z 的水稻专家

全球化给波河河谷吹来了一丝东方的风。现在这里有近乎 300 名中国人，但第一个来到这稻田的中国人，是在 20 年前：他不是除草工，不拔杂草，是一个研究水稻遗传学的农学家。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王学仁（音译）立刻就让我们明白了他的研究哲学：

“实验室不行：要想种出好水稻，必须待在田间地头。”

王博士研究水稻 30 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吉林山区，在国内他同样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选择到韦尔切利来种好水稻。今年春天在皮埃蒙特见到他，觉得科研和田野一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农学家王博士有 53 岁，但头发极黑，蓝色运动衫和牛仔裤使他的身材显得挺拔和健壮。只有戴着的眼镜透露出他知识分子的身份：

“我们在米兰每年有四次聚会。我们很重视这个旅意中国学者

的联谊会。”

可以是中国人，生活在意大利，而不去做餐馆，不去做批发生意。可以，但不是全部：

“刚开始的时候挺难的。韦尔切利的水稻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10个月的奖学金。然后就没有奖学金了，我想继续做下去，有两年的时间，我一边读书，在田间做实验，一边在诺瓦拉的一个餐馆里洗盘子。”

曾经很难，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使我们明白，在内心深处他从来都没变。我们电话联系王博士，定好在他住的镇子的广场见面。我们从米兰出发，上A4高速公路，从韦尔切利西口出来。离开高速公路，我们的周围是还没有灌水的平静的稻田。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用桑树来规整稻田。

开着车的时候，我们想到他住的镇子，哪个镇子？据说离韦尔切利几公里，在电话里我们以为是Besana。停下车，我们查看地图，没有叫Besana的地方。仔细查找，我们找到了Desana。齿音和唇音是很容易混淆的。

“喂，王博士，我们到了Desana，您慢慢来不着急，我们在广场等您。”

他笑了起来，非常客气，但在笑。

“不，不是D开头的Desana，而是P开头的Pesana。你们应该走Casare的方向。”

非常清楚。但什么都不清楚。因为没有Pesana，在地图上也找不到Casare。我们向路人打听。当地的一对夫妇帮着我们查找，猜想。突然灵感来了：

“不是Casare方向的Pesana，而是去卡萨类（Casale）路上的佩杂那（Pezzana）。”

又经过10公里的田野，我们把车停靠在有两个Z的小镇的广

场。我们的农学家用热情的笑容和农业知识分子的握手，欢迎我们。据说中国人还保持着在家里招待陌生人的习惯。在王先生领我们去他家客厅的路上，我们想，在意大利生活了20年，还是会掉进辅音的陷阱，生活对他来说，应该不容易。

我们在佩杂那，水稻三角洲的正下方，几百年来，水稻是帕维亚、诺瓦拉和韦尔切利的重要农作物，占全国产量的90%，18万公顷，每年收获超过100万吨的大米。但在王博士的国家，每年大米产量是1.8亿吨。留在自己家里不是更好吗？跑这么远的路，找到1/180，有意义吗？

事实上，王博士的选择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来自中国的偏远地区，那些大学生、硕士以及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人们，还在不断地逃离那里：

“在这里，农村和城市没有区别。生活在佩杂那，就像生活在都灵。我们那儿不是这样，20年前就更不用说了。”

王的年龄足够让他想起可怕的60年代：

“我们那时候没吃的，到山里去挖树根充饥。”

他认为，即便是最近几年经济发展了，但中国北方农村的情况，没有很大的改观：

“在我们那里，农村只能生存。如果想过得更好，就得走。”

中国来的维内蕾稻米

王走了，他给选择停靠的国家带来了财富。在韦尔切利和诺瓦拉，种植水稻超过五个世纪，但种植维内蕾稻米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是王博士的功劳。他的国人把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王博士把这种芳香和好吃的稻米带到欧洲，这种稻米在中

国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字：皇家贡米。感谢王博士，今天黑色稻米得以在我们的气候条件和我们的土地上生长。似乎很简单，但用了五年的时间进行杂交、试验、失败和重新开始。我们的主角，农学家，穿梭在实验室和 Sapise 种子合作社的试验田里。

然后，当然也是他的功劳，300 名除草工追随他的足迹，来到比安德拉特、佩杂那、卡萨沃洛内……

农学家说：“黑米更健康，更香，更好吃，最主要的是比白米含有更多的铁和硒。唯一的缺点是产量低，因此比白米贵两倍。”

对于高级厨师来说，它是赢得奖杯的最好选择：黑米配虾，配海虹，配芦笋，或者只用黄油和香草调拌。一切都是王的功劳，全部都是卡萨贝尔特拉梅出产，感谢中国农学家的贡献，卡萨贝尔特拉梅成为慢食城市，正宗的意大利原产地。在入口处有一块牌子，骄傲地画着一颗黑色的心，并写道：维内蕾稻米的发源地。

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王把它做了出来，他原来工作的公司为它注册了专利，王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维内蕾稻米也就不是他的了。现在它属于 Sapise 合作社，该合作社用尽全身解数，聘用律师和田间密探保护此项专利，防止其他人在其他地方种植：

“已经有过好几次，有人想在别处种植。”奇里奥说。

“都让我们给制止住了，黑米只能在我们这儿种。你拿一公斤去尝尝，然后告诉我怎么样。”

非常好吃，但我为王感到遗憾。他来到我们这里，带来稀罕和重要的东西，现在却两手空空。

现在王博士在做什么？

“你们过来看。”

离开客厅，走进厨房，遍地是大大小小的口袋：

“这些是中国的稻穗。我在做其他的杂交和试验，现在这里是我的实验室。”

从不回国吗？

“当然回，在放假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喜欢这里，女儿在都灵学经济，小儿子取名叫天赐（音译），但更喜欢让人叫他安杰洛（Angelo）。”

天赐，安杰洛……我们在一张照片上看到他最近一次在中国的旅行：一个年轻人，在一艘船上，航行在黄河上。像是当地人，但离家却有1万公里。除了黑米，王博士在意大利还种下了一部分自己。

这些中国人是疯子

诺瓦拉和韦尔切利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皮埃蒙特大区北方联盟支持率最高的地方，应该不会是中国移民的原因。跟当地种植户聊天发现，无法忍受差异，可以有非常奇怪的表现形式。即便非常肯定在地里种下的是稻谷，长出来的却是杂草。刚开始的时候是兴奋，但现在，雇佣除草工的平原种植户看着你，对你说：这些中国人是疯子。

“一天晚上，我把一个人送进急救中心，因为他完全脱水了。”一个水稻种植户对我们说。

“我确实害怕，回来之后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从今往后，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十个小时。好，第二天我来到稻田，一个人也没有，我跑到他们的宿舍，发现他们都在打行李。他们说要走，因为每天只干十个小时，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

惊讶不断增大，几乎变成了害怕：但是谁能跟移民过不去，只是因为他们的干活太多？难道因为他们不停地干活，就该发火吗？

就像巴纽洛的山区，韦尔切利的田野也因中国人而生出奇迹：

在正确的时候、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种植户们明白这一点，也感谢他们，但还是觉得他们是火星人：

“您说正常吗？他们来这儿许多年之后，知道说杂草稻、播种、除草。但如果说：‘我们在路尽头的右边见。’他们就听不懂了。”

还有其他例证。

一位种植大户对我们说：“除了季节工之外，有人选择留下来，全年给我们工作。有一位出色的农民，天天干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在这里，他们也干活，挣钱不少，从来不惹麻烦。”

一个和睦的家庭，完全融入了社会。可惜在自家的院墙内，偷偷地做着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从他们家门前经过，听到不停的滴克滴克声。第二天晚上，还是滴克滴克。每天晚上，滴克滴克。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每天晚上，从你家传出来的这个噪音是什么？很简单：他们弄来两台缝纫机，业余时间给米兰郊区的老板制作皮包。”

有很多故事，最后都指向那里：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拼命干活？在韦尔切雷泽平原，人们习惯于低着头辛勤劳动。但也要有喘气的时候：

“到我的雇工家里。”奇里奥在他的公司里对我们说。维内蕾稻米纪念馆面对着如海洋般的田野。

“即便是在12月份，气温只有8℃的时候，也没有取暖。因为他不买炉子，事实上他什么都不买。”

屏住气息生活，他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他们就喜欢这样。奇里奥继续说：

“我曾经给他的兄弟夫妇和两个儿子在当地的一个公司找到了工作，全部都是正规聘用，有四份工资、休假、第13个月工资和

免费住宿。”

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文明人，你有一个外国雇员，你会关照他的亲戚，帮他把道路铺平一点，可能还会到学校里去见孩子的老师。

“总之我给他们都找到了工作，企业主还感谢我，给他介绍去了严谨认真的人。”

一年过去了，又过了一年半，一天早上，介绍去的人来向我告别，因为他们要离开这里：

“为什么？你们去哪里？说是要去米兰，因为这里下午5点结束工作，星期六几乎没有加班。孩子们不太情愿离开，但说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父亲忍受不了这样的节奏。”

该给这样的故事一个什么样的标题呢？好心没办好？劳动者因没有加班而伤心？工人因活儿太少而辞职？奇里奥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他是一个早上很早起床、整天不停工作的人，说起他的田地就像在说他的孩子；说起他的稻米，就像是艺术家谈他的作品。但一切都有极限，现在我们好像是超出了极限：

“中国人很能干，但我发誓理解不了他们。”

深入下去又遇到了神秘。我们暂且接受现状：在这个探访意大利华人的旅行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



第 6 章

米兰，意大利的中国首都

——萨勒匹路著名的中国城

在原先有阿尔法汽车厂的地方

我们来到了米兰。在进入萨勒匹路（Via Paolo Sarpi）的中国城之前，阿类色（Arese）城门附近有一大片空地。这里曾经是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汽车的工厂，曾经有 1 万名工人在装配线上工作。现在这里到处是瓦砾废墟，杂草丛生，在阿尔法的 58 个厂房的位置，还有一些施工地点以及办公室和设施，还能看到一些活动，但大部分地方是空的。有时想，中国的批发商应该搬到这里来，因为没人喜欢他们待在米兰市中心。但中国人即便在这里，也同样让人注意到了。

都是因为中国城的那次事件。2007 年 4 月 12 日，一群中国商人与市政警察发生冲突，造成 7 名中国人和 14 名警察受伤。同一天，阿类色的 80 名工人，虽然不像萨勒匹路的同胞们那样激烈，也举行了罢工。

中国人也罢工

卡瑞斯合作社（Caris），在阿类色原阿尔法的场地上处理城市固体垃圾。工作非常辛苦，一个似乎很高明的办法，把生产效率和纪律结合在一起：100名工人中至少80名是中国的浙江人。中国工人干活不停歇，劳累而不出差错。我们看到在服装加工厂，无论是在威内托（Veneto）、托斯卡纳还是维苏威（Vesuvio）^①以南，在连续工作很长时间的时，还能保证裁剪和缝制的质量。

“多少小时？”我们问普拉托的一个企业主。

“18、20甚至24小时。”他大笑起来。

这样的工人似乎对阿类色的卡瑞斯合作社（Caris）来说是最理想的，可以承受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

“我们这儿的传送带不停。”一位年轻职员对我们说。

“如果做完一个班，接你班的人没来，你只能接着做到下次换班。”

传送带上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工人们用手对它们进行分类，塑料和塑料，纸和纸，木头和木头，直到将一大堆混杂的垃圾分成许多单一物质的小堆。

垃圾是意大利的，处理这些垃圾的人几乎都是中国人：每天早上，合作社的班车去萨勒匹路，或其他几个不十分显眼的米兰的中国城去接工人；下班后默默地回家，每天工作12、14、16个小时，每月工作20、25、28天。中国人就是这样。但是2007年的

^① 维苏威火山位于联结意大利南部与中部的衔接地带，属于坎帕尼亚行政区。

年初，卡瑞斯合作社（Caris）的管理者们开始明白，雇佣他们并不合算。

先是劳动监察员来检查，查出几个非法移民，还有不合格的劳动条件。然后就开始了斗争。因为中国人的劳动报酬不合理：

“他们每个月加班 40、60、100 或者 140 小时，但工资却没变。”

工会领导人帕林贝利（Renato Parimbelli）对我们说。他又讲了一些事情，只有对中国人可怕的劳动能力有所了解的人才能相信：

“有些妇女还在哺乳期就回来工作了，把孩子放在班车上，休息的时候去给孩子喂奶。”

对那些东方打工者的三部曲，我们也算了解清楚了：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

阿类色中国城的特点是停在了第一步：工资总是 900、1000，最多 1100 欧元，其中 900 欧元是基本工资，其余的是加班工资。也有可能现在的劳动关系就是这样，为了不丢掉工作岗位，只好接受白干活不拿钱。但中国人不，尤其是遇到了顽强的工会组织科巴斯（Cobas）和像帕林贝利这样固执的人。

中国人干的工作值更高工资

阿类色的事情是意大利近 20 年来工会取得的巨大胜利：

“怎么样？我们靠自己，通过两个月的斗争，改变了 100 个人的生活，而意大利制造工人（Fiom）、意大利总工会（Cgil）和其他所有大型的工会组织，三年了才争取到每月 80 欧元的加薪。”

帕林贝利拿给我们看卡瑞斯合作社（Caris）一名工人去年的一张工资单：1139 欧元。然后给我们看科巴斯（Cobas）斗争之后同一名工人的工资单：1970 欧元，包括 250 欧元的家庭资助、40 欧元的工龄补贴和 100 欧元的夜班加班费。工作量大幅降低，薪酬快速增长。2007 年 6 月 27 日签订的协议增加了“夜班”、“加白班”、“节日加班”、“加夜班”和“节日加夜班”的报酬。

那些喜欢加班的人，每月加班 40 小时，可以拿到 2000 欧元，而在此之前，加班 100 小时才能拿 1100 欧元。需要中国人来意大利搞工人运动。还需要科巴斯（Cobas）。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挂靠政治，不寻求联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最受不了的是那些企业主，挽着我的手，小声对我说：哎，其实我也是左派。”帕林贝利讲道。

阿类色的中国人曾经也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但科巴斯（Cobas）让他们打开了大门。当然需要通过翻译。因为中国人不懂意大利语，不懂劳动法，很多年就这样过来了，试着弄明白发生的事情，试着向他们解释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工资不变之间的秘密。为了启动谈判，科巴斯（Cobas）到每个班上去开会，甚至是夜里两点半。当决定罢工的时候，中国人在一张纸上签上了所有人的名字，用方块字和字母。

奇怪的一对，但他们成功了：第一排是帕林贝利，为斗争提供工会支持；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轻如蜻蜓的女工，严肃得像一个 30 年代的密谋者，在米兰生活了十年，知道意大利语的“罢工”、“工人”和“Caris”，在 2007 年的春天，她领导了这次阿类色中国城的反抗运动。

两个月的斗争，就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当然因为科巴斯（Cobas）的顽强。但也因为中国人以连续 16 个小时清理垃圾的那种执著精神，进行罢工：

“今天你不再是我的头儿。”他们向合作社的管理者呼啸。

“今天我的头儿是科巴斯（Cobas）。”

他们成功了，协议签订一年后，唯一的不满意是要求所有人每星期至少休息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个问题。他们找科巴斯（Cobas）谈了。但这次的回答不好听，就不在这儿重复了。

萨勒匹有 90 岁

在阿类色，不罢工的时候就工作；在米兰市中心，由卡诺尼卡路（via Canonica）、萨勒匹路和布朗曼特路组成的区域，不游行的时候就什么都做：这里是米兰 1.4 万中国人的中心，是意大利的中国首都。是那些不愿意在巴纽洛 - 皮埃蒙特砸石头、不想在普拉托碰缝纫机的年轻人的目的地。

根据米兰商会 2007 年的调查，米兰有 2800 家中国人的企业，每年 5.5 亿欧元的营业额，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良家女孩经常悄悄来到这里，买衣服可以省一半的钱，做头发只花 8 欧元：在米兰排前十位的中国人聚居的街道中，只有两条不在萨勒匹 - 卡诺尼卡区域，而第一名绝对是布朗曼特路，这是一条铺有路石的古老街道，还留着有轨电车的半边轨道，以及人行道上的铁柱子，仅这条街上就有 90 多家商铺，几乎全部做批发生意。

米兰的中国城是意大利唯一一块让中国人，除了经商能力之外，体现传统价值的地方。为了了解这一点，可以去读一本米兰历史的书，或者走进位于萨勒匹路的东方商场，期望遇见王桑（音译）或罗马尼诺（Romanino）大叔。中国和意大利的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叫他，89 岁，眼睛明亮，鹤发童颜，他回忆 1935 年乘坐

红色的“伯爵号”汽轮来到意大利，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1里拉卖掉的第一条领带，无法像其他流动商贩那样卖到2里拉。

从王桑或罗马尼诺大叔的生意，中国人在米兰的市中心扎根，直到形成一个在欧洲最大的中国城；从寥寥几个流动商贩，到现在遍地都是中国人的商店，经历了很长时间：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长征、“文化大革命”、毛的辞世、邓小平掌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到来；经历过皮革加工作坊、餐馆、80年代移民（1990年米兰有中国居民1800人），以及90年代和2000年的移民如潮水涌入（现在合法居民是1.4万人）。王桑于1963年在萨勒匹路开了他的第一家商店，卖皮包，30年之后传给孙辈和重孙辈，他们盼望着重复他在意大利的传奇经历：

“现在我们聚会，从来不少于50人。”

他自豪地讲到自己关照的亲戚越来越多，利润也成倍增长。这位优雅的先士，戴着巴黎式的礼帽，打着波尔多领带，穿着丝绒西装和舒适的球鞋，每天从家里出来，穿过萨勒匹路，走过布朗曼特街，步行来到朱斯蒂路（via Giusti）的教堂，回忆如开闸放水般自然涌流出来：

“以前这儿是做面包的，在拐角那儿原来有家银行，这里几年前是米兰卖蒂若罗布（Tirolo）的地方……”

他也有责任，如今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都变成了中国人的服装店、中国人的鞋店、中国人的香水店，是罪过还是功劳？从第一次在萨勒匹路卖领带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罗马尼诺大叔已经太老了，无法再为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操心，或者对批发商大军和专业商店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他宁愿手画十字：

“上帝是伟大的，我在意大利成为了基督徒。”继续他的溜达。

“我得让他们看见我，否则他们会说罗马尼诺大叔死了。”

庞大的批发生意

萨勒匹死了，萨勒匹万岁！罗马尼诺大叔的回忆，说明米兰的中国城有多么古老，而跟林杰（音译）的聊天，让我们了解到它的变化。这个大男孩在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读四年级，我们在一个酒吧遇到他。酒吧里，中国的年轻人一边喝着泡沫咖啡，一边玩牌。我们谈到民族融合、学习计划和对未来的设想。他说：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这样我们离开酒吧，离开熙熙攘攘的购物主街道，来到坎比奥路（via Arnolfo di Cambio）第6号，这是一个离主街道很近的小巷子，附近还有一个知名的烟酒商店。

杰停住脚步，指给我们看一个中国草药店，明亮透明的橱窗，用中文和意大利语写的广告，向人们推荐人参糖浆和姜药。

“你要给我们看治疗咳嗽的药方？”

“不是，直到1996年，这里的伸缩门还总是半开着，”杰对我们说，“因为不能在行人的目光中缝制皮包。”

在罗马尼诺大叔和他的同行们的商店旁边，在米兰的中国城里，曾经有很多制衣厂和皮革作坊：在地下室，在阁楼，在街面房内，干活、吃饭、睡觉都在这里，许多人住在一起，大人和小孩，熟练工和新手，工作很长时间，尽可能地躲开众人的视线。现在几乎没有作坊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实际上什么也没变：城里变成了商业场所，而作坊搬到了米兰郊区，那里还是继续缝制、剪裁，吃饭、睡觉都在一起。杰回忆90年代的坎比奥路：

“那时候我妈妈是非法移民，就住在现在草药店的地方，你看，空间不大，她租下这个空间正好可以放下一台缝纫机，再在

地上放一个床垫。这就是她在米兰事业的开始。”

还是那三个词：干活，干活，干活。母亲天天缝制，晚上就躺在脚踏缝纫机旁边。

“她跟你讲过以前的那些艰苦吗？”

“是的，她说一边缝纫，一边想念着还在中国的我。”

90年代有手工作坊，再过几年将是精美的商店，现在主要是批发生意。萨勒匹在变，当杰讲述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个意大利商人，把他火红的BMW X5停进巷子，完美的阳光肤色，留着长发和小胡子，脱掉西装从车上下来，挽起袖子开始干活：一刻钟的样子，给他的SUV装进了几百盒鞋子；一群中国小伙子从拐角处的商店里每人每次搬运六七盒。

中国城的批发商给摩洛哥人的流动商贩供货，每天市场关门后，商贩们来这里拿货补充储备；还给在帕多瓦、都灵和德里亚斯特的中国商人供货，使他们不用跑到罗马去进货；当然还给意大利人供货，但这些意大利人刚刚把货物卸到商店，就又开始抱怨移民损害城市，偷了他们的工作。根据官方数据，在萨勒匹地区的中国批发商店有186家，而恼怒的意大利居民认为有500多家。一个社会研究中心Codicci根据经验分析，认为2007年10月有283家，仅在布朗曼特路就超过百家。

从哪儿来的钱？

这些年，中国城的批发商在米兰及其郊区转圈子，他们搬到米兰的圣多纳多区（San Donato）、瑞帕梦迪路（via Ripamonti）和米萨亚路（via dei Missaglia），出现在拉克亚瑞拉（Lacchiarella）以及阿类色原阿尔法汽车厂的区域，沿着纳韦夷（Navigli），在柔

扎诺（Rozzano）和特留尔齐（Locate Triulzi）等地，肯定还有些不太重要的地方没有列出来。显然他们还在这里，但这些年，有政府的声明，有许多建议，还有威胁，不管他们去哪里，只要离开米兰市中心就行。

早晚他们真的会走，为了激怒他们，先让他们没法生活：

“但他们没感觉。”

利奥内多（Pier Franco Lionetto）痛苦地证实，他是拯救萨勒匹协会（Vivisarpi）的主席，该协会领导意大利人对抗中国人对该地区的收购，或者按照“政治正确”的说法，是该区域的居民抵抗批发商的入侵：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街道挤满了卡车，装卸所有的货物。卡车禁行以后，中国人开始用小货车；小货车禁行之后，用摩托车；摩托车也被禁止后，他们拿出手推车；手推车之后是自行车上挂个筐。如果那个也被禁止的话，他们会把货物顶在头上步行。”

我们相信他们肯定做得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有人头顶货物穿越禁行区，就像中餐馆变成日餐厅以躲避歧视，或者中国鞋店就坐落在 Lionetto 连锁店的一堆橘黄色旗子下面：在拯救萨勒匹协会（Vivisarpi）的所在地，中国商店以开心的嘲讽把它称作萨勒匹万岁（Vivasarpi）。世界就是这样，东方思维就是这样：巴纽洛的中国人在短短几年里，从烂鞋底到宝马车，而他们在米兰的表兄弟愿意从手推车到篮子。2007年4月12日在中国城发生的冲突是一个喧闹的插曲：一个过客，很快就被米兰1.4万中国人平静的疯狂所吸收，这些人在米兰走着自己的路，做着自己的事，不被周围的声音所影响。

但那声音还在坚持：

“从哪儿来的钱？”

“他们为什么都来这里？”

“我们不得不在这儿忍受烟雾。”

“他们的纸盒子总是堵塞人行道。”

意大利人中几乎没人喜欢他们，即便年轻人也这样说：

“以前这里是个很美的区域，我家楼下有一个面包店，现在只有批发商的破布头。”

老年人也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被包围了。”

一个英国人在想念“为我的教堂服务的鞋匠”。

刚从布朗曼特路搬走的一名工匠说：

“如果在一条满是中國批发商的街道上，你是唯一的意大利商店，你无法留住客户。”

拯救萨勒匹协会有 250 名会员，但它的主席就像是代表 1.8 万居民讲话：

“他们给我们塞满了批发商店和服装作坊。但萨勒匹路还有意大利的东西：2006 年年底，有 80 家中国店和 80 家意大利店，现在我们是 100 对他们 60，我们希望变成百分之百。”

为了帮助和平共处，这条街上不能有很多搭铺，即在公寓里挤满非法移民。这些人神色慌张，脸颊凹陷，跟那些营养良好、手牵手拉着他们长着杏仁眼的漂亮小孩散步的商人截然不同。根据邻居的举报，宪兵和警察周期性地来这里突击搜查非法移民。

很难迸发出好感的火花。在意大利的高中，教师们说中国学生有两个问题：他们是中国人的，他们在青春期。在米兰的中国城，居民们说中国商店有两个问题：它们是中国人的，它们做批发生意。不知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意见：他们干活儿太多？藏了很多非法移民？他们只顾做自己的事？随地吐痰，有臭味，永远不死？就算是没有了面包店，但对于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萨勒

匹路是全米兰唯一一条星期天营业的街道，是唯一一个可以推移日程表上的安排跟旁边商店聊天的地方，唯一一个容忍孩子不被大人陪同的地方，唯一一个有许多人站在街上无所事事的地方。

华人社团是紧凑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代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是所有来意大利的移民种群中最低的，第二代大多读米兰商学院和米兰理工大学；暴力事件很普遍，但局限在他们社团的内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就可以原谅，只是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期，意大利人可以在此地活动，任何时间不用太担心手提包；但批发生意的确是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整治，现在布朗曼特路是少有的几条没有太多拥堵的街道之一，也没有汽车停放在人行道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意见呢？似乎谈论批发、交通和随便停车就像是邻里吵架，以避免进入地缘政治或者人类学的争论。萨勒匹路是新的东西方冲突的前沿阵地？是温文尔雅的西方专营店方阵，跟英勇善战的东方批发商之间的对抗？确实，对于大多数意大利居民来说，米兰的中国人基本有两个问题：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太多了。

意大利人赚钱的好生意

确实是太多了。暂且不谈好感或者东方文化、功夫和风水，有一件事是确凿的：除了家庭庞大、工作辛苦、难消化的粥和听不懂的方言，中国人还带来了很多钱。我们已经看到，据商会统计，仅米兰就有5.5亿欧元的营业额。缩小范围，我们可以说，在布朗曼特路的一个小工匠就拿到1.5亿里拉（约合7.7万欧元）。

“那时我刚到这里不久，不想出让。”

我们的工匠，在我们告诉他不要写名字、不要写地址、不要说谁卖

给谁之后，对我们说道。

“1997年中国人开始来到这里，接手许多关闭的商店。开始的时候他们只付正常的押金和租金，房屋主人很高兴，因为布朗曼特路的工匠开始变老，没有人接班。”

后来中国批发商发现，这里可以成为他们在米兰的街道，决定全部拿下来，不惜任何代价：

“当时出现一个高速增长：1998年出5000万里拉（约合2.6万欧元），1999年1亿里拉，2000年1.5亿里拉。我算幸运的，是走得最晚的一批。”

事实上现在这里还有一些意大利人。为了深入了解这个情况，我们暂且中断和工匠的谈话，而去询问萨勒匹路自由业主协会的主席瓦卡罗（Remo Vaccaro），因为他还在那儿。在他漂亮的院子里，他的商店经营办公设备、计算机及维修。他们没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报价吗？

“问题不在这里。都说是中国人的入侵，但实际上，把商店转让给中国批发商的工匠90%本来就是要关门的，因为有些生意已经不赚钱了，而且子女没有人愿意接班。”

在米兰，萨勒匹路一直是商业主干道，布朗曼特路一直是工匠商店云集的街道：修鞋、画框、地毯、装修、电工、修电视的、理发店，等等。现在有100多家商店，批发中国制造的东西。有问题吗？

“批发生意确实产生一些不便。”瓦卡罗继续说。

“但驱除一个像中国人那样勤奋的群体，并不是解决办法。因为在这儿，谁也没偷什么，既没偷空间，也没偷客户，更没偷营业执照。”

说他们没有偷还不够，事实上中国人的钱让一大帮意大利人欣喜若狂。回到我们的工匠那里：

“最后几年，不断地有人走，有人来，中国人走进商店，笑着问：出让吗？他们只会这句意大利语，后来我看到他们进来，没等他们开口，我便笑着说：‘不！’这样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半，街道在改变，今天隔壁的一家走了，明天对面的同行也走了，有一个工匠在一个30平方米的阴暗小室里待了20年，为1.2亿里拉（约合6.2万欧元）也走了。不长的时间里，这条街上的商人几乎都是中国人了，他们的效率极高：周一还是那家修鞋店，周三就变成牛仔裤和短袖衫的批发商，开始营业了。”

河水般的金钱，用来补偿离开的工匠；还有一些小溪水，用来滋润周围的人：

“我给你们讲讲我个人的经历，不过除了价格每月会有变化，其他的都是这样。”

价格在涨，工匠不再坚持，开始考虑转让，全部过程由专业代理财产转让的意大利中介处理。有一个特殊的细节需要说明一下，这里谁也不拥有财产：没有购买物品，Bersani法律刚刚废除了执照转卖；布朗曼特路的大部分物产不属于使用它的人。那他们在交换什么？

“就我的情况来说，就是我同意离开。”

他的同意值多少钱？

“1.5亿里拉（约合7.7万欧元），差不多是我和我合伙人一年的工作。显然不用交税，最重要的是省了12个月的辛苦。”

我们的工匠和他的买主，需要见三次面来完成交易。不是因为谈判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而是因为1.5亿里拉的现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数清楚，总共是3000张5万里拉的票子：

“我们三个人数钱：先是中国人，然后是中介，最后是我。看着这种情景，几乎不能相信，感觉像是在电影里。”

就是这著名的装满现金的皮包，中国人用它买下半个意大利：

“事实上是大衣，我的买主总是和两个亲戚一起来，一走进中介的办公室，就开始掏口袋，每次把5000万里拉放到桌子上。”

所有的人都高兴：工匠省了一年的工作，几个月后用1/4的钱，可以把商店开到比原来高级四倍的街上；物业的主人因为同意转租，而把租金由每月的75万里拉（约合387欧元），提高到110万里拉（约合568欧元）；中介拿到500万里拉（约合2582欧元）佣金，全都不用交税；中国人总算是可以在米兰做批发生意了。但还缺点儿什么：

“中国人不惜代价都要买下来，知道我装满了金钱，为了得到一点胜利的满足，数完钱，在把一摞钱递给我之前，每次都要让我忍受一点小小的侮辱。”

什么样的侮辱？

“第一个5000万，他让我在把店交给他之前打扫一下地板。我试着说不，他和他的亲戚开始把钱装回大衣口袋。您知道，为了5000万，我可以把整条街都扫了……”

那么，成交。

“还没完：最后5000万，他看上了那个不值钱的炉子，他要我把那炉子留在店里。虽然那炉子已经站不稳了，但毕竟跟了我很多年。不过您知道……”

可以想象，现在那只炉子还在那儿：漂亮，冰冷，更加站不稳。一个战利品，纪念一场所有人都是赢家的战争。

“在您这儿做流产要多少钱？”

现在已经不是大收购的时候了，一个工匠抱怨说，2001年，他以9000万里拉（约合4.6万欧元）转让了一个店，现在无法转

让第二个店：

“因为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意大利人的坏心情，他们很小心。”

但是对中国移民来说，米兰的中国城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放弃的根据地：购物，工作，娱乐。还有：

“我的诊所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至少一个想要流产的中国女孩。”

一位家庭医生对我们说，他在这个区域行医，给许多中国人看病。

“准确地说，每天都会会有一个女孩进来问我：‘在您这儿做流产要多少钱？’”

不要钱。但经常，这不是她们想要的回答。因为免费，意味着要来诊所做检查，然后是医院、预约、手术……

“她们想要在这儿做，马上做，省掉那些无用的官僚程序。”

医生认为这是个文化问题，是计划生育的产物：很多中国人认为，生下来比流产更有罪过。

“经常，在我这儿做过的，之后还会再来。有些女孩只有20岁，但已经做过两三次流产了。”

如果女孩是非法移民，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

“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许多医院不接收。”

这种情况下，医生给女孩拍个照片，把照片订在检查结果单和手术申请上，然后送到医院，希望医院能够接收：

“现在布齐（Buzzi）儿科医院明白了，如果不接受，这些女孩就只能去做地下手术，他们开始接收这种身份的病人。”

但是一个星期会有一次不同的情况：

“一个星期至少一次，一个女孩，由她的一个女友陪同，来到诊所。因为做完地下手术后，出现并发症，需要医生治疗。”

她们来自意大利各地，因为她们知道，在米兰的中国城什么都有：中国医生，或者江湖骗子，卖草药的，给她们推荐流产药

物，然后是控制副作用的药物。如果还不行，就把跟我们谈话的这位医生的地址拿出来。或者就是由工匠来做外科手术，极有可能损害女孩的健康：

“在中国城，人工流产的价格是：三个月以内，300 欧元；从三个月到五个月，七八百欧元。”医生告诉我们。

去做地下流产的，80% 是没有合法居留的女孩，其中至少一半是做妓女的：

“有时在做检查的时候，她们的手机响起来，在电话里她们跟客户娇媚地打招呼。”

但是还有 20% 的女孩有合法居留，她们完全可以安心地去公共卫生机构，为什么还要去中国城的地下室做流产，出了问题之后，再去找医生寻求帮助，而不是去医院妇产科做呢？

“为了不浪费时间。她们要马上处理完这件事回去工作。”

我们的医生去年花 3.5 万欧元，买了一台便携式超声检测设备：

“因为她们很急。如果你让她们到别的地方去做检查，可能你就永远见不到她们了。”

总之，不仅仅是流产，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移民的身体健康：

“二三十岁的年纪就有严重的腰痛。如果是意大利人，你会去关注他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扛多少垃圾下楼，最后一周是否搬动过家具。但他们，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这就是结果。”

比如很多人得肾结石：

“因为他们不喝水。他们认为喝凉水不好，但在那种工作节奏下，哪里有时间去喝一杯滚烫的绿茶？”

地下流产，腰痛，没时间喝水而得肾结石。

“有时来一些非法移民，付款的时候，从背心里或者袜子里翻出一卷钱，嘴里还问是否能找得开 500 欧元的票子。让人看见身上

带着那么多钱，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些贫穷的人，把所有的钱带在身上，是因为怕被别人偷去。这样，我看着500欧元说：当然，这是找给你的480欧元。”

我们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钱，那他是为了什么呢？

“我是一名医生。我更愿意治疗因劳累而得的疾病，而不愿意浪费时间，给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臆想出来的病开证明。”

一个累坏的中国人好于一个偷懒的意大利人。不能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吗？

年轻的中国犯罪团伙在壮大

米兰中国城的中心地位，当然不会逃过犯罪团伙的注意，他们像寄生虫一样追随着意大利的华人社团。

“他们很年轻，经常是未成年人。”姜明（音译）对我们说。

他曾经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现在是一周两期的《欧洲华人报》（*Europe Chinese News*）的总编，他的办公室就在萨勒匹路。

“他们扒窃，抢劫，敲诈勒索，总是针对我们中国人自己。问题是意大利法律让那些老实工作的人生活艰难，却对坏人没有办法。我们愿意出钱把这些人送回国，他们损害了诚实中国人的名誉。”

那些年轻的犯罪者，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倒不是因为数量。2006年，未成年中国人的平均犯罪率是每天2.4人，而意大利人是191人，罗马尼亚人是79人；同样是2006年，释放的意大利未成年人是251人，摩洛哥人65人，罗马尼亚人60人，中国人只有2人；2004年被起诉的未成年人总共有29476名意大利人，868名是阿尔巴尼亚人，83名是中国人。所以不是因为数量，而是因为

这些年轻的犯罪者凶残并疯狂地对待其同胞。汉学家科洛尼对中国的危险青年做过多年研究，现在在做文化中介的工作，他认为：

“还是少数现象，主要是那些来意大利时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中国城里那些可怕的孩子是在娇生惯养下长大的，他们有爷爷奶奶的宠爱，和父母寄回去的钱：

科洛尼接着说：“在我们这里，他们遇到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土壤滋生了中国青年的犯罪。”

2007年那次冲突的前几天，报纸头版报道，中国城一帮歹徒发生斗殴，死了两个人，认为是黑帮的报复仇杀等等。科洛尼在做文化中介的时候，正好认识他们“其中一个被杀的，叫周威（音译）”。

“这孩子瘦高个，不到20岁，头发搞得像艺术品似的凌乱，衣服随便乱穿，目光冷酷。”

不像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更像是一代人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来意大利的时候，已经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年轻移民。”

年轻的犯罪分子经常袭击米兰，总是针对中国人。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付不了意大利人，如果他们用中国人的口音威胁说“要包还是要命”，意大利人根本不会当真，而是把他们送到附近的幼儿园；另一部分是由于很多非法移民无法拥有银行账号，这些在萨勒匹路周边工作的劳动者，就成了流动的取款机；最后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人自己的信贷系统，在家里存放很多现金：

“前段时间，有一个犯罪团伙抢劫了尼阔里尼路（via Niccolini）的一个商人。”当地的一个年轻人对我们说。

“他们先去了商店，拿走收银台里的钱，然后让商人带他们去了家里，砸开墙上的灰泥层，找到了藏在里面的钱。”

他们有组织，坚决果敢，凶残冷酷，而且流动性非常强。如

我们前面所说，意大利对他们来说很小，即便是对那些不怀好意的流窜者来说，也是如此：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都灵警察局贝朗特监察员对我们说。

“因为威胁米兰中国商人的犯罪团伙，可以是来自普拉托、布雷西亚（Brescia）^① 或者都灵。然后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再碰到他们，他们没有地域根系：没有北方、南方、皮埃蒙特、伦巴第（Lombardia）……的区别。对他们来说，只有在半岛上各个中国城里保管的财富。”

2006年12月份，贝朗特的团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了1000多公里路，抓到巴尔杰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犯罪团伙：

“我们追踪的这帮孩子，以布雷西亚为基地。那天晚上，他们在罗马下车会一个朋友，为了返回布雷西亚，先去都灵，转到米兰的加里波第门火车站（Porta Garibaldi），去接头儿的女朋友，因为她正从西班牙坐大巴回来：对他们来说，距离根本不是问题。”

流动性强，冷酷凶残，经验老到。显然还不够：头儿怀疑到什么，告诉女朋友在远离火车站的地方接她，因为“周围可能有狗”。把警察称作“狗”真是很可爱，这些“狗”比他更快，根据手机的电子记录，在会面的前一秒钟结束抓捕：

“几个小时前，那女孩在电话里开玩笑说：‘如果你不来米兰接我，我就让他们逮捕你。’她没想到我们就在那里。”

都灵警察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破获了由这些年纪很轻的犯罪分子组成的犯罪团伙，其中最大的只有23岁，他们在意大利到处流窜，带着抢劫用的器具：对讲机、打包胶带和铁棒。在布雷西亚的公寓里还发现四个未成年人和三把备好的手枪。中国城的地霸虽然年轻，但不含糊：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把他们抓住之后，我们对牢房进行监听。”贝朗特接着说。

“有两个小头头，是孪生兄弟，很难分辨清楚，两个人凑在一起谈论下一个计划：出去后要劫持一个商人的儿子，砍下一只脚索要赎金。”

姜总编说过：“不知道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看到他们被驱逐出境。”

“不在萨勒匹，在伽里亚酒店见”

不良青年是少数，斯蒂文·罗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要引领新的风尚。我们电话约他见面，本想在“萨勒匹和布朗曼特的交汇处”，他却先声夺人，“明天在伽里亚酒店（Gallia）大堂见。”我们从阿类色原阿尔法汽车厂的场地，开始我们的米兰之行，最后来到20世纪70年代的原足球市场纪念馆。在这里，曾经决定意大利足球明星保罗·罗希（Paolo Rossi）继续留在维琴察（Lanerossi Vicenza）踢球，还是转到尤文图斯。斯蒂文把自己埋在一个很大的沙发里，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但是今天的他，已经当了五年意大利中国小姐选美比赛的管理者和组织者：

“需要开放的态度，需要展示我们中国人有魅力的一面，因此，我认为选美比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的“意大利小姐”总是从父亲传给女儿，从老米里亚尼（Mirigliani）传给小米里亚尼；而“中国小姐”，却是由一位25岁的年轻人加冕。我们问他，他的家庭是如何来到意大利的，他说：

“跟大家一样，最开始是我父亲作为非法移民洗盘子，然后是我母亲，最后是我。”

斯蒂文时间不多，所以看到他坐在沙发的边上，焦躁不安，

一手攥着黑莓手机，一手不停地扶眼镜框：

“不用奇怪，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从低处开始，上升到高处。你可以从厨房、工厂或商店起步，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来。”

他没有停下来，每年的7月中旬，威尼斯赌场的卡-诺给拉（Ca'Noghera）会挤满中国人，最后15名选手角逐意大利的中国小姐：

“搞这个活动我一分钱不挣，这不是我的生意，我做这件事纯粹是为了交流。我和我的员工们一起拉赞助，最后我们能够收支持平。”

斯蒂文·罗手下有很多员工。如果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就值得一个会面，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又一个中国小伙子，给我们上人生哲理课，在商店后间悟出的世界观。但他刚刚25岁就拥有五家企业——三家在意大利，两家在中国——所以他经常奔忙于上海和米兰，打理意大利时装在东方的秀场和这边的客户。听他说起来这些都没什么，这大概是遗传的性格：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有做生意的天性，还有很强的责任感。”

“在意大利，年轻人都被电视真人秀给毁了，他们在浪费青春。”

说这话倒像是个老古董。然后又加上东方智慧的嘲讽：

“在中国，真人秀教你做生意：最高奖赏是跟大企业家的一顿晚餐。”

斯蒂文住在米兰，但每年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世界的另一端度过。他对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对比，不仅仅局限于电视节目：

“你们评论我们的政治，就好像是‘共产主义的木乃伊’，但你们没有发现吗？贝卢斯科尼刚开始从政的时候，北京刚刚结束

邓小平时代。之后我们那儿一切都变了，而这里却重返贝卢斯科尼。”

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个复合体，他们会说多种语言，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人把他们称作“香蕉人”，黄色的外皮，白色的内在。但是，如果说他们受居住国的影响有多大，似乎他们对我们的民主并不十分认同：

“对不起，经常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空壳。”“中国小姐”的老板简略概括地说。

小罗一帆风顺，在中国锻炼了心智，在米兰读了中学、职业学校和两年的经济：

“可惜没读完，因为有太多事情要做。”

他一边跟我们谈着，一边接着电话，交替使用着中文普通话、意大利语和浙江方言。在我们分手告别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是否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融合。钱，钱，钱。一切时间都是生意。

“作为中国人，我果敢执著，有工作能力。米兰教给我市场的价值和如何劳心：未来不属于那些在厂房里搞生产的人，而是属于那些把意大利商品带到中国市场的人。”

不知道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①怎样评价这个小伙子，非常中国化，非常米兰化，把世界当成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他很高兴，总算说服了父母：

“这些年，他们一直把我看做另类：在我们的文化里，工作首先是自我牺牲。看到我很享受我的工作，他们非常怀疑。”

妈妈在马尔凯（Marche）^②做鞋，爸爸在布里安扎做泳衣生

① 意大利现政府的经济和财政部长。

②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行政区。

意，他知道自己属于不同于父母的一代人：

“你们意大利人只看见中国人在萨勒匹路及其周边活动，但我们年轻人早就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再也不会掉进廉价劳动的陷阱：现在我们明白了，头脑比劳累更重要。”

以这样的速度，不知道五年后他会在哪里。

“怎么会不知道?! 五年以后，我将拥有自己的意大利时装品牌，在中国销售。”

时装，选美，意大利，中国……世界是属于他的。就像那奢华的伽里亚酒店。



第7章

如果老板是中国人

——关系非常重要，这是做生意的秘方

海尔家电，一个无名的巨人

第一位出租车司机，从帕多瓦^①火车站开始，开启导航系统，寻找街道地址，他对海尔那个名字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后来隐约记得，在给他的俄罗斯妻子找工作的时候，似乎给那里投过简历。第二位出租车司机，下午来接我们回去，也强不到哪儿去：

“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是做头盔的？我年轻的时候爱骑摩托车，好像有这么个品牌……”

一点不沾边，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海尔在意大利东北部这个不大的范围内，即便有一个工厂，也没人知道。更别说在其他地方了。但它却是个巨人，家电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它的出生地在中国山东，当所有人都把工厂开到它的家乡时，它却一意孤行，或是远见，或是疯狂，把工厂开到意大利。这里一个工人的成本是那里的十倍。在这一章

^① 帕多瓦 (Padova)，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属于威尼托行政区。

里，我们要讲述来我们这里投资的中国企业，海尔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后面还有许多这样的反论和惊奇。他们把处于危机的意大利企业重新扶植起来，跟当地的企业主进行合资，让企业重新开门营业，意大利人很愿意去他们那里工作。

对于像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那样的近视眼，在他第一次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长的時候，曾经想说服布鲁塞尔用关税挡住远东的商品。他最近的一篇文章《担忧和希望》指出，2001年12月11日是欧洲走向灭亡的开始，因为那一天北京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此开始了商品和人员的“入侵”。摘掉眼镜，凑近了来看，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没意思的那一部分。

我们前面说到海尔，虽然是家电行业的铜牌，却鲜为人知：逆向投资，颠覆经济全球化的规律。你们可以做个调查，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巨人的名字。它从青岛起步（跟著名的中国啤酒——青岛啤酒源于同一地方），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有300亿美元的营业额和5万名员工，在160个国家设有销售网点。也许情况在变化，我们看见一块路牌，指示去往海尔工厂的道路，工厂坐落在坎坡多若（Campodoro）的一片凄凉荒野里，距离帕多瓦半个小时的车程，路牌上写着“奥运会官方赞助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秘诀就是：干活，干活，干活，形象随后。同样的模式，被许多决定征服“懒惰的”意大利的中国企业所采用。带来投资，带来就业，带来一种在“衰败的国家”已被忘却的乐观精神，一如《纽约时报》所描写的那样。

中盛光电也在意大利

用杏仁眼来看意大利半岛，这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只

是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和激情去利用它们了。在最近的新闻里，北京瞄准了意大利的太阳能产业。位居世界第三的光伏发电系统生产商中盛光电集团，总部在中国泰州，并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国设有分公司，于2008年4月跟意大利一家大型集团签订了巨大的供货合同，当年年底在意大利建设一个大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几天前的新闻里说，长沙的重工业企业中联重科，想要收购CIFA，一家位于米兰附近塞纳哥（Senago）的生产混凝土搅拌机械的欧洲领军企业。几个星期前，远东买主感兴趣的主角是都灵汽车业的悠久品牌Carrozzeria Bertone（意大利博通汽车设计公司）。

这几个月将决定阿斯科利造纸厂（Ascoli）的命运，竞买的有三家，都属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个主权财富基金，拿美国银行当早餐吃”。这些不是插曲，而是趋势，节奏可能已经以周计算了。

“2004年，在向我们投资的国家中，中国排第33位；2006年，已经排第10位了。第二年又提前了一些。”意中基金会（Fondazione Italia Cina）市场及研究中心主任罗森达尔（Thomas Rosenthal）对我们说。该组织由罗米蒂（Cesare Romiti）发起并担任基金会主席，宗旨是加强双边的了解和贸易。

那些逆向投资的企业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海尔的意大利总经理阿布里茨奥（Francesco Albrizio）开始说，并按亚洲人的习惯双手递给我们名片。

“在这里，中国人只有我的助理和15名短期实习生。”

还有在进门处两块一样的钟，标着“这里”和“那里”，相差

七个小时。他们投入资金，保留当地人员。

“他们在（20 世纪）90 年代末搞明白了，要征服世界，应该经过欧洲。”

为了试探行情，他们派出一位生产经理，更像是一个旅行的推销员，来到古老的欧洲大陆。他说着乱七八糟的英语，拿着一本用旧了的样本手册，全是中文，想说服大型经销商的主管，销售那些谁也没听说过名字的冰箱。

“2001 年，他们决定动真格的了。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他们选定 Meneghetti，一个处于困境的冰箱生产企业。为什么选择意大利？因为我们是家电产业的发源地。准确地说，我们曾经是家电生产的强国，现在 Ignis 是美国人的，Rex 是瑞典人的，Zanussi 不存在了。但是这个环境还保留着家电生产的能力。”

海尔带着亚洲产品的坏名声，向上爬坡：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颠覆众人的传言：中国货价格便宜，质量差。没有品牌的作用，我们开始开发一个产品，让产品自己说话。结果这款冰箱赢得了红点设计大奖（Red Dot Award），欧洲一个重要的设计奖项。”

一款真正的全球产品：

“在中国构思，在德国设计，完完全全意大利制造。”

与利益相抵偿的是一种美德，用十倍的成本养活 120 个家庭。

董事会的孔夫子：不表现在面上的发号施令

孔子提倡谦虚精神，发号施令但不表现在面上。和记黄埔意大利 3G 公司（H3G）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 320 名高管中，没有一个中国人。”



H3G 的手机集团总经理诺瓦里（Vincenzo Novari）说，H3G 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设代表，对于 60 亿欧元的巨额投资来说，这是最近十年意大利得到的最大外资。管理的链条不长。

“我每天跟霍建宁通话，他是李嘉诚的左膀右臂，李是上级母公司和记黄埔的老板。每天的电话都是这样开始的：‘有什么好消息给我听吗？’问题可以在五分钟内解决，或者拿出所有必要的时间去解决。其他的时候我们完全自治，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的。”

从诺瓦里兴奋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文化，有时候问得特别细，我回答不上来。”

他们特别关心人：了解到诺瓦里喜欢吃虾，每月他去伦敦参加分公司高管会议时，都用不同调料为他烹制虾。他们还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他开一辆 Smart 汽车，认为以他对公司的价值而言，这辆车不够结实。他们还认识了他的家庭，经常询问他孩子的情况。总之，他们有点像我们意大利南方人那样讲关系，人际关系是良好合作的必要条件。

“当他们聘任我的时候，对我说：‘能力和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那就是：信任。’”

用血写成的誓言，是唯一可以让远在 1 万公里以外的投资者睡踏实的。到目前为止，合作得很好。2008 年 3 月底，李嘉诚迫于媒体的压力，承认可能出售意大利分公司，而转向其他投资，虽然此时盈利已经指日可待。有很长一段时间，母公司想投资我们的港口。

诺瓦里证实：“据说是 20 亿美元，投资塔兰托（Taranto，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焦亚 - 陶罗（Gioia Tauro，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尖

端) 或者玛勒给拉 (Marghera,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靠近威尼斯)。后来, 在三年的会谈中换了三个总理, 还有大量的申请批准要做, 他们泄气了。”

跟大海打交道的人, 从痰盂到体育比赛

意大利的码头并不觉得缺少中国人。在那不勒斯, 集装箱主要是中国远洋公司的, 它是世界上排前几名的船主, 1995 年和德里亚斯特的科苏里驰兄弟公司 (Fratelli Cosulich), 以相等的股份组建了一个公司。资金各投一半, 但人员上并不对等, 90 名员工中只有 4 名中国人。搬运集装箱的是科纳泰科 (Conateco), 中国远洋公司和瑞土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 各占 50% 的股份, 提供 700 个工作岗位, 最近几年投资 6300 万欧元, 强化那不勒斯码头的吊车和基础设施。2006 年决定建设莱万特码头 (Levante,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西南端, 濒临利古里亚海), 这是业内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 总金额 4 亿欧元, 其中科纳泰科出资 2.18 亿欧元, 其余的由金融市场募集。首席执行官雷格拉 - 德费鸥 (Pasquale Legora de Feo) 说:

“这个项目能够直接提供 500 个、间接产生 3500 个工作岗位。”

但这个项目谈了快十年, 书面文件都准备好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紧急情况, 不断向后推迟, 中国人也许应该重新规划意大利港口的地理策略。

在工作上, 合作共处的质量, 跟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趋势在上升。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中远热那亚公司的高管穆兹奥里 (Luca

Muzzioli) 回忆说,“我们的中国同事单独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关在里面抽烟,还有一个痰盂。中午12点准时吃午饭,然后要午睡一会儿,哪怕是坐着睡,晚上6点钟准时吃晚饭。”

就这些,他们跟当地人的际关系几乎没有。后来,他们的祖国越是得到发展,这些来到国外的人就越是表现出自信。

“现在,他们愿意待在我们的开放空间里,跟下级促膝谈心,他们很少有抽烟的,对体育和新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们想打造和谐的办公室文化:“运用家庭公司的策略,关心个人生活,参与欢乐的聚会。”

不管是自然的还是刻意安排的,重要的是很有效果。

在这里,唯一的“文化冲突”是当中国人邀请意大利同事去中餐馆吃饭。他们点菜单以外的菜,可能是某个地区的特色菜,而菜单上的是给西方人准备的。不过那些特色菜,对于我们的口味来说,实在太难吃。

“不过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信任感,他们能够原谅我们有时谢绝他们的好意。”

当他们的妻子在夏天或者假期来到这里的时候,会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他们在家里做的菜不像餐馆里那么复杂,倒是更接近我们的饮食。但是禁忌还是有的。他们从不参与谈论国际政治:

“根本不可能听到他们评论自己国家的事情。”

但他们似乎很乐意去听关于意大利的右派和左派,维尔特罗尼(Walter Veltroni)^①和贝卢斯科尼的辩论,“还有热那亚球队和桑普多利亚球队(Sampdoria)的比赛。”

^① 意大利民主党(PD)领导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地球人！”

在许多打压中国工业名誉的说法里，有这么一句：他们只会抄袭。

“那已经过时了，”意中基金会的萨沃纳（Bruno Savona）反驳说，“要把他们刚刚登陆意大利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区分开来。在第一个阶段，他们把重心放在数量上；第二个阶段，关键是质量。”

意中基金会的发言人加上一句外交辞令：

“他们知道他们的局限性，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我们的创造性。不是偷窃思想，而是通过学习来开发创造性思维。”

他也认为人际关系很重要，“丰盛的晚宴，喝很多白兰地”可以增进感情。在创新方面，萨沃纳提到华为和联想。

华为创建于深圳，生产调制解调器和通信设备，7万名员工（如同微软），把相当于10%营业额的资金投入研发，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四。

“在意大利，”华为的发言人说，“最近两年，我们的增长率是200%，70%的员工来自当地。”

联想在2005年收购了IBM个人电脑。关于国际性，发言人赞贝利（Renata Zambelli）这样说：

“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地球人！”

资本金（47%）来自于香港，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和其他高管们说的语言是中文。

“我们把总部搬到了纽约，决策者是意裔美国人比尔·阿梅里奥（Bill Amelio）。我们从中国走出来了。”

他们保留了所有的实用主义，阿梅里奥本人也是倾向于全球采购的：谁有能力就用谁，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中国、印度、美国、意大利……地理位置只是选项。但在技术的赛场，还是美国比中国能出更好的成绩。

特雷蒙蒂，中国龙和温驯的欧洲

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传奇的。如果一个企业能增加效益，流失一些国有资产也没关系。他们是很实际的人，比我们更加世俗，没有我们傲慢。宝钢在意大利热那亚分公司的副董事长马拉卡尔扎（Mattia Malacalza）也这么认为。

“我们意大利人饱受‘面条综合症’的折磨，以为只有我们有好吃的食物。其实差异可以使我们更加丰富。”

占51%股份的中国母公司，是世界第五大钢铁生产厂。

“但行为举止更像个学徒工，愿意学习，而不是自大。”

马拉卡尔扎说，那种认为中国企业将停留在简单工业的水平做不到领先的想法，只能是幻想：

“没错，上海浦东的磁悬浮高速列车是德国西门子设计的。但整个项目都是在中国运作的，德国人只是指导。可以肯定，上海和北京之间每小时超过300公里的高速列车，当地企业的角色将会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怎么做了。”

在利古里亚（Liguria）的省会，目前他们只设立了一个商务办公室。

“这不是秘密，我们的母公司已经表明，他们有兴趣建设一个轧钢厂。当然，如果罗马能提供一些激励政策……”

经济权威特雷蒙蒂认为，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他的畅销书

《市场主义》所攻击的对象，如果用图画来展示，图里的人物应该长着杏仁眼。这位经济部长说：

“如果全球化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发展，中国龙将控制温驯的、‘彬彬有礼的’欧洲，而且还会得到欧洲的认可。”

不知道诺瓦里、阿布里茨奥、雷格拉-德费欧、马拉卡尔扎和其他人是否知道，自己正在帮助闯入家里来的“匈奴人”。见证杂文作家特雷蒙蒂面向未来的，是他的《新标志，新图标，新图腾》，以“流行音乐、说唱音乐、牛仔裤”开头。但这些已经不是现代化制造的最新事物了。

复活的贝纳利学说“你好”

问问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贝纳利公司（Benelli）的工人和管理者，他们怕不怕中国龙。三年前，似乎是很久以前，最后一任老板梅隆尼（Merloni）认为工厂没救了，决定卖掉它。那时有四十几名员工，是过去几千名员工留下来的幸存者。日本赛车加剧了贝纳利的危机。一次次的转手，使这个佩萨罗（Pesaro）^①的企业越转越慢，市场占有率越来越低，人也越来越少。直到钱江集团进来，它是中国生产摩托车的第三大厂家，产量巨大，平均每年生产120万辆摩托车，不过质量上还需要完善，因此有兴趣跟佩萨罗人结成良缘。

在谈判的时候，钱江的头号人物林华中坚持一点：

“工厂必须留在这里，必须要有意大利人工作，我们需要的是人、文化和设计。”

^① 位于意大利中部，属于马尔凯行政区。

嫁接成功了，企业从病态中恢复，用自己的腿行走，很快将重新奔跑。贝纳利曾经每年平均亏损 900 万欧元，2008 年年底达到持平。本来是可以提前达到的，只是因为沟通失误，中国母公司的供货迟到了很久。

资金方面已经很充足，但文化方面还在磨合期。谁也没有预见到会有“火星老板”。在公司里，消化了被拯救的欢愉之后，员工们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想到开设中文课程，学习基础语言，以及了解“另一个星球”的同事的文化。管理层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积极，因此，他们自费，在下班之后，每周上两个小时的中文课。老师是佩萨罗和乌尔比诺（Urbino）大学的汉学家布雷泽（Alessandra Brezzi）：

“我们从 2006 年 11 月开始上课，现在已经快六个月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十几名学生，高管和安装工人一起学习，希望充实自己。”

不讲究形式，很少语法，基础中文。主要是了解中国文化，以便感知每天的对话者头脑里在想什么，避免说蠢话，做蠢事。

“我们教给他们怎样递名片。收到礼物不能当面直接打开，而应该拿回家再打开。以姓称呼对方是表示尊重。只能跟自己同级别的人讨论，跨越等级是不被赞赏的。还有很多其他小的要注意的地方，以避免无理或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学发音更难的，是意大利人如何适应这突然出现的心理转弯。

“为什么他们从来不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

确实很神秘，让我们的管理者苦恼。

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说是为了面子。不丢面子，这是中国人处事的基准。在征询上级意见之前，最好不说话，显得有点傻，但总比说了什么又被上级否定要好。明白这一点之后，关系

就变得流畅了。这样，每天早上，佩萨罗的工厂和浙江温岭总部进行视频会议时，如果对问题没有立即回答，他们知道，这跟通信的滞差延时没有关系。他们不再担心。扩编的事实更加鼓舞人心：在技术部原来只有3个人，现在是14个人，总算投资研发了。而意大利“北方联盟”书记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在2003年说：

“我们要被中国人搞死了。我们的企业怎么能跟那些使用‘奴隶’的国家去比拼？”

但如果没有他们，又会怎样？



第 8 章

中国人在赌场

——在绿色赌台上跟在工作中一样，
从不疲劳，而且乐观

大家都去威尼斯

海一般是下午来赌场，在梅斯特雷火车站乘 15 路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达。在美国，从东海岸的中国城到亚特兰大的赌场，有人靠搞运输赚钱。在意大利，只要一张威尼斯的公交车票，就可以让欧洲大陆人气最旺的赌场挣钱。

中国人干活，劳累，节省，投资，但很少有人能够抵御赌博的诱惑：

“不知不觉地，他们的人增多了，”威尼斯赌场董事长比泽加第（Mauro Pizzigati）说，“不过好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小心地培养客户。”

因此在卡 - 诺给拉（Ca'Noghera），威尼斯赌场在陆地上的分店，进门的时候有人用中文说“欢迎”；而在赌场对面的竞技场，仲夏之时有意大利的中国小姐选美比赛。有一段时间，威尼斯赌场在报纸上用中文做广告，在萨勒匹路排的版。最近几年，老虎机上装了龙头，向东方客户示好，给工作人员开设中文课程，教服务员和赌场

主持人用中文说“晚上好”、“谢谢”，还有“小费”。

威尼斯（Venezia）、圣文森特（Saint Vincent）^①、圣雷莫（San Remo）^②和坎皮奥内（Campione）^③赌场，是意大利华人常去的地方。威尼斯赌场的客户，主要是从威内托、艾米利亚（Emilia）和普拉托去的人；圣文森特主要是皮埃蒙特和米兰的人：

“我不去赌场，”一位都灵的商人说，“但在我的朋友中，我是唯一一个不去赌的。我妻子想去试试，但我害怕会上瘾。”

非常明智，住在波河附近的商人，35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得感谢自己有采石行业的能力，才能保住家和饭碗。

听他的老板讲，八年前他离毁灭只差一步：

“每个星期天到圣文森特豪赌，背上了1亿里拉（约合5.23万欧元）的债务。只是在老婆和孩子们来了之后，他才收住心，后来靠努力工作又重新爬了上来。”

除了干活卖力之外，中国人赌得很大。纸牌、转盘或麻将，痴迷者没完没了地玩，持续很长时间或很多天。有人玩21点到了有生命危险的地步，有人把赌桌当做消磨闲暇时间的地方：

“在梅斯特雷，我没有朋友，意大利语不好，所以看不懂电影。赌场是唯一可以让我放松、把脑袋倒空的地方。”

当我们走进威尼斯赌场的陆地分店时，海对我们这样说。

穿运动鞋，玩21点

威尼斯赌场实际上有两处：贵族厅在里亚托桥（Rialto）附

① 位于意大利西北边境，与法国和瑞士接壤，属于瓦莱达奥斯塔行政区。

②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西南端，属于利古里亚行政区。

③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波河平原，属于伦巴第行政区。

近，平民厅在梅斯特雷郊区的田野和厂房之间。豪华的卡 - 文德拉敏（Ca'Vendramin）面对着大运河，每年 4400 万欧元的营业收入。要找海和他的同胞，当然不在这里。

卡 - 诺给拉的新大厅结构大但土气，主料是透明的塑料，色彩灰暗，有很多客户，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喜欢玩纸牌、老虎机和转盘，每年营业额 1.7 亿欧元。穿运动鞋的战胜穿皮鞋的，穿短袖衫的赢了打领带的：平民这边的营业额是贵族那边的四倍，而且还在增长。威尼斯赌场每年总共 2.14 亿欧元的营业额，给威尼斯市政府——赌场唯一的股东 1.07 亿欧元，覆盖几乎 40% 的财政预算。

从威尼斯到梅斯特雷，从大运河到郊区田野，它们属于一个公司，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卡 - 文德拉敏遇到的是米兰的白领、印度同事、奥地利夫妇和香港大亨；在卡 - 诺给拉，灯光暗淡，环境非常平民化，没有服装要求，连穿衬衫的都很难看见。在这里，人们成群结队，而在威尼斯城里顶多两个人一对；在卡 - 诺给拉，即便输了也会笑；在卡 - 文德拉敏，就是赢了满贯 3000 欧元也不会动一下表情。不用说，海以及和他一样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大运河边上的赌场：

“我没有时间，”梅斯特雷的一个酒吧服务生说，“去威尼斯要坐火车和摆渡船。而去卡 - 诺给拉，只要坐公交车就行了。”

什么时候心跳，由赌场主持人决定

赌场里的中国人，多得可以造一座长城，那是中国人的防御工程：男人、女人、家庭、餐馆的富有老板或者简单的纺织

工人。意大利的中国人全在这儿，晚上商店一关门就来到这儿，或者早早地等着上午 11 点钟开门。押上几欧元，或者一把 100 欧元的筹码。无论是玩扑克还是转盘，中国人在赌桌上也是一样的固执：感谢他们的贡献，威尼斯赌场以 100 万人次的流量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赌场，超过蒙特卡罗以及斯洛文尼亚的几个大赌场，虽然他们在奋起直追，联合拉斯维加斯，但目前还没有得逞。

还要感谢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神秘，大量的能量和大大的问号：喜欢劳累和冒险、在赌桌旁坚守的中国人，是连续缝制 12 个小时，或者炸了几百个春卷、身上带着油烟味的中国人。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他们像蝗虫一样咬住我们的舒适生活；但对威尼斯赌场来说，他们却是不同的资源：在威内托，他们只有不超过 0.4% 的人口，在赌场却占到 12%。

在卡 - 诺给拉有如此多的中国人，一个赌场主持人对赌桌上唯一的意大利人开玩笑说：

“我们这儿可是在中国，您带护照了吗？”

前面坐着六个人在玩，背后是六个亲戚在助威，他们来这儿押点，来这儿期望，来这儿开心：

“他们是理想的客户，”年轻的赌场主持人说，“跟意大利人相比，他们赢钱的时候更高兴，输钱的时候不闹事。”

酒吧服务生也确认：“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为了不分散注意力，中国人只喝汽水或橘子汁。”

运气好的时候高兴，运气坏的时候平静地接受现实，中国玩家专注地押宝，听从命运的安排，如工作人员所说，他们从不反对赌场主持人的裁决。海也是个心平气和的人，他开始自如地讲起他的赌博经历，似乎坏运气总是伴随着他的工作和娱乐：

“我来这儿玩已经三年了，只玩转盘，总共我输掉了至少 1 万

欧元。”

他用费力的意大利语对我们说，但对赌博的行话却了如指掌：

“我一般押六牌自动胜（*sestina*）或四张同点（*carre*’）。以前我很轻松地玩 100 欧元，现在即使 5 欧元我的心跳也会加快。”

他比划着心跳的样子：期望，激动，害怕又会输掉。至此，关于中国人，我们已经接触了许多事情，见了许多面孔，听了许多故事。但只有海的失败，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心跳。

一个另类中国人的危险计划

海的故事实际上比他这个人更有意思。赌了，输了，再赌。周围站满了昂首挺胸的意大利人，激动的中国人推搡着挤了进来，生怕错过赢的机会。他们喜欢 21 点，不太喜欢老虎机，总是一帮人一起来。还有女士们，她们不接受次要的角色，积极参与，一直玩到深夜：

“有些同事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在赌桌上太活跃，”一个赌场主持人对我们说，“中国人的优点是，从来不向我们这些掷球的或发牌的人撒气：意大利人如果连着输上几次，就会骂人了。重新赢钱之后再向你道歉，说他骂的是球，不是扔球的人，但总之他冲你说了；如果运气又走了，过一会儿又开始骂了。”

中国人没有：

“最多是起身离开，或者以他们说意大利语的方式问：你什么时候下班？”

海等了很久，希望能有一个赌场主持人让他的转盘转得正一点：来意大利已经十年了，但是，让许多他的国人富裕起来的淘

金梦，从他身边走过，却没有把他吸收进去。他告诉我们，自从来到意大利，每天在餐馆或批发店工作12个小时。但多年的劳累之后，他没有攒下钱，每月还在挣700欧元。

海是个典型的好小伙，可惜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他是一个正派的中国人，可惜生活在一个看重别的才能的空间和时间里。他大学学的是经济，在青岛生活过。青岛是北方城市，离北京八个小时的火车。倒霉的是，他有两个深爱着的父母，来自青田，不安宁的浙江省。父亲对他说：

“你还在这儿做什么？你没看见你的堂表兄弟们都到意大利发财去了？”

这样，海也踏上了堂表兄弟们的路，但他们虽然有一脉相承的血液，却没有一样的头脑：那些一直生活在浙江、从小接触商业的人们，学会了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出人头地、战胜他人的商业能力；他从小就离开了浙江，习惯于北方缓慢的节奏，那种惰性让他怀念银行的工作：

“上午读读报纸，下午数几个小时别人的钱。”

来到意大利，海跟其他所有同乡一样开始打工的行程，哪个亲戚能提供一份工作就到哪里去：开始在博洛尼亚（Bologna）^①的一家餐馆洗盘子，给厨师打下手；然后是在罗马的一家批发店做了好几年装卸工，把装满手表的大口袋，从普瑞内斯蒂娜路（via Prenestina）的仓库搬到维多利亚广场（Vittorio），半个欧洲的中国商人都到那里拿货：希腊、西班牙、法国、米兰郊区。在意大利，海是另类：抱怨辛苦——他指着前臂说每次扛包裹都会抽筋。对他来说，扛着80公斤的包裹，在罗马的街道上跑来跑去，都是些苦涩的回忆。他不去想什么发财，只是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属于艾米利亚-罗马涅行政区。

惋惜他的固定工作，父母无远见的躁动之心使他永远失去了这个位置。

现在重新开始：在梅斯特雷的一个商店工作，不同于他的同乡，他永远当不了老板，只希望攒够一笔钱能回祖国。为了这个目标他想出了一个不现实的办法：

“下个星期我要辞职。”他对我们说。

那你做什么呢？

“每天我来赌场，一个月30天，每天我赚20欧元，一个月就是600欧元，如果再有一些额外的收获，一年就足够让我回青岛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另外一个策略，也许，许多像他一样没攒下钱的中国人都有这个想法。

谁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这个富裕的东北部的明亮大厅里，假装快乐地玩着，实际上是在赌自己最后的机会。海的计划让人害怕：那是走向贫穷和不幸未来的完美计策。海，与其待在赌桌旁，为什么你不去安安静静地干一年活，然后回国？

“因为我的心很累，一个人不能连续十年，每天辛苦12个小时。我30岁了，我想有一点点生活。”

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人，在威尼斯赌场的赌桌上，治疗心灵疲劳。

在赌场，总算有人欢迎我们

离开我们的同伴和他的计划，抬眼望去，卡-诺给拉的中国人都很开心，他们总算是在一个不需要辛苦干活的地方。另一个原因是，在21点的桌台上或转盘上，即便说不好意大利语，也会

被尊敬地称作“先生”。姜明，《欧洲华人报》的总编，在他米兰的办公室里这样说道：

“对我们来说，赌场是尊重和融合的沙漠绿洲。我在莫斯科做记者的时候，城市里写满了难听的话，让中国人离开，不许中国人进某些场所，让他们回自己的国家。只有赌场用巨大的汉字写着‘欢迎!’。”

欢迎来到赌场。原因很简单：赌场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去赌，总是去赌，全都去赌，固执地赌下去。为什么？如此辛勤地工作，然后如此轻松地把钱扔掉？去问问特雷维索省威洛巴（Villorba）的企业主，他有了工厂、别墅和奔驰之后，开始豪赌，几个月之内输掉一切，又去向朋友和亲戚借钱。或者，问问布梭塔桥（Ponte di Brenta）的旅馆老板，他的漂亮妻子在不耐烦地跺脚，因为跟我们说话而输了牌。他们是卡-诺给拉的常客，但以前他们来得更加频繁：

“去年我们输了很多钱，我害怕了，因此我让赌场限制我们，每月只能来八次。”

最多八次，这也够多的了。

“一直是这样，”社会学家科洛尼解释说，“几年前，米兰黑车司机的最好客户就是中国人。他们在火车站上车，来到坎皮奥内或威尼斯，有时还让司机等一夜。”

另一个时代。现在赌博也资产阶级化了，没有了黑出租车，威尼斯赌场的停车场停着许多小汽车和SUV，很多车来自于很远的地方，车里孩子们在打瞌睡，父母轮流守夜：一个人玩，一个人在车里跟孩子们一起小睡。如此病态的、对赌博的痴迷，是从哪里产生的？

“大部分来意大利的中国人，家乡在中国的沿海地区，那里赌博之风盛行，”科洛尼继续说，“成功的商人对风险习以为

常，他们以乐观精神对待生活。中国人押宝，期盼运气：但他们不做计算，不研究排列组合，赢钱是对他们每天辛苦工作的补偿。”

但还是很奇怪，一个惊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怎么可以跟一个出众的败掉成果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一个家庭的父亲，常年不开暖气，节省费用，竟然能够笑着说：

“昨晚不走运，我在圣文森特输了 2000 欧元。”

别说话，由数字说话

对中国人来说，赌场是数字的圣殿。数字，不只是拿来用的，计算用的，加减乘除。数字还会说话，需要听懂它们的语言：

“有些数字是幸运的，有些，最好离得远一点儿。”

企业主王易群说，今天他玩加勒比扑克。

“如果住宾馆，最好避免带 4 的房间：14、24，等等。如果号码带 8 就幸运了。如果号码是 164，我肯定换房，因为这个号码跟说‘一路死’的发音一样。”

听说阿尔法 - 罗密欧汽车也知道这件事：在香港，把它的旗舰车型改名为 168，“一路发”，大获成功。

简而言之：4 不好，因为在中文里，它的发音接近“死”；8 好，因为它的发音接近“发”，发财的意思。4 和 8 的规则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在中国的一些大楼里，电梯按钮没有第 4 层。张家买的房子，是在都灵郊区一栋楼里的第四层，这肯定是融入意大利文化的表现。

在纳韦友（Naviglio）的特雷扎诺（Trezzano），离米兰很近，有人对融合并不感兴趣。即便是 1 万多公里的距离，那个迷信也同

样被感受到了：在 H3G 总部，香港李嘉诚跨国集团的手机业务公司，所有人都要遵守家规。虽然在意大利没有一个中国员工，但还是要适应这个规矩：不在每月 4 号做重要决定，客户量达到 400 万时没有庆祝，而 800 万时隆重庆祝了一番。

好与不好，8 和 4，在香港，这是一个信条，在特雷扎诺也差不多，在卡 - 诺给拉更是如此，即便有人否定了这种数字理论，但还是对此坚信不疑。海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胡（音译）把钱输光了，只剩下最后 20 欧元和一副拉得长长的脸。感觉像是要死了的样子，那就押“死”吧：

“全部押在 4，只见那球转，转，转，正好转到那里停住：胡赚到了他从未有过的大满贯。”

看来数字也需要讨好。

事实上，数字和赌博，在中国人之间并非意见一致：很多中国人喜欢赌博，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很少赌博。鲁国庆医生，我们前面遇到过的那位心病科医生和针灸专家，他不赌博。毛强，来自南京的工程师，在意大利生活了 20 年，他也不赌博。他们似乎代表另外一个中国：努力工作，从不高声说话，不拿幸福换钱财；如果去佛罗伦萨，更愿意去看艺术，而不是皮革作坊。

当我们跟毛谈起赌场的事时，他对此不感兴趣；当我们问他，为什么在中国数字 8 如此成功，而数字 4 却备受虐待。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是因为我们遇到的人不对：

“那是从香港传过来的一种迷信，现在都说那是传统，其实跟我们的历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数字 4 是很受尊重的，因为它代表完整和对称。”

毛工程师还记得在热那亚大学读书时物理教授的名字，他对数字的认识，基于它们的内涵，而不是它们的谐音。当工程师讲

述单个数字的数学性质时，我们想起来，在意大利的学校里，中国学生所具备的一个才能，就是数学才能。后来毛说，在东方传统中，唯一重视的是单数和复数的区别：

“因此，送礼不能送一个礼物，要成双：晚宴带两瓶酒，给老婆送两枝花，如果你没法送儿子两台电脑，就同时送给他两样东西：一台电脑，和一块糖。”

自设赌局

有的赌博，是在商店后间进行的，外面有人放哨，地下赌博的赌资在迅速旋转着。海告诉我们，在他干了三年的罗马批发店，老板们“有钱，尤其是有时间。我们在那儿装卸货物，他们在那儿玩牌。总是这样。直到有一天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搜出两万欧元”。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媒体经常会添加一些违法犯罪的气息，牵扯上黑帮势力。

但我们应该弄明白：

“中国人好赌，包括地下赌博。”

罗奇（Osvaldo Rocchi）对我们说，他是米兰外国人犯罪科的负责人。

“有时候是在晚上餐馆关门之后，或者是在私人住所，或是某些游乐场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朋友之间玩，没有高利贷，没有吸食毒品，也没有妓女。”

所以不牵扯黑社会，没有冷酷的清算。违法是很普遍的，但仔细了解，似乎强度较低：

“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因赌博欠债而动刀子的事情。”都灵监察员贝朗特说。

“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现在更多地是在家里玩，而不是在餐馆，玩的人给提供客厅和食品的第三者支付一定的打扰费。”

因此，小小的家庭赌场应运而生。

那些缺少条件，或者没有时间，或者不想跑路的人，就在自家的小屋，或是商店后间聚赌：

“有时候他们请我去吃晚饭，”调查员说，“吃完了，喝完了，再聊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时候，同桌的人开始不耐烦地东张西望。直到有人低声对我说：‘他们在等你离开。’”



第9章

普拉托，中国人最多的 意大利城市

——艰难融合的故事

下雨了，中国贼

从普拉托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在施工，公交车司机发泄着不满：

“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不仅把我的车颠坏……还会把我的腰颠坏。”

不平的路面只有一段，接下来的路在修。至少市政府有事做了，投资基建，一位乘客低声说。

“还不如投资加强警力，好好管管皮斯托耶泽路。这里如果没有他们，那就是天堂了。”

从佛罗伦萨乘火车 20 分钟到达这里，不过两分钟的光景，“黄色危险”就爆发了。不用点火，自己就燃了起来。当然我们不是消防员：

“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比方说交税，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位四十几岁、看似平和的人气愤地说。

“还有随地吐痰，这些人来自荒蛮地区，在这里就像是在他们自己家里。”

不过他们也做了点好事，带来活力和工作……

“如果没有他们，这座城市就像死了一样，但有了他们，这座城市也活不下去。”

这是他的原话，很多意大利企业因为害怕被抄袭都逃走了。

“再说他们也只会抄袭，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设计师。”

我们的司机确信地说，但他却没有听说过计文波这个名字。2007年在米兰时装节上，他的一套设计灵感来源于兵马俑的系列服装，引起轰动。同样他也不知道多次获奖的设计师刘薇，以及其他十几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设计师。

不过他非常坚信自己的观点，说他们人太多，需要派军队来维持秩序，来恢复整洁，让地下加工厂遵守法律。他确信，等地方政府想采取行动的时候，已为时过晚，现在说像他这样的人是种族主义者，等移民可以投票选举的时候，他们连市政府成员的位置也会抢走。我们到站了，结束演讲。如果没有他们，我敢打赌，生活会向他微笑……

皮斯托耶泽路，浙江某地

现在我们就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区域走一走。中国城的主街道是皮斯托耶泽路（Via Pistoiese），这条街上几乎没有一户不是中国人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这个区域已经扩大到北边一条平行的街道费理兹路（via Filzi），以及所有中间的连接街道，而且还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张。生意从一个无名的小广场

开始，它的特点是有几排光秃秃的墙，长久以来成为张贴各种广告启事的大字报墙。

墙上贴满了写着汉字的纸片，我们唯一能看懂的就是电话号码。新来的人到这里翻阅启事，可以找到住处和工作，还可以找到二手自行车、家具、按摩店等等。在少林市场（音译）的橱窗里，有四个电子屏幕滚动着广告启事，这个超市里还有两个巨大的水箱养着活鱼。

“发一条广告要多少钱？你们得去上面问西联（Western Union）。”收银员告诉我们。

隔壁的西联是做汇款业务的，这项业务也是当地的一大行业。其实就是“地下钱庄”。那些在官方记录中不存在的人，非法移民，到这里来，出示护照和钞票，就可以把钱汇到他们在中国的账户或熟人那里。

“我们的手续费是，汇 1999 欧元以内的 12 欧元。”店主告诉我们。这时，闭路监控探头拍摄到一个中国人，交给收银员一大包钞票。店主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繁忙的办公室有多大的交易量。税务稽查署估算，每年大约有 5 亿欧元从普拉托流向中国。

我们游荡在连接两条主要街道的小巷子里，碰到金鹿（音译）糕点店，专做婚礼用的，两米以上的大蛋糕。不远处是费理兹路的邮局，因其所处的位置，每周有两天安排一个文化中介给中国人解释如何寄挂号信、邮寄包裹等等。还有许多手机商店，其中一个兼做旅行社业务，虽然只能通过网络预订机票。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这里的服务让他们省了很多事。在一个草药店的玻璃门上，挂着一块计算机打印的牌子：

“马上回来。手机：333……”

意大利商店根本想不到这么做。而这里，生怕喝口茶或活动

一下筋骨的工夫，丢失一个客户。

有时候功利主义比伦理道德更能使人们和谐共处，艾楚斯卡（Etrusca）药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 Pam 大超市的对面。超市的促销标语写着“更加便宜”，似乎正合中国消费者的心意。

多语种药店的全套服务

“一定注意，写清楚了，是饭后服用，不能空腹吃。”药剂师一再叮嘱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翻译。

因为这些中国人已经有很严重的胃溃疡，如果空腹吃药会有得胃穿孔的危险。听了翻译的话，病人点头称是，付完钱离开。轮到下一个，还是中国人。

“病人都是一样的。”布兰迪医生（Gennaro Brandi）说。

他认为，那些被他的大部分同行所怠慢的中国人，跟其他病人没有两样。

20世纪90年代，当这里的中国人开始增多的时候，曾经有两条路：一条是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形成“围困症”；另一条是调整自己，利用新人群所提供的机会。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只能孤军奋战。六年前，他决定提高服务质量，聘用两名中国店员，专为中国客户服务，因为那时中国客户已经占到40%。

“记好了，都是合法聘用，但却不怎么顺利。”

最早的两个人，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递了辞呈。

“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据说的不喜欢固定工作，他们认为打黑工挣钱更多。尤其是他们的父母，认为做固定工作是不思进取。”

在这次意大利的中国之旅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马泰拉的陪同也经历了同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邮局需要雇用一名外国人给移民做语言翻译工作，每天工作三小时，700 欧元一个月。他把这个工作推荐给本市唯一一位大专毕业的中国人，而这位 20 岁的年轻人奇怪地看着他说：

“不，非常感谢，可是不喜欢坐在柜台窗口后面的工作。”

事实上，他跟小他两岁的妹妹一起开了一家服装店。700 欧元对他来说太寒碜。最后，我们的陪同把这份工作介绍给儿子的女朋友，一个法国人：

“反正她也是个外国人。”

我们再拉回到世界主义者，艾楚斯卡药店。即便是合法的中国移民，找社区医生看病也是很罕见的。就算他们知道申请流程，但还是厌恶等候排队。药店的优势就在于快捷。而且这间药店还有人会说中文。我们的药剂师，体格像帆船运动员，肤色是阳光褐色，他说：

“在我们卖的‘奇怪’东西里，有很多打点滴的药水，因为根据中医，修复体液是对许多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

站在他身边的漂亮妻子，则赞美他们老客户的孩子们聪慧好学：

“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学习好。”

布兰迪医生继续说：

“他们很多人有胃病，一部分是因为饮食习惯，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极度紧张。还有呼吸问题，支气管炎和过敏。”

如果柜上的药不能解决问题，就让他们去十米开外的多病科综合诊所。这样的操作，效果令人非常满意，亚洲人排着队到那儿去看病。

工业协会的吉佩尔先生：从底层到宫殿

一座三层小楼和一个厂房，像是一座记载历史的工厂。这就是吉佩尔（Giupel），它的创始人徐秋林是第一位（至今也是唯一一位）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在前台接待处，橱窗里陈列着最新款式的皮衣，上面是哈利·戴维森（Harley Davidson）的画像。另一面墙上，镜框里装裱着一张当地报纸：“吉佩尔和钱皮总统（Ciampi）在中国”，报道意大利前总统访问中国时的新闻。值得骄傲的数字有：1100 万欧元的营业额，一个由意大利人和亚洲人组成的工作团队。

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徐秋林用手敲打着路易 - 威登（Louis Vuitton）的记事本。他 42 岁，虽然近乎一半的岁月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但意大利语说得马马虎虎，他的履历比他制作的上衣要传统得多。他来自于温州，父亲是一家汽配厂的头儿。他曾经在餐馆里打过工，后来学会缝制服装和皮革，转战于佛罗伦萨、佩鲁贾和普拉托。开始时替人加工，给贝纳通和许多著名的意大利时装公司加工，疯狂地工作和拼命攒钱。十年后拿着攒下的钱，想着怎样能赚到更多的钱。他根据不同人种的特长，把工作分割开来，这种做法在行业里确实是独创：

“意大利人在创作灵感和市场方面比较强。中国人做工精细，动作快而且安静。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有我们今天的发展。”

当他第一次把这种思路说给他的合作伙伴们听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

“你疯了吗？那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钱多，干活少。”

幸亏他没有听他们的。2000 年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聘用了

意大利人。各项纪录似乎都令人振奋：他成为第一位进入手工业联合会（Confartigianato）的中国企业家。2004年还加入了普拉托市的工业联合会。从社会底层上升到上流社会，但他并不想过舒服的日子。

“我的回报是什么？是做很多广告，跟许多大企业家交朋友，被邀请参加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馆的宴会。”

这些是他现在的平衡。不好的声音在说：

“其实，从来没见过他去过瓦伦蒂尼路（via Valentini）的协会大楼”。

尽管非常看好他过去的成绩，但他的行为没有追随者。

他不在意，在上海郊区又开了一家工厂，做一部分生产，每月去查看一次。现在，在普拉托的工厂里有16名意大利人，8名中国人。外面还有一个供货商网络，全是亚洲人的。我们跟他讲起在公交车上司机对中国人不交税的反感。他没有感到不安，相反他做了个比喻，连贝卢斯科尼在著名的逃税者天性权利的比喻中都想不出来的比喻：

“我该交的都交了。但一个小公司怎么办？一个两三个人的手工作坊怎么办？就像乘火车或住酒店小孩子不买票一样，当它们很小的时候不交，长大了之后要交。”

也许是长得太大了，或者是没交那些非法的保护费，或者只是一场事故，在2007年7月17日，他的6900平方米的厂房被烧掉了900平方米。换作他人可能会很绝望，他否认受到威胁，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去工作。一把大火无法把他点着。但如果说中国人只会抄袭，就能把他点着：

“他们在说什么？如果流行趋势是红色，你会发现普拉达（Prada）和古奇（Gucci）都会推出红色系列，这不是抄袭：是占领市场。况且我们抄谁去？在普拉托已经没有意大利公司做成衣了……”

当普拉托保持和平相处的时候……

说实话，普拉托几乎从来没做过成衣。这座托斯卡纳行政区的纺织城市，其强项在于纱线和布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开始来到这里。看到他们会缝纫，普拉托人在跟他们的合作中发现了新的商机。从那时开始，出现了第一批时装公司。”

托卡福迪（Daniela Toccafondi）给我们解释说，她是“普拉托未来”组织（Prato Futura）的协调员。

“现在这一传统领域处于危机之中，25%的增值来自于那些自己搞生产的企业，能快速响应季节性的市场。”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中国人缝制且工资低廉。普拉托人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实现他们原材料的价值。后来情况变了。最近，意大利社会投资学院中心（Censis）以是否认为中国移民是一种资源为题做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23.5%的普拉托人认为是一种资源。但2001年的时候，曾经是31.2%，而且下滑趋势有增无减。

卢凯西（Antonio Gino Lucchesi）是这个历史发展的见证人。他在这座城市里担任过很多职务：工业联合会的主席、副市长、佩奇（Pecci）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等等。刚过完80岁生日，他是那种喜欢做对比的人，他飞到柏林去听贝多芬音乐会，回到家里懊恼地说，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好像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在人家那里却很正常（“音乐会结束之后，只需排几分钟的队，花10欧元，就可以买到刚才音乐会的实况光盘”）。

他的“意大利纺纱企业”（*Industria Italiana Filati*）已经是第四代了，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我们：

“80年代，很多普拉托的企业向郊区转移。对城市来说，尤其是那些房产业主，把那些不要的区域卖给中国人是很划算的买卖，价格比市场上高出20%~30%。”

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第一批人损失最大，开出一条生路之后，后面的人可以顺利到达。一个中国人住进一座意大利人的楼房，花钱不菲，从此这座楼就开始贬值，后面来的中国人就可以捡到便宜，而本地人就更急着离开了。

楼房没有了，中国人就转向别墅，通常地面一层用于生产，楼上用于居住。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为北方的成衣厂加工。慢慢地，他们为自己生产，现在主要是生产那些在地摊和郊区市场销售的女装和童装。”

中国的中国人对抗意大利的中国人

维护普拉托的和平，只有一条戒律：外国人不许接触纺纱和织布。这里的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从来没有犯过规。他们的优势在其他方面，况且投资过于庞大。但是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可不管这些。以2005年1月结束“多纤维协定”为先，再有2008年1月的纺织品进口配额，他们像海啸一样把原卖方市场的小地盘一扫而光。

“如果我们倒下，卡尔皮（*Carpi*）^①的针织行业也会倒下。”

^① 属于艾米利亚-罗马涅行政区，比普拉托稍微靠北的地方。

卢凯西说，他们最大的一个客户，意大利最早的时装品牌之一，最近几年向他的订货巨幅减少：

“2004年向我们订购两万公斤纱线，两年之后变成12000公斤，现在是3000公斤。他们的总经理坦率地对我说：我们派自己人去中国检查纱线质量，9欧元买进，120欧元卖出，你说我该怎么办？”

因此他和他的儿子们，把拥有111年传统的工厂搬到罗马尼亚，而在托斯卡纳，他们开始涉足其他领域。

当地的中国人也受到同样的冲击，一片一片地停业关门，转向竞争不太激烈的行业。

“这些人非常灵活，总是轻装上阵，随时备好行囊。”

卢凯西这样评价，他说2000年的时候，曾经有300多户中国家庭一下子都走了，去了埃尔科拉诺（Ercolano）^①，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皮衣生产项目。当然几年后他们又都搬回来了。

普拉托和中国人的渊源很深，面对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卢凯西发起组织了文化反击。1983年他成立“普拉托未来”组织，思考和了解全球化以及中国所产生的新机遇。

“我亲自邀请了五名在普拉托纺织行业举足轻重的中国企业家。赴宴的时候，每个人两部手机，带着保镖，宽大的奔驰车，车窗是全黑的。一晚上都用英语或通过一个翻译交流。在最后干杯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懂意大利语。幸亏我们没说什么令人难堪的话……”

那天晚上，其中一位大亨说，最初的两年，每天工作14个小时是很正常的，然后可以降到12个小时。

“你们问我：他们是资源还是威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有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南部与中部的衔接地带，居于坎帕尼亚行政区。

问题的资源。现在市场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更加狭小，他们就变得比以前更让人烦。问题是他们不守规矩，工人在地下室工作和生活，这让守规矩的人很恼火。更不要说交税了……”

“税？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在这里要找一个有信任感的人，一个智慧而宽容、从不说过头话的人，这个人应该就是卢凯西。不过他也有跟公交车司机一样的指责。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但专业人士却有不同意见。关于交税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当地税务部门的负责人和税务稽查署的头头。听听他们怎么说。

赞玛克（Leonardo Zammarchi）是普拉托税务部门的铁腕人物。他不是一个喜欢夸大其词的人。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正是所有报纸都在报道他的部门针对华人企业采取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审查了62个企业，查定1000万欧元的漏税。那么这是真的了？

“别急。我们跟中国人打了很多交道……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习惯于非常具体实际，只根据获得的数据结果和真正进入国库的钱数说话。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可以说不交税款2500万欧元，差不多1/5来自于中国人的企业。考虑到他们企业所占的份额，我不认为他们比别人更会逃税。”

德费拉（Marco Defila）副上校也持同样的观点：

“中国的税务系统比较特别，税收人员走街串巷上门收税。他们来到这里，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有着更加严格的规范要求。他们根据他们所知的，按照习惯作出反应。他们的模式

有很多地方不规范，自我利用。这种模式在过去也使许多意大利人受益。”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人有3万，占该地人口约12%（但人们认为，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实际人数增加一倍）。这个比例差不多是他们交税的份额。因此关于逃税的指责，证据不足。

“2006年查了435个意大利纳税人，查出46个逃税的；同时调查152个中国纳税人，查出17个。第二年，627个意大利人，查出90个；130个中国人，查出18个。”

这些都表明，如专业权威人士所说，他们逃税的情况跟本地人差不多，也就是说，入乡随俗。上校总结说：

“20年前的经济黄金时期，普拉托的征税斗争也相当激烈。逃税几乎是这些小企业的DNA，是它们发展壮大的一個典型因素。”

在市政府做民族工作的玛祖科（Ivan Marzocco），给我们举证了许多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

“普拉托人也曾经生活在工作场所，直到他们有条件从中解放出来。还有，让自己的孩子早点工作，而不是读很多年书，也是这里的传统，只是在变富裕了之后才不这样做的。把手表和汽车作为地位的象征进行炫耀，我们之间是如此相似，即便我的许多国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意大利人，教逃税的“坏老师”

相似的说法也出自白君毅，我们在春节联欢会上遇到他。

“我们逃税？说这话的人不读报纸，他难道不知道意大利在这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也许我们没遇到好的老师。好像我们生活在

瑞士似的……”

君毅 27 岁，读法律快毕业了，一直给父母的餐厅帮忙，跟蒙扎（Monza）的一位中国姑娘结婚，有一个刚满一岁的儿子。他创建了意大利华裔协会，第二代意大利华人的主要社团：

“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在线论坛，为了调解我们社团内部的一些争吵。后来就发展起来了，2007 年成立了真正自己的协会，50 多名注册会员，1500 多名常客，以及分布在全意大利的分会。”

我们正谈着的时候，中国人的游行队伍来到市政厅，庆典达到高潮。君毅本不想对市长的缺席说什么，舞龙队伍里的鞭炮声更加喧闹。但他没忍住：

“就像是说：我不代表这 12%。”

绝大部分中国人没有选举权，因为他们没有意大利国籍。而地方行政选举又总是设埋伏，显然，跟皮斯托耶泽路的中国人合影并不是一件可以带来好处的事。

这个小伙子学习法律，比他的同龄人更加成熟。

“我喜欢为外国人做辩护，为那些不懂法律的人解释法律条款。”

比如说，他帮助父母做收入申报，以前他们交给会计师来做，就如同交给神经外科医生来做一样。他的辩护开始了：

“我随地吐痰吗？这里的移民，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偏远农村，在那里，随地吐痰是一种习惯。在北京，警察可以对随地吐痰处以罚款，这儿需要一定时间去改变。正如几十年前意大利的农村一样。”

还有许多抱怨是针对另一种古老习俗的，在阳光下风干肉类。

“我知道。还有人把黄豆铺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卫生保健机构（Asl）来过，说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主要是不美观。有一

个小伙子在我们网站上提出建议：罩上一张网，既不挡光，又给人以卫生的感觉。不过总之，我们无法相信，真的是这些愚蠢的事情造成文化冲突吗？”

“利用未成年人？那只是儿女对父母的爱”

不理解，其实有很深的根源。

“30 多岁，从零开始学意大利语，而且还要工作很长时间，确实很难。但不懂语言，融合就无从谈起。”

君毅来意大利的时候 7 岁，在这里读的书，意大利语说得完美无缺，“喜欢意大利饮食，”即便如此，他的童年并非无忧无虑，跟其他中国人的孩子一样，很快就承担起翻译的工作，成为父母的代言人。

他多次反驳那些指责中国人过早地让自己的孩子干活的言论：

“利用未成年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孩子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父母的生活。如果他们勒紧裤腰带，孩子们也会一样简朴。我帮助父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挨到月底。”

他的姐姐也是一样。在中国的时候，她是班里的第一名，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来到托斯卡纳就不弹了：没有时间，要在餐馆里帮助爸爸妈妈。

“她非常棒，用两年的时间补上了五年的高中课程。然后和一个比她稍大一点的中国人结了婚，现在 31 岁，有两个小孩，靠父母的帮助开了一家首饰店。”

后来他的父母，在 60 岁和 55 岁的时候，回到浙江省的省会杭州生活。13 世纪末，马可·波罗把那里定义成“世上最美和最高贵的城市”。白老夫妇辛劳多年之后，在一栋摩天大楼里买下一套

100平方米的高级公寓，每天参加舞蹈学习班，打太极拳，玩电脑，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现在轮到子女为未来而辛劳了。

手会变紫的工厂，怀念“非典”时期

做线衣比做皮革好，用线轴比用粗针好，剪裁机比皮革和胶水的臭味好。温州人乔治（Giorgio）21岁，来意大利十年，虽然工人们每天同样是干14个小时，但在他的工厂里有照明，有清洁。地上有棉团，一个大口袋里装满了毛线碎片，两两缝在一起就成了童鞋。不远处黑乎乎的破房子里在加工皮革，空气污浊，围起来的生产区域上面是铝板房，工人们干完活儿后在那里休息。

虽然是在普拉托，但就好像是在印度、在中国，或者在孟加拉：从黑暗和寒冷中浮现出大理石一样的面孔，对我们的“早上好”不知如何回应，然后尝试另一条路“要皮包吗？”。在这个10米×20米的厂房里，起码有三十几个人，分成小组，每20平方米三个人。有人裁剪，有人缝制，用目光追随着我们。有人拿给我们看刚包装好的最新款式，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头顶上的这些建筑，它们是工人及其家庭居住的家。一副铁梯子分隔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孩子们到处乱跑。只有皮包的裁剪机让我们想起这里不是19世纪的工厂，而是2008年文明的托斯卡纳。

他们整天都在工作，希望能早一点熬过这艰苦的、拼命攒钱的初始阶段。然后，幸运的可以开个酒吧，有些人当上小老板，有些人继续裁剪和缝制，双手变成紫色，因为即便是在1月的寒冬，中国人的厂房里从来没有暖气。如果做皮革，就要忍受寒冷、黑暗、臭味和劳累。如果做线衣，就只有寒冷和劳累。当我们跟乔治说起这些事时，他放声大笑，说他以前的厂房条件更差。现

在，在他这里没有孩子在机器之间跑来跑去，环境清洁，只是工作时间一样长，普通的工人工资是1200欧元，能干的师傅拿1500欧元。

老板乔治是一个高个儿，机灵的小伙子，意大利语说得极好，他警惕地看了一眼我们的陪同之后，穿过厂房，走到他的12台缝纫机旁，给我们展示他很骄傲的一样东西：

“这外面我们装了摄像头，用来对付税务稽查。”

外面什么地方？

“这里，正对着进门处，当他们的车子来的时候，我们悄悄地让里面的几个工人从另一边逃走。我们这里不全是合法用工。”

有些人是打黑工的，六个里面还有两个非法移民：

“现在新政府上台，可能税务稽查不会再来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了。”他又笑了起来。

爸爸、妈妈、姐姐和四名工人缝制服装，他负责公司管理，跟许多品牌商保持关系（“都是意大利品牌，但没一个重要的”），决定工人的聘用，总之，当老板。可看他那样倒不像：穿戴像是过周六晚上，粉红条纹的衬衫，白色紧身裤，露在外面的项链，刚修剪过的发型，不像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不过，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虽然只有21岁，却已经有经验，有策略：

“对我们来说，‘非典’那段时间生意最好：因为从中国那边什么都进不来了，那些要生产的厂家只能排队来找我们。”

事实上，对于那些加工服装的人来说，威胁来自于中国大陆：

“现在都从那边进来，我这12台设备只能开动6台。”

“需要再来一场‘非典’？”大笑。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厂房里的气氛很宽松，机器在慢吞吞地运转，工人们似乎竖着耳朵在听我们谈话。我们问，他们是否合法：

“我的家人是，其他人不是。”

为什么其他人不是？

“因为他们不愿意多交税。”

因为要多交税，所以他们不愿意要合法的聘用合同。

如果他们愿意要一个合法的劳动合同呢？

“我给他们签，但必须保证在这里至少干两年，都是这样的。”

跟足球运动员的合同一样。区别是，一个中国人干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前锋两小时的薪酬。

“未来？只有忧伤，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终于找到一个想法不一样的。夏微秀（音译），对“你做过的所有工作中，最喜欢哪一个？”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不工作。”

对一个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这就如同对国旗的背叛。但她的履历却相当丰富，27岁，15岁时来到意大利：餐馆、成衣、进出口、翻译，什么都做过。但无论如何找不出喜欢的工作。就好比吃饭，仅仅满足于填饱肚子。她认为梦想对她来说是奢侈品，不配拥有。

我们在她的房产中介办公室见到她，这是中国人刚开始从事的新行业。如果结了婚，有孩子，中国人一般愿意买房而不是租房。在中国城区域，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23万欧元？婚礼上募集的彩礼，有可能家人再添一点就够了。她是单身，独自生活了两年。

“我爸爸洗盘子，妈妈做衣服，他们还在米兰，我弟弟也在那里。”她没有留下太多深谈的空间。

为什么五年前一个人离开米兰来到普拉托？

“个人原因。”

像一堵墙一样密不透风。我们感觉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离父母远一些。“独立”是她的关键词。她很气恼旁边两个商店，做了两年邻居却从来没有过来认识一下。不过她也只是礼节性地打声招呼。

工作很多，有时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9点，整整12个小时。

“自由时间？我很想有……”她摇摇头。

其实在她这个年龄，晚上9点以后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这只取决于她自己。她意大利语讲得很好，虽然她来意大利时已经不小，在学校里学习时间不长。虽然她说有意大利朋友，但总是说“一个人”不想做很多事。不过她去度假。

“去年，我在浙江时的朋友到这里来看我，她现在住在布雷西亚。我们一起出去玩，可开心了。”

前年她从壳里出来，坐了一趟火车和一次飞机。

“8月份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①的海边待了三个星期，一个意大利朋友邀我住在她家里。然后在柏林一个星期，是天主教组织的一个聚会，虽然我不是信徒。”

今年夏天她还没有计划。她从不事先规划。对她来说，唯一没有风险的就是最后一分钟。

“让我想象五年以后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只有忧伤。在这里居住了12年之后，还是不能肯定能否获得居留权。意大利年轻人抱怨工作的不稳定性，而我们每年祈祷不要被遣送回国。我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想未来，否则自寻烦恼。”

一个小小的哲学，但也是个哲学：专注于现在，抓紧每一分钟。因为过去都是回忆，未来是一块未知的土地，最好留出空间，

① 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尖端，南面伸向西西里岛。

用路上捡到的东西去装点和充实。她明白我们很吃惊，我们不能理解她如此悲观的回答，于是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几星期前发生的事情。在史堪迪奇（Scandicci）^①，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从学校的窗户跳了下去。她想自杀，但没死成，摔断了一条腿，脊柱挤压。因为她无法忍受，跟弟弟生活在父母从早到晚干活的作坊里。

“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记得刚来这里的头几年。当同学取笑你的时候，你无法反击，因为会说的词汇不够用。非常难过。”

那个小女孩在自杀之前，给一个朋友发手机短信说：

“为什么生活这么难？”

然后她从十米的高度跳下去。所以说，中国人也会哭泣，只是没人去看他们的眼睛。即便去看，也会说，总之他们都一样。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属于托斯尔纳行政区。



第 10 章

第二代的挑战

——班级里的前几名，长杏仁眼，取意大利名

中西餐之间的年轻华人

从巴纽洛的山区到卡 - 诺给拉的平原，再到普拉托的工厂，我们看到了辛劳、挣钱、节省、赌博，看到了工人、老板、成年人。那孩子们呢？第二代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讲到过一点。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什么，在意大利人中间长大的中国人会是怎样的？2007 年 1 月 1 日，12.2 万合法居留的中国人中，4.5 万人不满 30 岁，2.6 万人小于 25 岁。本能地，希望他们更像意大利人，而不是中国人；希望他们能剪掉种族的脐带，走向没有抵触对立的未来。但是错了。跟中国孩子们你可以谈任何话题，但如果你认为，他们选择粉丝还是肉酱面意味着什么，从一开始你就错了。因为他们是多面的：即使是在富裕的家庭里，父母也同样辛劳；从头开始，他们付出非凡的努力；他们离开的祖国，今天成为闪亮的目标；家所在的这个国家，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

社会学家把他们分成四种：真正的第 2 代，是那些出生在意大利

利的中国孩子；称为第 1.75 代的，是那些来意大利时还是学龄前的儿童；第 1.50 代在意大利接受了义务教育；第 1.25 代来意大利时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后半段。显然，来意大利时的年龄越小，越容易跟社会融合，最好是出生在意大利。除了年龄因素，还跟学校、家庭、社区有关。春丽（音译），22 岁的罗马女孩，在米兰商学院读书，她对我们说：

“幸亏我没去上埃斯奎利诺为中国人设立的学校。我总是跟意大利孩子在一起，即便他们说我们中国人吃狗肉，牙膏里有油漆。”

应该说，春丽的同学们遇上她这么个好脾气，才是幸运的。像许多人一样，春丽为自己的祖国自豪；像许多人一样，春丽希望成为意大利人。现在她只能放弃申请国籍，因为申请程序要求原籍出具未犯罪证明。春丽离开中国的时候只有 9 岁：当她向老家要这个证明文件时，温州市政府的官员忍俊不禁。

首先，不同于父辈

意大利那个年轻的部分，跟随北京，利用机会，像多年前的意大利人一样工作。在这个被吓坏了的国家，第一次“有可能，子女的生活不如父辈的好”，但还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社会交流、探险精神，使我们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詹尼（Gianni）：中文名叫林建易，来意大利时两岁，随父母从圣雷莫到克雷莫纳，从罗马到玛丽亚诺，开餐馆，关餐馆，再开餐馆；他现在 25 岁，刚从计算机专业毕业，打算攻读米兰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博士。春丽：20 年前她父亲非法移民到玻利维亚，然后经过葡萄牙，到达罗马，合法化之后把家人接到意大利，90 年代

跟妻子在海边向晒太阳的意大利人兜售打火机、折叠伞、虎牌清凉油。现在他们的大孩子在米兰商学院企业经济专业读三年级；二女儿在菲乌米奇诺（Fiumicino）音乐传媒机构吹长笛，明年不上普通高中，希望能进桑塔-茄契利亚（Santa Cecilia）学院。还有文燕陶窠：她父亲刚到意大利的时候，给米兰一个进出口公司装卸货物；今天，她从待了三年的伦敦重新回到米兰，名片上的头衔是“IRD公司公共部门意大利负责人”。最后再说一下林杰，在米兰理工大学读书，毕业后他想去一个跨国计算机公司工作，他对我们说：“我们这些第二代几乎都住过阁楼。”

从阁楼到大学毕业

在意大利的年青一代，很多人经历了从狄更斯（Dickens）描写的社会底层到全球化的跨越。杰所说的阁楼，就是工厂上面的家，以及缝纫机上面的床。爸爸和妈妈整天缝制衣服，从早上9点干到半夜，孩子们在胶水、皮革、缝纫机器中间跑来跑去。那么长时间的工作，像蚂蚁一样的辛劳，混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让人恐惧。但正是这样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我们在普拉托的达蒂尼（Datini）职业学校里听说：

“中国小孩经常早上犯困，趴在桌子上睡觉。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帮父母做皮包。”

最辛苦的地方，最不受人尊敬。

杰说：“1994年我来意大利的时候9岁，跟父母一起住在米兰的一个商店里，伸缩门总是放得很低。”

因为这商店并不是真的商店，是杰的妈妈给萨勒匹路的一个批发商加工皮包的场所。全都是没有窗户的阴暗陋室：下面干活，

上面睡觉。

这就是著名的阁楼，改变了杰和他家人的生活：

“妈妈计件取酬，每天干15个小时，一个月能拿到300万里拉（约合1549欧元），加上爸爸在餐馆里干活的200万里拉（约合1033欧元）……”

一家人因此改变了生活，让子女读书，辛苦获得回报。杰不会再去碰缝纫机：

“妈妈总是让我学习，因为她自己就很喜欢读书。”

杰还记得在家乡浙江大岙镇的时候，闲暇时间里妈妈经常带着儿子去图书馆。在中国去图书馆，在米兰住阁楼。杰24岁，大学毕业后要在米兰当工程师；他母亲离开中国的时候30岁，曾经是文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移民意大利，进入19世纪狄更斯的小说情节中。当然，她已经早早地走了出来。不过有时晚上想起那些年在工作和阁楼中的日子，总是会问是否值得：

“我认为结果还好，”杰这样说，“也许，我父母应该选择一个更灵活的国家，至少对外国人更开放一些。”

非常优秀，可能太过优秀了

罗马的梅磊（Mele）教授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因为她执教的马宁综合学校有不少外国孩子。我们来到埃斯奎利诺，这里是罗马的中国人干活儿和送孩子上学的地方，800名中小学生中，有115名来自中国。教师们说，中国孩子守纪律，爱学习：

“他们非常用功，很有礼貌，可以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

“但不是总能如你所愿地激发他们。”梅磊教初中二年级的语文。

“虽然我是一个很会发掘孩子们潜能的人，但对他们，不是都能发掘出来。”

意大利中小学校有中国学生 24446 名，在外国学生中人数占第四位，仅次于阿尔巴尼亚、摩洛哥和罗马尼亚，主要集中在普拉托、佛罗伦萨、特雷维索、米兰和罗马。他们经常有语言问题，但从来没有数学问题：

“对意大利语教授来说，他们不可救药；但对数学老师来说，他们非常可爱。”

一直到高中，他们都能轻松驾驭数学；而意大利语很多年都会是一个障碍，因为意大利语对他们来说确实很难，而且语言扫盲的学习时间太少，教师是随便找来的，不是教育部专门培训的 700 名教师之一，而那些受训的教师却从来没被聘用过。

根据 2003 年和 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芬兰的学校名列世界前茅，从国外来的孩子用一年的时间专门学习语言。法国使用语言分级制度。在意大利，相关的政府官员有很好的愿望，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总是卡在预算问题上。梅磊教授是一个执著的人，为了发掘这些离乡背井的孩子们的好奇心，她在这两年中组织孩子们出游 37 次：

“学习语言的兴趣，也来自于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

在她的班里，意大利孩子占少数。外国孩子中有三个中国人：路易吉（Luigi）、卢卡和小波（音译）。按社会学家的分类，他们是一个第 2 代和两个第 1.50 代。路易吉出生在意大利，所以是最好的一个，他帮助其他同学，得到很多优秀，所有科目都良好，只是在吃午餐时候，犹豫吃米饭还是意大利面。小波非常可爱，意大利语说得挺好，能表达出所有他想说的意思，但还是很小心地一字一句地说话。卢卡一点儿意大利语都不会说，但是，因为

在中国读了小学，数学拔尖，是全班唯一一个数学“优秀”。

一个全是数字和纪律的学校

数学是所有中国人的特长，只要在中国的学校里读过几天书。这种数字方面的突出才能，反映出学校的严肃性和竞争性。所有在意大利的中国孩子都记得在家乡的学校必须遵守纪律：春丽记得每天有两次“立正”，在唱国歌的时候，不管在哪里，不管正在做什么；文燕尤其记得同学们拿着扫帚、水桶和抹布，放学后轮流打扫教室；杰开玩笑说，像他那么笨的人，在中国根本进不了大学；小波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学校里，如果不专心就会被老师批评，如果再不专心就会被罚打手，伸出左手——因为右手还要写字，手心朝上，用竹棍敲打，“手被打得通红，”小波低声说道。

这样的严肃性让孩子们牢记一辈子。因此梅磊教授对孩子们在学习上的努力和成绩并不担心：

“意大利学校和中国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好，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参与教育，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的交流。”

在中国学生孤独和规矩的形象后面，似乎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位家长来谈过话，从来不提家里的生活，从来没有回应，拿梅磊教授的话讲，无法显示“是否找到了石油”。

但是，让很多埃斯奎利诺的老师们感到困扰的是鹏（音译）这样的情况。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每年都有几起发生：一个小男孩来到学校，开始学习，开始克服语言障碍，开始跟同学们一起读书。然后某一天突然消失。过了三四天，甚至一个星期，试着问问中国同学他的情况，开始时他们回答不知道，然后说“我想他不会来了”。确实，再也没见到这个小

男孩，老师们只能填写一张弃学的报告交给社会服务部门，等待答复：

“为了鹏的事，我专门到他父母的餐厅去看过，全都关掉了。”他的老师说。

直到社会服务部门传回一个令人放心的消息：没有问题，小男孩已经在普拉托地区的一所学校注册上学了。因为父母迁移到那里，鹏也就自然跟着去了：

“我很难接受：就这样把孩子拿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请不要再捉弄我们了！”

根据米兰市政府的调查，中国学生有 26% 只读到初中毕业，而在全体移民子女中这个比例是 4%，因此中国孩子读完初中以后停止深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移民子女。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份家族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还因为他们的社团原本是非常低的文化层次。根据意大利社会福利机构（Caritas）统计，中国移民中只有 12% 读了高中，而移民的平均水平是 28%。

我们选择了一所学校去看看，不知道应该把它称作什么，是多种文化的实验前沿，还是缺少社会融合的例子。普拉托的达蒂尼学校有 1500 名学生，其中 80 名是中国学生，尽管我们在前面说了很多，中国学生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事情分两部分来讲，先说说正面的，据说这里有 12 名意大利学生和 40 名教师（总共 220 名教师）在学习中文，好多人胳膊下夹着 Hoepli 出版的《Impariamo il cinese》（《让我们来学中文》），跟佛罗伦萨大学达成提供文化中介的协议，该校刚刚跟温州的酒店学校结成姊妹学校。事情的另一面是，罗蜜娜（Romina），一个出生在普拉托的 15

岁中国女孩，腼腆但勇敢，决定在全体大会上对她的同学们说：不要再捉弄中国人了！看来，在达蒂尼，融合得并不好，学生们以种族分成小团体，教师们的办法更不现实，比如把黑板写满，不留空间，否则就会出现“中国人臭大粪”的字眼。教师们很担心，而中国学生们坚韧地忍受着，低下眼睛，假装没明白是在说他们。当罗蜜娜在大会上发言之后，全场一片安静：

“她想干什么？”她的同学们想。

这是在意大利高中里中国学生最多的地方。如果全国范围内，中国学生占外国学生的4.9%，那么在普拉托几乎占到一半。那些读完初三还继续学习中国学生，大部分来读达蒂尼的财会和旅游经济课程。

有些人是来学本事的，有些人是为了练意大利语：

“每年我们开一个扫盲班，至少有50个孩子刚从中国来。”

洛沟（Luciano Luongo）教授对我们说，他非常热心文化交流项目。

“我们是一个职业学校，应该教授管理和技术，但没办法：最要紧的是语言。”

为了应急，他学习中文，这样他成了这所学校里中国学生不可缺少的支柱：

“如果班里有人不见了，我就去找家长……”

人人为自己，得罪其他人

洛沟教授陪我们在达蒂尼校园里转：遇到伊莎贝拉（Isabella），她出生在普拉托，意大利语说得比其他中国学生好，她学习财会，经常去她父母在皮斯托耶泽路的酒吧帮忙；还有安

德烈亚（Andrea），7岁时来到意大利，喜欢卖弄他地道的托斯卡纳口音，洛沟给我们当翻译。安德烈亚没有中文名字，他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对于他父母的故乡，他只有在这里朋友的陪同下才能回去，他觉得在意大利要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意大利国籍。对于这个问题，聪明的他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娶个美丽的普拉托姑娘，对两个人都合适。”

皮邹（Elvira Pizzo）教授是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学生们如果有问题都会去找她。为了克服中国学生先天的腼腆，中心设置了一个信箱，方便学生们投放青春期困惑的求助。有一个一年级的女孩写道：

“我来意大利快两年了。在这个班上我的意大利语不好。我很害怕。”

还有一个15岁的学生，短短几个字说的也是“害怕”：

“每件事情我都得保持沉默，我不知道意大利人是否喜欢中国人。我觉得害怕。”

在达蒂尼，中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之间的关系，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法语教授拿给我们看惠惠（音译）的作业，她是学生模范，即便如此，她还是认为意大利同学“说话很快，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虽然惠惠没有说，但教授说，惠惠也曾经被人叫做“臭烘烘的中国人”，叫她离开这里，“你，和跟你一样的中国人”。这似乎成了意大利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长盛不衰的话题。老师们认为，意大利学生这种不包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在普拉托，时兴跟中国人过不去，正统的说法是他们弄脏了广场，抢了意大利人的工作。”

多民族的学校几乎是两个分离的学校。上课的时候大家坐在

一起；课间休息时各玩各的；体育健身时间，意大利孩子踢球，中国孩子打羽毛球。人们经常说中国人不愿融合，自己抱团，对客居的社会不开放。但跟达蒂尼的学生交谈之后，我们的印象是正因为没有意大利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他们才自成团体。自从罗蜜娜在大会上发言之后，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交往还是令人沮丧，一个男孩儿用支离破碎的意大利语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帮他们学习数学，而他们却不帮我学意大利语。”

等爸爸的时候，小小店主在长大

先上学，再上班，应该都是这样的。但对普拉托的中国孩子们而言，这前后两件事，没有那么明确的年龄划分。达蒂尼的学生们参加了一个宪法研究项目的电视采访，一个17岁的学生说，他经常花几个小时帮助父母缝制皮包：

“当然，我更喜欢玩电脑或者看电视，但是干活，我并不觉得累。”

当意大利工会联盟（Cisl）的工会人员来学校讲有关利用未成年人做工的话题时，最后一排传出一片嘈杂的声音，一个四年级女孩鼓起勇气对工会人员说，是的，她下午帮父母干活，但这不是利用：

“我看到他们累了，我只是想帮助他们。”

有人在课桌上打瞌睡，因为晚上缝制衣服，有人一听到下课铃声，就像箭一样弹出去，因为要去商店接班，很少有人抱怨。但在意大利语的作文里经常读到，在中国和意大利之间，孩子们更喜欢中国，“因为在那里我不用干活”。在普拉托要干活，作坊

里中国工人阶级以疯狂的节奏工作着，商店天天营业，即便父母飞回中国去进货。

马里奥（Mario）的妈妈现在正在温州进货，她让19岁的儿子帮她接待波兰客户，这些客户每15天来一趟普拉托买皮包。马里奥离开学校，去他家在奥斯曼诺若（Osmannoro）的批发店驻守，这里位于普拉托和佛罗伦萨交界，有一个中国人卖皮具的大型市场。洛沟教授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书读得不错；他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快，但准确，他说放弃读书，是因为他妈妈需要他：

“我知道她前几年吃了很多苦。现在我们有商店了，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撑着。”

在我们好奇地浏览货架时，马里奥讲解给我们说：“这些皮包我们6.50欧元进货，第一个星期能卖9欧元。然后必须尽快脱手，因此赢利空间很小：挣1欧元，有时甚至0.5欧元也得卖。”他已经显露出他的商业才能了。

这样的赚头对意大利商人来说，都不值得早晨上闹钟。可是这里却把儿子、孙子都叫到店里，等候那唯一的客户，给这一天带来一点点转折。

“你们意大利人缺乏勇气。”罗蜜娜概括说。她是达蒂尼中国学生的反叛首领，放学后她也到奥斯曼诺若来帮忙。

“意大利人只有在保险的情况下才出手，每次买两个包试试，害怕买了之后卖不出去；我们没有任何保护就跳进去，进一个集装箱的货，然后再说。”

上午她跟我们讲毕业以后想读的大学，下午探究皮革进出口，在这一行业，普拉托会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也是学校，另一种学校。你在这儿工作？我们问她。绝对不是，聪明的女孩这样回答，她是少有的几个搞明白了在意大利，一个15岁的女学生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我在这儿因为我喜欢在这儿，而且还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

在学校里，小吴（音译）更直率，更缺乏经验，或者仅仅是想跟别人说说话：他用不完整的语句告诉我们，他跟父母基本见不上面，每天放学回家时，父母都在睡觉，上完夜班他们疲惫不堪，要睡到将近傍晚。而他的任务是整理和打扫，这个14岁腼腆的小男孩，尽管嘴角开始出现细软的须毛，但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父母生产，他回到家，自己弄点东西吃，然后开始清理打扫。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利用总有一种情感在里面，它使痛苦减轻，给劳累赋予意义。我们知道，几年以后，吴也会住上舒适的房子，除了暖气以外什么都不缺，他的父母也不需要每天夜里工作了，那时他会在米兰商学院选择国际金融和企业管理的课程。但现在他14岁。也许，像罗蜜娜说的，我们意大利人缺乏勇气。但想象着他手里拿着扫帚，照顾着酣睡的父母，我们无法笑着离开普拉托。我们本想谈论学校，却再一次遇到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是世界的脐带”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些孩子们在想什么？在意大利的第二代中国人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问我，是否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春丽说。

她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在当今世界会说中文的“竞争优

势”。似乎只是个人资本的问题，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要感觉这种自豪，我得用中文说：中国，意思是世界的中心。”

有这种感觉的并非一人，文燕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们：

“当我们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变得跟别人相似，因为我们习惯于高人一等。”

她这么说着，要了一盘肉酱面包，看了看接着又说：

“在中国，绝不会起这么土的名字，一个讲究的菜单上，菜名应该是‘合家欢’、‘美妙天空’、‘爱情诗篇’。”

再来说说中国人习惯的优越感。我们忘记了，如果不是几百年也有几十年，世界中心的居民几乎从我们的历史其实也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消失了。但中国人的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比古罗马、希腊和斯巴达更久远，追溯到埃及金字塔时代：

“我们一直在那里，一直在世界的中心……”文燕坚持说。

怎么在中心？高贵的历史也有它的局限吧：谁在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中见到过你们？她不出声，微笑。跟一个有几千年文化背景的人辩论可要小心点儿，因为一句话就把论题化为灰烬，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我要说的是，除了最后四五百年，我们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她很不情愿地不得不特别说明最后五百年。总之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正在画上句号。

“我们永远有另一副面孔”

因此，他们是年轻的，而且是自豪的。但同时，他们也对周围的世界非常敏感。那么他们更像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在都



灵，张（Ilaria）——跟意大利各地所有的中国妈妈们一样——看到她的三个孩子不可阻挡地越来越意大利化，这让她担心无法再回到温州。但最让她担心的是，孩子们天真地以为，能跟意大利的同龄人混在一起：

“他们永远有另一副面孔。”

能说一个人还有另一副面孔吗？也许不该说是另一个种族？总之他们经常这么说，因为总是有人提醒他们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是因为本能：

“我们被种族隔离了。”一个米兰姑娘说。

“我跟那些和我长相相近的人说话更舒服些。”

因此中国还是意大利，意大利还是中国？最好两者兼得，可是有人对他生来具有的这种双重身份自负地选择排斥。普拉托的教师们说，许多中国学生否认，坚决地否认跟父母的文化有任何关联：

“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你有中文名字吗？”

“没有。”

安德烈亚就是这样，他的普拉托口音比当地人都地道，他没有中文名字。汉学家车卡纽讲起年轻的塞雷娜（Serena）忍受不了她的父母，因为：

“所有的中国家长都是这种观念：你得去当律师或者医生，这样才能挣很多钱。他们就知道钱，钱，钱！”

一个朋友讲起一个温州女孩在设计她的“反中国”行动，就是“买一个豪华的厨房，那种带伸缩门的，用不锈钢装饰的”。那种东西连中国城的阔老板家里也不曾见过。这个女孩以她的方式，以青春期的冒险和无理，与这个社会进行融合。

林杰的愿望非常朴实，他要申请意大利国籍。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要求，他24岁，在米兰及其郊区生活了15年：

“主要是因为我要选举。我在这里生活，我想要有选举权。”

国籍是一个问题，居留和长期居留也是问题。在意大利华裔协会的网站，看到这样的对话：

“我的一个朋友申请居留已经等了五个月，这正常吗？”

“正常，告诉她再等五个月，我的居留是一年以后到的……”

“哪个城市？我在米兰要八个月。”

“我等了12个月。”

他们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不是汉字。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经验：没有一个程序可以区分谁是在意大利长大的，谁是读过书的，谁是刚刚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但正是这些孩子应该被融入这个社会，我们希望他们跟他们的千年文化少一些联系。而现在，我们让他们等待12个月：

“我的纪录是21个月。”杰对我们说。

他来到意大利时只有9岁，在这里读了小学、中学、高中，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他一直是在我们的国家，使用我们的语言，却拿着一年一续的居留：

“因为我不挣钱，不能申请五年的长期居留。问题是，这么长的等待时间使我不能出国旅游。比如说我想去巴黎，就去不成了。”

一个中国人去巴黎？更离奇的是，文燕要声明，居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因为“居住条件”一栏的选项只有“免费”和“房租_____欧元，由雇主支付”。

为了避免意大利这些烦琐的官僚程序，杰，还有他19岁的堂妹，1岁时来到意大利，现在是米兰理工大学管理工程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决定放弃他们的中国国籍，申请意大利国籍。太好了：

我们不是希望他们融入社会吗？跟那个“封闭的”、“另立的”中国人社团决裂吗？很好。两个堂兄妹把申请材料递上去，显然材料没有任何问题。

“一年以后再来。”米兰市政府这么告诉他们。

申请国籍要一年？

“不，这只是拿号。然后，过三年再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如果他们沒有改变主意的话。



第 11 章

罗马，权力的剧场

——首都的生意人和其他成功的中国人

金王朝，从贝林贵到阿雷曼诺

在首都罗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迎接鼠年。2 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庆典成为给意大利人的义务表演。一所功夫学校的学生们很卖力气地舞动着那个用布扎成的神话动物，说是龙，更像一只大虾。表演队伍围绕维多利奥广场转着，队列里只有罗马人，主要是父母带着孩子，以及对异族文化仍存好奇心的老人。在一百多人的游行队伍里，只有三四个中国人。甚至没有人从商店里出来观看。似乎那个演出跟他们毫不相关。

第二天，同样的演出，情景却完全颠倒。早晨在广场上，意大利爸爸和中国妈妈一起教孩子们打乒乓球、篮球和板球。下午就是隆重的官方庆典，有董津义大使的讲话。中国人一个不少，意大利人该来的也都来了。那些在华人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商人，穿着考究，表情严肃，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第一排没有一个没有荣誉头衔的。在中国人的称谓里，有名无实的头衔也受人重视。正好，住着皇亲国戚的罗马比任何其他城市都更了解这

一点。

对金慧（Lucia）来说一张名片不够用。确实，她的名片有个折页，正反两面写满了她的头衔。她在罗马有四个地址，五个电话号码，再加上一个上海办公室，一个意大利手机，一个中国手机，一个董事长，两个副董事长，两个董事和两个顾问头衔。全都写在这小小几厘米的空间里。她的四个公司，从时装到健身中心，从贸易到为企业家服务。

她是一个活跃的人。我们还没坐下，她的问话就来了：

“邓小平曾任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基金会，今年7月份颁发国际优秀青年奖，以奖励那些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你们媒体感兴趣吗？”

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我在好好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我。但她更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慧的意思是智慧”），她为自己出生在一个世代富裕且有权势的家族而骄傲：

“我的曾祖父是第一支来到意大利的中国商务使团的头儿。我父亲曾经是上海海关的负责人，我母亲是台湾一个名人的女儿，她家有六个佣人。1968年我们搬来罗马的时候，只有八九个中国人，现在是成千上万。”

他们成为青岛啤酒在意大利的特许代理。开了一家又一家餐厅，直到第六家，包括特拉斯特威乐（Trastevere）的金厅（King's Hall）。

“贝林贵（Berlinguer）^①是常客。那时我还小，记得他和北京来的中共代表团……”

现在她还是一样亲近政治，只是扩大了视野。

“我在左派和右派都有朋友：维尔特罗尼、阿雷曼诺（Ale-

^① 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22~1984）。

manno)^①、费尼 (Fini)^②、贝勒蒂闹第 (Bertinotti)^③、乌勒索 (Urso)^④、马勒匝诺 (Marzano)^⑤。我在贝力萨留基金会 (Fondazione Bellisario) 工作，跟蒙特泽莫洛 (Montezemolo)^⑥ 很熟。我跟大家处得都很好。”

罗马人的精髓，“做些事，见些人”。一个电话打进来，提醒她明天那场中意青年足球赛：

“我会去的，但不能待很长时间。”

不知道她的外交能力是从罗马大学 (Sapienza) 的课堂里学来的 (她的第二个学位是政治学)，还是家族遗传。总之，这个才能再加上会说四种语言 (不包括方言)，使她成为罗马华人联合会的秘书长。如果说谁能代表大家的意见，非她莫属。让她记忆最深的，是帮助组织普罗迪 (Romano Prodi)^⑦ 去中国的访问。功德自有回报。

“我给意大利工业协会做翻译：从来不要报酬，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我陪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中小型意大利企业去参观，从来要价不高，我希望把我的名声传出去。”

对每一个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奖牌很重要。但并不是轻易能得到的，要分析一下投入产出的性价比。

“每一个职务都对应着付出。作为意大利上海同乡会的会长，我付出很多，四年里拿出将近 3 万欧元。当然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但是这些钱是需要花的。比如说，每一个从中国来的代表团

① 意大利现政府的罗马市长。

② 意大利众议院现任议长。

③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总书记。

④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⑤ 意大利生产活动部部长。

⑥ 法拉利的老板。

⑦ 曾任意大利总理 (1996 ~ 1998)，欧盟委员会主席 (1999)。

我们要请他们吃饭。再比如召开一个会议，我们安排在希尔顿饭店，邀请上百人参加。”

这些是“付出”。关于“回报”，她给我们看习近平访问罗马时跟他的合影。当然用炸土豆和汽水招待他是不合适的。钱可以用来联络感情。

“从按摩师到进出口商，我们的社会阶层是这样划分的”

跟她谈起任何一个知名的或半知名的罗马华人，都能从她那里了解到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事实上她父亲的餐厅充当了罗马中国移民的第一个根据地。他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在他们自己能够开业之前，在那里当跑堂，刷盘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餐馆突然多了起来，贸易是十几年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很多人从中国进口商品发了大财。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基于信任，基于关系：比如说你的表兄是厂家的朋友，给你发一整箱的货，都不需要预付款。后来竞争激烈了，利润越来越低，出现过没钱付给供货商的情况。因此现在没有信任了。”

这种信任关系的急剧恶化，我们从一个进口商的表妹小刘（音译）那里也得到证实。

年迈的社会金字塔还在支撑，但受人尊敬的塔尖却摇晃得最厉害。

“最底层应该是在马路或海边给人做按摩的按摩师，完全靠自己手臂的力气挣钱吃饭，是真正的无产者，”金解释说，“然后是流动商贩，不管怎样都要有一点资本来购买货物。再上面是餐馆服务员，一个月挣1200欧元，包括小费。接下来是那些加工服装的手工作坊。再上面是开商店的，包括开餐馆的。最上面是进

口商。”

其他行业早就生活在激烈竞争之中了，而进口商们刚开始有所感觉。

“现在，迁移是反方向的：家人留在意大利生活，赚了钱的那些人跑回中国去工作，通常是投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飞速增长。”

我们在一个福音派教堂里认识的英（音译），讲的正是她爸爸在中国炒房子的事：

“在意大利开了几家餐馆之后，现在投资于浙江的房产市场，他相信这个生意能赚更多的钱。”

罗马很美，适合于饭后散步。但挣钱，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

金女士的手机又响了，这回是一条短信，儿子问她什么时候回家：

“我成天在外面疯跑，谁都无法跟上我，连我的意大利丈夫也不行。”

看得出她总是想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在上海她一个人收养了22名小孩。她还希望我们能够影响我们的同行：

“关于西藏，你们没搞明白：那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那些僧侣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和平。”

埃斯奎利诺的进口商，塔尖的中国人

如果说，以两位数增长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乳母，进口商就是脐带，海外华人就是长在外面的孩子。对于全球市场，谁能找到最好的供货商，而且还说同一种语言，谁就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这是那些进出口商的优势。罗马是全意大利进出口商最集中

的地方，半岛其他地方以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希腊，都到维多利亚广场来，到他们的批发店里进货。这似乎违背了平坦世界的第一定律，为什么巴塞罗那、雅典的中国人，不会自己从广东工厂发一个集装箱直接运到家门口的港口，而要多跑这些路程呢？一定是有原因的。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认识了李枚星（音译）。他是罗马中国人商会的会长，代表罗马 600 家进出口企业（总共约 1700 家）。会员们经常跟他抱怨海关和税务稽查的麻烦。他也曾是服装进口商，对这些问题都有亲身体会。会谈是事先约好的。

“我们在 via Fillppo Turati 140 见。”

他按照那块门牌把地址念给我们，那块黄铜质地的门牌，包括印刷错误，都是在中国做的（“塞进某个集装箱带进来，比这里便宜多了”）。进入内院，墙上有些掉皮，打开一间 6 米×6 米的房间，跟我们想象中的办公室相去甚远。老板的椅子是那种可以倾斜的，扶手上有一块胶带打的补丁。地上铺着地板革，一条黑线穿过屋顶，吊着一个节能灯泡。在会长的书桌后面，墙上贴着一张老虎的印刷画。一台液晶电视和最新款式的计算机。他 50 岁，头发乌黑，白色短上衣，由他的秘书陪同进来。笑容可掬，表示可以开始谈话了，但尽管在意大利生活了 17 年，他能听懂，却不能很好地表达。

李吉新（音译）和小英轮流翻译，他说罗马目前还是欧洲最主要的批发地之一，但已经不是唯一的了。所以交易量有所减少，其他城市学罗马的样儿，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平台。

“为什么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不会自己进货？因为我们干这一行已经 20 年了，他们要从头开始，没那么容易，不敢投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一个进口商说：“要做市场调研，眼界要宽，不能只看罗马或

意大利。”

他们相信调研，相信浙江人的商业才智（“我们住在海边，吃鱼使我们更聪明”），相信他们是商业领军人物。

“我们有能力让我们的孩子上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几年后他们将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肯定不会是商人，即便移居海外。”

买和卖之间隔着海洋

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没法儿跟普拉托的加工厂相比。早晨7点钟起床，中国那边已经是午饭时间了：

“因为有7个小时的时差，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上午。”

他在温州附近，他的家乡，有一个成衣厂。他们用QQ联系，一种在中国非常普及的聊天系统，拥有1.6亿用户。他们用这个系统交换文件、时装图片，或者其他创意点子。

“我不断学习，观察意大利女性的着装，购买一些时装样品，思考怎样修改，然后传给我在中国的设计师，让他们去实现。”

即便是在地球村，从创意到实现也需要时间。

“收到订单，一般需要一个月生产出来，另外需要一个月运到这里。”

通常选择海运，经济但时间漫长。一个20呎的标准集装箱，2500欧元。二十几天的行程，经过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塞得港，进入地中海，多数航线停靠那不勒斯港口。因此要提前作出计划，夏季服装的订单3月份就要开始准备。如果想要抓住一个突发的时尚、一个趋势性的颜色，也可以使用空运来跨越横在中间的海洋。

集装箱的清关最麻烦。李枚星说，有时候税务稽查人员对他

们有所歧视，对他们特别怀疑，但他没有谈太多。搞明白罗马进口商的秘诀，需要去那不勒斯，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深入探讨。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第一重要的是量，第二重要的是“渠道”。

“因为在海关停滞的时间，可能比穿越海洋的时间长很多。”一位知情的中国人这么说。

“罗马人的生意做得最大，他们可以找到最有效率的中介。跟港口里面的人关系好。找对了人去打点，会使清关程序顺畅些。”

这种服务不便宜：可能是数千欧元。但如果货值有10万欧元，还是值得的。

而且，有关系的帮助可以避免一些可怕的意外：

“几个月前，一个进口鞋子的福建商人去码头提货，发现他的集装箱全空了。后来，他在都凯斯卡的自由市场上看到了他的东西……”

即便集装箱完好无损，有些拖延也会消减货物的价值。阿尔铁柔（Ciro Altiero）对我们说：

“船靠岸后有五天清关时间。”

他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郊阿勒吉尼路268号（via Argine 268）中国批发商业中心的总经理。

“如果海关对报关文件和货物的相符性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有异议，集装箱就得停在那儿，直到消除异议。”

然后就要支付昂贵的滞箱费，还有律师费。如果货物是泳装，6月份还是9月份提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如同装了一箱子水，箱子上有个洞，每过一天都有一些水渗出来。虽然买了保险，很少有人申报真实的货值，因此保险赔偿相对于所受的损失，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如果你没有实力，两三次滞箱就能把你搞垮。罗马的中国进口商最有实力，他们人数最多而且互相帮助。但是关于这方面的事例，通常不会拿到桌面上来说。

李枚星不愿意多讲这方面的事情，把话题转向别的方向：

“我们挣的钱都留在这里了。我们买房子，买汽车，拉动这里的经济。20年前埃斯奎利诺荒无人烟，现在这里的房地产价值升了，不是降了，这是我们的功劳。”

接着说：“我们更大的贡献不是在进口，而是出口。我们把意大利文化带到中国：你们的时装、你们的质量、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我们为意大利制造作了宣传。”

他讲述了浙江的一个电视播音员，在播报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一场足球比赛时，特别偏爱我们的队员，以至于澳大利亚的大使写信给电视台表示不满。

有时候李枚星说很长一段话，跟两个翻译一起大笑，但翻译过来就浓缩成短短的几个字。我们像是在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搞笑剧情里，一个日本导演讲了很长很长的独白，像机关枪一样蹦出很多字句，告诉比尔·默瑞（Bill Murray）如何扮演他的角色——见证威士忌 Suntori 的魅力。当翻译翻过来的时候就只有：“更浓烈一些。”同样的挫败感。无法知道更多。

刘，佛罗伦萨心理学家的女朋友

跟刘志远（音译）谈话不用费力气。她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而且喜欢说话。她30岁，地道的罗马口音。晚饭前我们在玛让内拉（Marranella）的一个奶品酒吧见到她，住在这个城郊社区的居民来自很多不同国家。她在这里很受欢迎：

“啊，美人，你总算出现了……过来拥抱一下这儿的老人——你是来看妈妈的？”

“当然，孩子总是离不开父母，对吧？”

就这样对答如流，像意大利诗人贝利（Giuseppe Gioachino Belli）用罗马方言创作的十四行诗。如果当时有人把这一场景记录下来，作为完美融合的题材，可以在电视里直播而不需要任何剪辑。刘来到意大利时6岁，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两年前搬到史堪迪奇跟她的意大利男友住在一起。

“我读完了法律，现在暂时给市政府做翻译，并且在保龄球馆做临时收银员，从晚上9点到凌晨两点。”

她喜欢做夜班，说是习惯了。

从小她就在餐馆给父亲帮忙到很晚，现在父亲按意大利法律退休了，在家给大儿子看孩子。

“让人烦的并不是学习和工作有多累，而是你比其他同龄人出门晚，回家早。”

青少年时期，除去上学时间，她的社交窗口就局限在半夜到凌晨两点之间。也许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混血的社区，更人性化，她从来没有受到过同学的排挤。

小时候她经常去小镇上的福音派教堂合唱团唱歌：

“有些牧师，甚至是从美国来的，非常棒。”

读完高中，她跟父母说，想学心理学。

“如果说想去跳芭蕾可能会好些。”她回忆说。

因为她父亲认为那是一个没有客户的行业：

“哪个中国人会到你那里去寻求建议！你也知道我们的社团：如果有问题我们跟家里人商量。如果还不行，就去找亲戚，甚至牧师。你见到谁会去找一个治疗精神病的？”

父母给她的选择是经济和法律。她服从却没有死心。如果不能亲自去读心理学，就去跟读心理学的人交往。因此在大学里，她认识了她现在的男朋友。

“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问题。只是他来我家的时候，他们无法交流，就像一部40年前的电影，女婿和西西里岳父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做几个会意的鬼脸。”

两三年以后会是怎样？

“不知道。我大学毕业不是为了当收银员，但我也不是很想当律师。”

一种可能，是利用她的法律知识给企业做顾问。比如说，在她做进口生意的表姐那里，虽然她证实“现在都挣得少了”。一方面商品泛滥，另一方面信任遇到危机：

“现在进什么东西，中国制造商那边都要求至少50%的预付款。如果进口商没有那么多钱，但在中国有房产，就把那个押上。”

制造商除了发货之外，还派自己信任的人去收货款。如果谁耍滑头，他也只能得逞一次，然后会被列入中国海关的黑名单，永远别想再做生意了。

“因此无论如何，即便是向家人或朋友借钱，也不能丢了信誉，否则就彻底完了。”

这时候她母亲来电话说晚饭准备好了，她母亲56岁，还不想闲下来，一周三次给中国人看孩子。父亲甘心现在只当爷爷吗？

“有点不甘心，他的一些朋友建议他到浙江投资房地产。但是他对那里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离开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我哥哥都持反对意见。”

她唯一一次回到温州是13年前。

“去年我奶奶去世，他们寄来葬礼的录像，除了她的房子还是我记忆中的那样，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法辨认。”

不过她并不十分想念。而且“天天说中文有点儿累”。离开之前她又遇到一个熟人，她同学的姑姑。聊了些有关她孙子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

刘，以罗马人的方式风趣地回答：

“要是等着我，中国人就要成为稀有动物了……”

橘子花、多宝鱼和人头马

布兰卡乔宫（Palazzo Brancaccio）巴洛克风格的客厅曾经是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包括萨沃亚（Savoia）王朝的翁贝托（Umberto）国王举办宴会的地方。现在，它非常乐意向旁边维多利亚广场的显贵们敞开大门。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在这个宏伟的古罗马贵族的宅邸举办婚礼。

“我们从2000年开始有中国客户，最近四年增长迅速，现在平均一个月一次。”

罗马诺（Luca Romano）是这座豪华建筑的商务主管，他请我们坐在洛可可式的小桌旁喝咖啡。

在这里举办婚礼的人不差钱。

“他们对鱼很挑剔，要极新鲜的。经典菜单有龙虾、蟹肉丸子和多宝鱼，这些菜最受好评。有时他们会从第二道开始，最后吃面，但鱼一定要刚刚捕捞上来的。”

虽然他们有些怪异，前面我们也讲过许多，但他们却是非常好的客户。

“让人觉得最奇怪的，就是不能缺少那张接待桌，收集客人的礼物：全都是装在信封里的钱，也有人不装信封。回礼是一条烟或者丝绸床单。”

收完钱之后，放在布兰卡乔宫提供的办公室里，有摄像监控。

“参加这里的一场婚礼，最少要给500欧元，200多客人起码

能收到 20 万欧元。”

刨去一个客人 150 欧元的开销，还能剩下不少钱用于创业。

婚礼都是安排在午餐，没有晚宴，这种时间观念与意大利人非常不同。收集信封的时间安排在早上 8 点半到 9 点。

总是到最后一刻钟才去预订这个命中注定的日子。“中国人通常提前一个星期预订，而意大利人甚至提前六个月。”

在中国人的婚礼上绝对不能少的是人头马，如果没有这个牌子的白兰地，宴会开不成。

“他们喝很多酒，而且混着喝。有时会有人感觉不舒服。酒精让他们变得有些傲慢。有一次，一位客人坐到一个精致的桌子上，我们请他下来，他回应说：‘我坐坏了它，我付钱。’”

到切蛋糕的时候，能剩下 1/5 的客人就不错了。重要的是他们买过票了，如果想在活动结束后离开，完全自便。因为不少人从外地来，要花时间赶路回家。比方说李丽（音译），23 岁刚当妈妈，住在那不勒斯：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来罗马了，现在高速公路的收费涨了，光是路费，一次就花 80 欧元。有小孩，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是没办法，如果邀请你，你就得去。”

新人们，平均年龄在 24 岁，对一大半客人都不认识。但他们是受益者，因此对客人们鞠躬表示感谢。

在中国人的嘴里淘到金子的意大利人

俗话说，看见一个吃饱的人，就知道有一个付钱的人。布兰卡乔宫的豪华宴会，不是唯一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个案。牙科医生 G 大夫也感觉到了。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他害怕让公众知道他的一小部分客户是中国人，这会得罪他的大部分客户——意大利人。

“到我这里来看病的有很多重要人物，专家、政客、电影演员，我不想在多年的奋斗之后被轻易地定义成‘中国人的牙医’。”

他的一个朋友已经这样开玩笑，他一点都不喜欢。他父母劝他：

“G，这个地区来了很多中国人，你赶快换个地方吧，不然会丢了你的好客户。”

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诊所开业没几年，花了很多钱装修和购置设备，他不想离开埃斯奎利诺。一天，在当地一个有名的按摩中心，他结识了一个中文报社的社长。“我的总编能否去找你看牙？”社长得知他的职业之后问道。他给总编看了牙，而且很有远见地没有收费。作为回报，总编给他做了一个专访。不久之后，有两个中国人来看牙，但觉得价格太高而放弃了。他没再想这件事，直到2004年，他在中餐馆吃宫保鸡丁的时候，看见旁边桌子上的一本中文的黄页书，一年更新一次，免费发放。有一些意大利人在上面做广告。他打电话过去询问，得知一个整版彩页只要600欧元，如果登两次还有优惠。既然他决定违背父母，把他们看做一个资源而不是威胁，那就需要深入了解他们。他记得，使两个潜在客户搁浅的礁石是价格。

“那年夏天，我利用假期去了一趟中国。我去了北京和上海，在当地找的一个翻译，让他带我去参观牙科大学，以及各种不同的私人诊所，有好有坏。使价格降下来的唯一办法，是从中国购买材料，但我觉得太复杂了，我无法完全放心。”

回来之后，他至少明白了中国的大城市是什么标准，显然比浙江农村要高。广告有了效果，一些中国人来看牙。他觉得他一个人做不了。因此，就去他授课的牙科急救中心，跟那里的医生

们商量，他们很愿意做这个尝试，并赚些钱。这样，周六专门为中国人服务：

“最初来看牙的人里面，有人往地上吐痰。因此我把接待室分开，一定不能让两类客户待在一起。”

找人翻译了既往病史的表单和个人隐私声明。曾经有几个月，还聘了一位翻译。后来发现，最好是叫他们让会说意大利语的子女或朋友陪同。一传十，十传百。

“现在，总数 1200 名客户中有 120 名中国人，占 10% 而且还在增长。他们都很守规矩，从来没惹过任何麻烦，付款非常及时甚至提前。”

除了有一次，一个泥瓦小工陪着一个被他打掉两颗牙的人来补牙，有一点儿复杂，他们吵了起来。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教会他们不随地吐痰，不把脚放在桌子上，直到最后取消了接待室的种族隔离政策。

现在“C 系数”也出现在他诊所的说明书上，突出快速服务：“预约 24 小时安排就诊，急诊立即响应”，“全勤门诊”，“24 小时值班”。当地的商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通过给他们看牙，G 大夫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通常，他们的下颌骨非常有力，这表明他们经常咬牙，关闭颌骨。因此在给后部施麻药的时候，相对于意大利人，我要改变手法和剂量。”

他们为什么咬紧牙关？

“因为紧张，这会损坏牙齿，还会影响到胃，引起胃炎和溃疡。”

跟普拉托药剂师的诊断一样，这些征兆证明，这些可怕的劳动机器跟我们一样也会生锈。你们还记得，在 20 世纪初上海的影像里，黄包车夫、抬轿子的人、码头装卸工、建筑工地的泥瓦

小工吗？如果你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男人硬汉都有坚硬的颌骨。他们的名字叫“苦力”，艰苦而费力。长期的劳累会使人崩溃。

“在他们的既往病史里，很多人说曾经患有‘神经衰弱’。”

意大利人在20世纪80年代称之为心理崩溃，后来称之为“抑郁症”。也许刘的父亲低估了他同乡的脆弱。



第 12 章

除了工作，还有宗教信仰

——福音派、天主教、耶和华见证派，还有佛教

艰苦生活和精神世界

据说中国人唯一的信仰是工作，上帝是金钱，中国移民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祭献给了这个金钱上帝。当邓小平废除了共产主义对牟利的定罪，“戒律变成了图腾”。尤其是海外华侨，为了这个狂热的崇拜，历经艰险的旅程，背上沉重的债务。但是他们发现，工作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于是，他们在西方人司空见惯但对他们来说新奇特异的宗教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当然，佛教是起点。但更有基督教，这种如同“资本主义”、一度长期在中国受到禁止的宗教。因此天主教得到迅速恢复，接着是福音派和耶和华见证派。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国度，从哪里冒出玄学的渴望？其实艰苦生活和宗教是一对永远的伴侣。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孤立无援的时候，信教是一个经济且有效的方法，可以借此去接近他人，加入团体。因此，长着杏仁眼的信徒在不断增加。这种扩张不容易被注意到，因为不同于伊斯兰移民，他们不需要新的和不同的祭

拜场所。罗马的佛教徒利用一个车库，把它用锣鼓和龙等宇宙标志装饰起来。他们人数不多，所以不引人注目。天主教徒只需要借用现成的教堂安排祈祷活动。福音派和耶和华见证派不需要特别的地方，任何一个房间，放几把椅子就可以了。他们的上帝，跟我们的一样或者非常相似，不会产生任何社会问题；相反，有利于社会稳定。似乎是因为受到天主的笼罩，他们的眼睛变得更圆，肤色变得更红。在罗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一个年轻的汉学家帕囊奏内（Ilenia Parnanzone），参加了一个有关罗马中国教徒的统计调查，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她中文讲得很好。混在一群信徒中间参加弥撒，跟牧师和信徒交谈。但除了那些在教堂听了几千遍的话语外，很难有别的东西。跟她交谈之后我们发现，即便是专业人士，说服他们向外人敞开胸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还是没有想到，被采访者会是如此封闭。

福音派信徒的多疑

我们先从福音派开始，他们人数最多，最引人注目，最有组织。所有人都同意由王牧师来跟我们对话，他是蒙蒂（Monti）地区和平餐馆的老板。1984年他创建了意大利福音派中国人联合会。我们在下午3点之后给他的餐馆打电话，这个时间餐馆已经安静下来，他应该准备好了。

“我不太了解情况，”这是他客气而虚假的回答，“最好跟吴（Francesco）神父去谈，他意大利语说得好，也更了解情况。”

拿到一个电话号码不难，但确定一个约会很难。很多中国人不接来电。

当我们总算跟吴（Francesco）神父取得联系，告诉他我们想聊什么的时候，他清楚地拒绝说：

“不行。我们的董事会不允许我们接受采访。”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教堂也有董事会了？不会是邪教（Scientology）吧。但现在不是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安慰他，说这只是一个友好的交谈，为了写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版的书，到时候他可以校阅自己说的话。毫无用处。

“我们不跟记者交谈。”

第二天我们直接去找王牧师。傍晚6点，应该是餐馆最清闲的时候。他笑脸相迎，55岁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他跟我们打着招呼，说可以跟我们谈。

“但是现在不行：我正准备出门。”

我们能否确定一个时间？一个方便的时间见面？

“不用，这个时间就行，只是今天不行。”

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去他们祈祷的地方，去祈祷。

福音派在罗马的艾乌杰纽路（via Principe Eugenio），这是一条从维多利亚广场延伸出来的街道，是商店最集中的地方。每个周日的下午4点钟开始宗教仪式。门口有两名志愿者分发布道和歌曲的节目单。大厅里氖光灯的青灰色中有100多人。一个16岁的女孩很显眼，一双白色人造革的长筒靴，牛仔裤塞在靴子里。一个非常年轻的母亲，穿戴考究，旁边一个小女孩非常听话，一动不动几乎像是雕塑。男孩子们穿着NIKE鞋。长凳是意大利经济大发展时期的物件。地面是淡色冰冷的大理石。讲坛的左边有一块大屏幕，显示歌词内容。讲坛上轮换着不同的演讲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管风琴响起，合唱队开始唱歌。全是用中文。十分钟后一个志愿者走过来问我们是否听得懂。他建议我们去后

面的小客厅，那里用意大利语。

英的信条

教堂的B侧是一个无名的大型建筑。进到里面，穿过一个小工地，地上散落着灰泥袋子和脚手架零件，来到一扇写着“教堂·意大利语仪式”的门前。如同星际之门，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十几个年轻人一个紧挨一个在合唱。一个中国小男孩在弹钢琴，另一个同龄人在弹吉他，那种B. B. King式的吉他比他块头都大，一个40多岁的意大利人在调电子打击乐器，使它不太吵闹。在他们前面，一个16岁的女孩用手提电脑给投影仪翻页。有时专注唱歌，忘了翻页，但那些歌词他们早已牢记在心。

如果不是因为语言和信徒的面孔，感觉像是在美国的某个教堂。一样的音乐，一样的热情。文字固定在跟救世主会面的主题上。之后，英，20岁的主要演说者，叮嘱大家要感受幸福，要颂扬耶稣的爱，要敢于在公众面前祈祷：

“大声地说出来你们对上帝的感恩，完全不用担心被周围的人听到。”

祈祷情绪激动，富有戏剧性，表情虔诚。接着是各种感恩的话题：

“无尚荣耀的耶稣，感谢您给我们生活的力量，给我们期许美好明天的希望。”这样唱着赞美诗。

一个多小时之后，打击乐手意大利人放下乐器，拿起麦克风，开始说话：

“第11章 犹太人”

这一章节讲的是摩西被法老的女儿从水中救起收养，他怎么

会有勇气放弃这个幸运的机会。

“你们能够想象，在那个位置能得到多少优待吗？”

第 25 小节：

“我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起受到虐待，而不愿意享受有罪的一时之欢。”

第 26 小节：

“因为他认为，对基督的亵渎是一件比埃及的财富更严重的事情；他在考虑后果。”

这些场景的寓意很适合于教育青少年：

“每件事都是一个选择：早晨起床去上学，是一个选择。专心致志而不是聊天，遵从父母而不表现出不情愿，都是选择。”

但比起先知的选择，这些都不算什么：

“想想看，他可以拥有一切。好比今天，他可以向他的法老爷爷要一辆法拉利、一个游泳池，任何东西。但他放弃了。想想看这容易吗？不容易，但是有上帝的启示……”

这里的孩子们都是企业主的子女，怎样在目的不纯的商人中间布道呢？演说家知道该怎么说，为了不让家里的父母受到太多的指责，加上一条注解：

“基督并不是要大家都过穷日子。他只是要测试对他的爱，他赋予的角色和物质之间孰轻孰重。”

耶和华的大家庭

对中国移民来说，相信基督的路是一条逆行路，要对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方式作彻底检讨。几天后，我们在维多利奥广场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遇到韩方（音译），一个耶和华见证派信徒。他 35

岁，来意大利八年，老家在辽宁，中国北方的重工业省，他是姑姑给办过来的。韩曾经准备考托福，想去加拿大。但当命运中出现另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决定抓住它。

“头两三年很难过，总是想家。”

“我在一个餐厅里给厨师当助手，后来在中餐馆也干过。跟其他中国人住在一起，但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交情很浅。”

因此，当在街上两个微笑着的人走近他，用英语——那时他会说的唯一外语——告诉他，遵从耶和华能给人生赋予更高层次的意义时，他愿意相信。他开始学习圣经。让他更愿意学下去的是罗瑞塔（Loretta），《新华时报》（*Nuova Cina*）的翻译，他当时到该报社做管家。她也是耶和华家庭的成员，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1万多公里外的地方寻找幸运，许多人认为我们追逐的是财富。其实错了。因为耶稣清楚地指明，财富不能拯救我们的人生，相反，很有可能使我们变成它的奴隶。”

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感觉到解放。他说在遇到真理之前，他很容易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气。孤身一人，所以脆弱，情绪激动。现在，除了有妻子罗瑞塔和住在楼下的岳父一家人，还找到了一个大家庭，周三晚上和周日下午，大家聚在一起。因此还增加了社交活动。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日，在罗马东郊，玛让内拉地区艾拉托斯特内路54号（via Eratostene 54），耶和华见证派的教友们聚在一起，抨击物质主义。房间不大，木质讲坛，一扎颜色鲜艳的假花烘托出快乐的气氛。50多人，其中近十个小孩子。

一个30岁左右的意大利人，穿着深绿色西装和赭石色领带，用中文一句一句地领读小册子《瞭望塔》（*Torre di Guardia*），其

他人跟着他念。这是一个持续五周的活动，所有人在家里都要学习。按照美国的方式，每读完一段都要提些问题，帮助理解文字的意义；鼓励教徒们发言，表述自己的想法。中国人举手发言，似乎也在遵循着孔夫子的克己礼让。不会把手臂全部举起来，而是微微向后弯曲，显得不太冒失。一个穿石膏色西装、打着淡黄色领带的大男孩，像电视辩论节目里一样，把话筒递给要发言的人。韩方对比他短暂的天主教经历说，那里“大家只有一本圣经”。

而这里，书是活的，以自由和激情对书作着注解。有些段落正好能给移民尤其是顽强的中国人以力量：

“想放弃吗？”站在我们旁边的女士念道。

“不要让撒旦乘虚而入。学习圣经，炽热地祈祷，经常参加集会，教友们的陪伴会给你力量。”

还有让中国人听了很受用的话：

“不要做那些浪费时间的消遣，去做些事情帮助他人。”

一方面指责他们以金钱为重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引导他们把出名的顽强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通晓多种语言的耶和華见证派赢得市场

这么多的中国人成为耶和華见证派信徒（最近的全国大会上 有上千人，其中约 400 人已经受洗），得益于聪明的市场营销策略。见证派是唯一一个采用个性化方法对待所招募的移民羔羊的。法伊斯（Massimo Fais），完美的演说者，对我们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圣经的信息，以接受者的语言传递给他。因此我们努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

他十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曾经是布法劳塔路（via della Bufalotta）地区的志愿者，那里的中国人每年都在增长，他和他的上司对这个主意非常热心。

“经过三四年，每天坚持学习三个小时，我基本上可以应付了。但准备一个聚会，我还是要花上几个小时。”

他提到，古代传教士保罗（Paolo）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学习外语。章节停顿处，咏唱结束后，站在法伊斯右边的一个男人，有时替代他朗读。这个有些僵硬、穿一身黑的男人叫田东（音译），帕梅拉（Pamela）是他的意大利妻子。他来自中国东北，靠近朝鲜的地方。

“我曾经是工人，无神论者。2001年我来到那不勒斯郊区，每天在缝纫机上工作18个小时。”

唯一和蔼可亲、会说中文的意大利人，是两个耶和華见证派，把计件加工厂作为他们传教的地方。

“他们可以无条件地、任何时间来工厂，只要能向我解释圣经。他们的献身精神让我感动。”

第二年他接受了洗礼。耶和華见证派的网络对工作也有帮助。他们给他找了一个意大利人开的绢网印刷厂的工作：

“需要自己垫一些，不管吃住；但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使我有时间学习了。”

后来他又换过几个工作，来到罗马，认识了金发痴情的人生伴侣，现在正有孕在身。他的脸上洋溢着一个幸福男人的容光：

“在我放弃拼命挣钱的念头之后，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现在他开货车给酒吧和餐厅送饮料。还是给意大利人打工，老板也是耶和華见证派的教友：

“比给中国人打工强多了，给中国人打工，活儿干得多，钱拿得少。”没有时间读圣经。

不能容忍达赖喇嘛的佛教徒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一个中国的佛教徒失去传统的平和：就是谈起达赖喇嘛。

“出家人对现世不感兴趣，只是研究它。而他非常看重现世，他已经是个政客了。”翟雷（音译）这样说。

他是维多利亚广场后面佛教寺庙的发言人。他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个小小的祭拜场所像是一个神秘的车库，大门是红色的铁门，入口处有一尊金色的大肚佛像，脚边放着些时令水果，“就像花卉一样，但也是一种方便，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充饥”。他27岁，眉毛短而上挑，1.8米的个子在中国人中不多见，他来自哈尔滨，中国最北方的城市。

他把我们领到第二个房间，这里有大大小小一排佛像，开始从头讲起。

“这个寺庙是两年半以前开的，由热心人和当地商人帮助建成。这是我们的精神需求，其实所有的中国人，即使没有说，或没有完全意识到，都有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最普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估计有两亿信徒，占人口16%，两种信仰各占一半。春季第一个周日的下午6点钟，快关门的时间，费鲁奇奥路（via Ferruccio）这里只有两名妇女在用拖布擦地，年轻人告诉我们，每个周末有近百名中国人到这里来祭拜。在全意大利大概有“几千”信徒。这一支佛教，既不像意大利人推崇的那种更靠近日本人的佛教，也不像西藏的藏传佛教。

其理论基于五项原则，如同伊斯兰教有它的理论“支柱”。一

个合格的佛教徒不能杀生，连一个苍蝇或一只蚂蚁都不能杀，因为根据轮回转世，你不知道实际上杀的是谁。不能偷窃，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连一把盐都不能拿。不能对已婚的女人或男人有非分之想。不能说谎。不喝酒精类饮品。除了这些教规戒律，其他都还灵活。需要僧侣来念经，但不是总能有。

“有时候从中国过来，只能待几个月，因为签证有效期不允许他们久留。意大利政府不给我们任何通融，认为我们的只是一种文化，不是宗教信仰。”

这个小伙子给我们解说佛教的“神灵家族”，有坐在中间的“阿弥陀佛”和两边的众佛。他曾在哈尔滨读法律，他认为意大利能给他的人生一个强烈震动，于是就来了这里，在这个国家他没有亲戚。

“我在罗马大学（Tre）读公共管理。”他解释说。

虽然意大利的体制跟中国非常不同，但了解一个发达国家的官僚政治是如何运作的非常有用。他一边学习，一边在中国人开的旅馆里看门值夜班。他有时间反思，仔细观察我们。

“跟你们意大利人主要的区别？如果兜里有1000欧元，你们会全花光。我们最多花500欧元，剩下的存起来以应未来。你们只看眼前，只想着自己，我们不是。”

他提到佛祖释迦牟尼，2550年前始创佛教；以中国人的方式讲述佛陀悉达多（Siddharta），放弃富贵的王子生活，悟出真理。可以想象，给商人们讲真理一定很费劲，商人们一边给寺庙捐资以求积功德，一边做些不太伤天害理的越轨之事：

“私底下，他们希望佛能帮助他们生意兴隆。但佛只能给人们一颗平静的心。”

对进口商们来说，只有腰包鼓鼓，心才可以平静地跳动。

第 13 章

那不勒斯，雾中的码头

——宋先生的可疑行当和进出口生意

去中国，不需要护照

那不勒斯有两个地方，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到中国。一个是火车站旁的都凯斯卡市场，说中文的人多得就像在北京。另一个是海港码头，那里的东西会说中文。首先是海量的集装箱，看看它们的标牌：中国远洋、中国海运，香港的东方海外集装箱、中国运输，还有台湾的常青海运、杨明、万海航运。无论陆地还是海洋，哪里有交汇点，哪里就有中国人。货物要尽快流转，它们漂洋过海，先送到罗马进口商的手里，然后从那里分发到各个地方，包括那不勒斯。

码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城中城”，11公里长，占地面积140万平方米，只是比陆地上的那个城市更军事化，表面上更整齐一些。两者之间的连接靠五条通道。集装箱要穿过很多道门，才能踏上内陆运输的行程。排成长龙的卡车是来拉海关放行的集装箱的。

在圣-艾拉斯摩（Sant' Erasmo）通道，最靠近高速公路的地

方，我们碰到三条脱毛狗。不是用来看家的，是流浪狗，靠海关职员施舍的食物生活。似乎是为了报答喂养而找点活干，这三条狗一直追着我们，冲我们狂叫，不放我们过去。直到我们借助飞驰的汽车和卡车穿过马路，它们才放弃。我们总算来到那个鲜黄色的小楼，跟码头的一个主人会面。

“萨维亚诺在说什么？”

“您看，这就是丑闻的震中，那本有关黑手党的著名书籍用整个第一章所描述的地方就是这里。就在您的眼前，您自己评价。”

雷格拉-德费鸥上尉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穿着细条纹衬衫，紧扣着袖口。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宝桑（Bausan）堤道，一排排彩色的集装箱反射着4月下旬的阳光。他谈到《那不勒斯的黑手党》，谈到那不勒斯码头主要运营商科纳泰科的一把手。但他不愿提及书和作者的名字，好像这样就可以使批评不至于针对个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让意大利华裔协会的年轻人、中国移民的第二代感到羞辱，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一句一句地进行反驳。

那本畅销书是这样开始的：

“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到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还有年轻小伙子。死人。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知道他们

去了哪里。”

美丽的谎言，招来许多反对的声音。作者萨维亚诺马上出来解释说，跟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一样，他写的这本书是历史小说，“掺和了历史和虚构”的内容。还算诚实，但声明并不能平息被惹恼的怒火。首席执行官说：

“您想想看，在这样一个严加看管的地方能出这种事情吗？（这里）到处都有监视摄像头，24小时警备系统。如果有这种事，我能不知道吗？700名码头职工能不到处去说吗？那还不早就上报纸了？……”

意大利华裔协会的年轻人，笑话那个“吊车司机”，唯一的匿名知情人，在回忆那个恐怖场景时闭上眼睛，就像恐怖电影里演的一样：

“是谁想隐藏这件事？是中国人吗？我们对那不勒斯港口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做出藏匿十几具尸体这么残酷的事吗？谁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亲人呢？尤其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法律对于运输尸体是有严格规定的。在中国，尸体必须被火化，运输未火化的尸体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还有可能受到法律的惩治。”

如果目的是为了把死人的身份文件转给活人，事实上有很多其他更谨慎的方法。在那个环抱海湾的城市里，从无产阶级的詹图科（Gianturco，有最出名的中国人的商业中心）到贵族的基艾亚（Chiaia，有些时装店也展出了中国制造），各式各样的办法都有。不可否认，作为科纳泰科的半个东家，中国人对港口的事情有话语权。但也不能像警惕的保护主义者那样，放弃每年50万只集装箱中来自中国的那75%。难道都是仿造的、违法的、危险的物品吗？当然不是。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对这个不透明的买卖，我们只了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仿造品，在传说和事实之间

说到仿造品有多大的量，各种不靠谱的数据跳出来，让人无法忍受。确实，它是一个隐形经济，没有发票和会计证明，但每年全球交易量，从世界海关组织（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估计的5120亿美元，到意大利税务稽查署的15亿欧元；直到2007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这个数据改成2000亿美元，然后在它那158页的报告里说，有可能是这个数，有可能更多，也有可能更少。现在习惯的估算方法，是在中国的生产税收基础上增加70%。

大约3/4 在世界上流通的仿造品，来自于广东深圳或中国某地的小工厂。许多中国商品经过那不勒斯港口进入意大利，进入欧洲。罗马和它传奇的进口商离这儿不远，200公里，比热那亚港口（500公里）近很多。中国远洋，世界第三大船主，停靠那不勒斯码头已有很久的传统，后来成为科纳泰科的半个东家。还有一个名声就是，那不勒斯港口对运来的海量集装箱极少进行检查。多年来，对付这个坏名声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搞一场严查运动。

2000年，海关对24.7%从中国运来的集装箱进行开箱检查，2004年提高到36.8%。运量立即有了反应，从2003年到第二年，运到那不勒斯港的中国纺织品下降71%，这让其他码头从中受益，包括拉-斯佩齐亚（La Spezia）^①、里窝那（Livorno）^②、塔兰托、焦亚-陶罗和巴塞罗那。当然还有热那亚，每年接收大约100万只来自中国的集装箱，是其总量的70%。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开心

①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西南端，属于利古里亚行政区。

②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亚平宁山脉的西边，属于托斯卡纳行政区。

的国家是怎么回事吧。2004年的严查运动使到达那不勒斯的集装箱数量降到最低点。2005年，进口商们重新组织，找到新的关系渠道，集装箱从34.7万只增加到37.3万只。2006年达到44.4万只，第二年又超过了这个数。

“海关硕鼠”

应该说说热那亚港，那不勒斯海关加强监管的最大受益者，看看那里的码头是否也溅上污泥。虽然罗马的进口商闭口不谈，但那不勒斯批发商的证词已足够说明问题。也许，关于沃特里（Voltri）海关的报道，比我们在那不勒斯客气的谈话能更好地说明情况。因为在热那亚港，为了加快通关，或者免除检查，贿赂曾经是流通货币。有一段时期，这就是规矩。

2003年那不勒斯港口开始严查起来，热那亚港突然增加了许多集装箱等待处理。新的客户来到这里，希望早些提出货来。有人见状做起了生意。2004年12月，经过几个月的监听、隐蔽拍摄和300多名税务稽查人员的努力，查出了这些“海关硕鼠”。

这也许是海关从来没有过的、涉案范围如此之广的丑闻。93人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德西奥（Gaetano De Sio），沃特里一个重要的部门负责人。公诉人平托（Francesco Pinto）说：货运代理经常贿赂海关人员，好让他们闭上一只眼，有时甚至是两只眼。

“其他费用”疏通监管

起因源自热那亚的阿尔波（Albo Sped）货运代理公司一个新

员工的举报，他不愿意成为犯罪的同伙。他给调查人员提供从公司垃圾桶里捡到的传真，这些传真记录贿赂的钱数，通报给进口商。记在“报关其他费用”项下，这是给齿轮上的润滑油，让它转快点，消除滞箱的风险。钱数各不相同，一般数目不大，为的是保证系统安全地长久运行。50 欧元可以把材料放到加急处理，200 欧元可以拿到虚假报关单。

被审查的人说，有的海关人员收受汽油票，或者直接从打开的集装箱里拿走值钱的东西，如名牌服装、高科技产品、冰冻鲑鱼、肉排和香槟酒。

“没错，我是拿了点儿东西。但不至于因为几瓶橄榄油、两件衬衫、一箱子葡萄酒就审查我吧？在热那亚港口谁没拿过呢？你们说呀，别让我笑话。”

一个不法分子想淡化其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利用法不责众的心理，“大家都这么做”。他们曾经给海关职员马奇（Marco Marchi）3500 欧元（“我拒绝了”），让他放行一个中国人运往摩德纳（Modena）的仿造服装。一段时间，审查处于僵持状态，调查人员不满意受审者指出的几个“烂苹果”。怎么可能他们的头儿不知情呢？

“难道货运代理的职员自己掏腰包？”媒体《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嘲讽说。

“除非我们遇到了为企业献身的例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默契的链条在最薄弱的环节，巴给诺（Matteo Baghino）这里被打开，他曾经是热那亚青少年足球队的中锋。在音特润朴货代公司（Interimp），他的工作是清理废纸，有人还叫他“冠军”。他无法绕过公诉人的问话，他被告知如果合作将会减轻处罚，因此招认了：

“是我的上司让我这么做的，他还给了我钱。”

其他人也跟着招供了。

“他们要钱，否则就不给集装箱放行，我还帮他们在饭馆吃饭和超市买东西付过账。”

这是斯帕玛货代公司（Spamar）的职员龙格（Biagio Longo），指控海关官员穆斯梅奇（Rosario Musmeci）的陈述。价格由穆斯梅奇去谈，他的两个同事进入海关的计算机系统“修改报关单”。改变数量，更换货物内容，伪造虚假申报的清关单据。这样，集装箱就可以安然无恙地通关了。2008年3月，三个货代公司协商好：认罪服法，每个公司3万欧元的罚款。太轻了。四十几人受到法办。在那个不守法的季节里，沃特里海关几乎全空了。一个集装箱从上海运到地中海，一般要2500欧元。在热那亚，有人花同样的价钱，为了避免这短短几百米用跨越太平洋一样长的时间走完。

2008年1月，火烧到巴里（Bari）码头^①，海关办公室受到搜查，提交审查的案例至少400件，因为很多货物进了关却没有记录。同样有问题的还有那不勒斯港口，并不像从科纳泰科的窗口望见的大海那样平静。除非卢奇加诺（Giovanni Lucignano）是个例外。

Gulliver 和码头生意

如果你们从来没听说过 Gulliver 这个名字，用 Google 搜索一下，你们会找到用不规范的英文书写的公司介绍，2005年6月更新的：

^① 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南部，属于普利亚行政区。

“We are international company. In Italy we provid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 Brazil we are the most milk production company, we produce full cream milk, skimmed milk and with or with added vitamins. And now desirous of expanding our market to China.”

在意大利搞运输，在巴西生产牛奶，希望扩张到中国市场。要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到公司所在地，Nola 港区 D1 和 A2 组，或者跟助理刘（Eva）女士联系，网站上有电话号码。听法官说，该公司被指控犯罪，它主要的经营活动并不是上面写的那些。

意大利《新闻周刊》（*L' espresso*）的调查引用其中一个股东吉安皮埃罗·梅（Giampiero Mei）的坦白交代，这个进口商实际上是把一些东西黑着弄进来：

“意大利海关这边没问题，现在唯一的监管来自中国那边。”

卢奇加诺是它的报关代理，处理90%从中国来的货物（“全都是纺织品”）。干这行小有名气，手里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关系渠道，能让任何东西通过海关。办法是，让内线去检查卢奇加诺申报的集装箱，只检查第一排纸盒子，或者周边的货物，知道禁运的物品装在一个33立方米的箱子里，放在中间靠箱底的位置。仿名牌服装、被污染鱼类、工业天平等被申报成食品、无配额限制的短袖衫和裤子。

2006年4月，那不勒斯的法官马雷斯卡（Catello Maresca）和马利诺（Raffeale Marino）对30人发出逮捕令，其中包括货代、海关和中介公司的人员。Gulliver，从卢奇加诺的案子中牵连出来，由博第娄（Salvatore Bottillo）上校带领税务稽查人员调查处理。马雷斯卡法官给我们解释说，当一个中国进口商需要进口一批货物时，找吉安皮埃罗·梅做中介可以得到全套服务：

“如果执照到期了，或者没有特许进口权，中介能把事情搞定。需要伪造发票，让申报的东西跟实际的不一样，没问题。纸

面上的材料改好之后，交给卢奇加诺，去跟它的海关关系串通好。”

“这样，当那个集装箱到岸的时候，已经有一帮人在等着它了。最后一个环节是负责内陆运输的鲁普尔（Pasquale Ruoppo）。”

它的角色经常是送货，但不是货单上写的地址，只有卡车司机知道应该送到哪里。

“被逮捕的人里面有两名那不勒斯海关的官员，两名罗马的以及税务稽查署的几名士官。目前被证实的行贿者都是罗马人，一个集装箱收500欧元以免于检查或不实申报。虽然价格很高，但这种交易却广泛存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追查了6000万欧元的非法资金。总之，这是一个相当赚钱的生意。”

黑手党不会放过它吧。

电话监听捕捉到津齐（Pasquale Zinzi）的名字，“塞康迪亚诺联盟”（Secondigliano）的财务官之一。他是为了平息卢奇加诺和鲁普尔的争吵而出现的。

“显然，他对这两个公司的影响力很大，但一直没搞清楚他是什么角色。”

检察官失望地说。至今唯一被定罪的是鲁普尔。其他的还没有结案。有几次开庭，人们看见津齐坐在观众席上。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港口会看见这类人走动。但不久前，税务稽查署博第娄上校地毯式搜查的结果，不是耸耸肩膀就可以了事的：港口2200名工作人员中，440人犯有前科，其中好些人就是因为走私。在法官和税务人员介入之前，卢奇加诺曾经被吊销执照，因为在一年的时间里，接到330起关于违法的举报。审判文件里是这样写的：

“它的核心业务是绕过进口限制，逃脱海关征税，不遵守相关规定，使守法者的利益受到损失。”

卢奇加诺曾经成为欧洲的参照点，海关的侯迪尼（Houdini），那个能够解开任何捆绑的魔术大师。后来他把钱投资在房地产上，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买了一整栋楼。他出局之后，难道没有人接过他的接力棒？看着海量的集装箱涌向那不勒斯，从犯罪经济的角度来说，岂不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从海关出来之后，很多运送集装箱的卡车踏上开往罗马的路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罗马的中国进口商人多势众。那不勒斯的批发商也要从他们那里进货。有时候，流动商贩为了避免中间转手加价，直接去罗马：

“有人一个星期往罗马跑两三个来回。早晨 6:24 的火车上都是塞内加尔人，8:30 到维多利亚广场，快中午的时候又回到那不勒斯。一个来回火车票 40 欧元，如果买月票 150 欧元就可以随便坐了。”

意大利企业主阿尔铁柔对我们说，他于两年前在东郊阿勒吉尼路，跟七个中国合伙人成立了中国批发商业中心，以打破中国市场（Cinamercato）商业平台的独家垄断。

另一件中国人最擅长的事，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拆台。车卡纽教授很清楚这一点，她一生都在研究他们，最受不了报喜不报忧的人。在她的《意大利的中国人》这本书里，写到佛罗伦萨电台一个专题节目的嘉宾徐先生说的话：

“我们中国人一点儿不像犹太人。对中国人来说，跟你竞争的中国人是最大的敌人。你看见过两个在意大利开餐馆的中国老板在街上遇到了会怎样吗？他们彼此住得很近，但避免见面，不打

招呼，假装对方不存在。”

这毛病不是在 2008 年的意大利才有的，这是民族的陈年痼疾。因为林语堂，移民美国的发明家和作家，在 1935 年写的《吾国与吾民》这本书里做过同样的描述。还有十几年后的柏杨，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著有《丑陋的中国人》。他们的同胞，尤其是在国外，变得好斗，不团结，甚至做损人不利己的事，生怕隔壁的中国同行得到一点好处。因此，中国市场的星星，不能在那不勒斯的天空独自闪亮太久。

中国市场的贝卢斯科尼，其短暂兴衰

詹图科的大型市场，建于 2003 年，离税务稽查署的营地 (baschi verdi) 两步路。上百个摊位，室内 5000 平方米，室外 1 万平方米。像是缩小版的罗湖，深圳的商业中心，香港的主妇们去那里花 1/3 的价钱做指甲，还能找到无数的仿路易 - 威登或仿古奇。只是这里的摊位没有那样拥挤，还能让佛切拉 (Forcella) 和萨棱托 (Salento) 来的商贩喘口气。

建立这个市场的想法，是为了减轻都凯斯卡市场的压力，那里靠近火车站，人们有很多抱怨，为了避免出现米兰的情况，另外也是为了集中商店，让客户们更省事一些。在格兰德 (via Carriera Grande) 100 米的街道上，挤满了 25 家商店。全是红灯笼，一个挨着一个，波里奥路 (via Poerio) 和马达类娜 (Maddalena) 也一样。投资的钱中国人有，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是把钱放在那儿不动。

宋志才 (音译) 非常明白这一点，他生于 1964 年，父亲是满洲的一个农民。原本无名的他，一跃成为詹图科的中国市场项目

的负责人。意大利语说得还行，穿着考究，不隐瞒对贝卢斯科尼生意才能的欣赏。有些过分天真地想向他学习。市场开业两个月后，他对着摄像机，签署了收购 Palmese 足球队 70% 股权的协议。他作出的晋级承诺，连那不勒斯的守护神圣杰纳柔（San Gennaro）都不敢。他要成为向中国引进意大利足球的官方代理。他非常出名，家喻户晓。他的非凡经历有一个见证人：迭戈 - 阿曼多 - 马拉多纳（Diego Armando Maradona），阿根廷足球奇才。

在中国开设“马拉多纳”连锁店，销售体育用品，筹码是 67.5 万欧元？可以做。本来应该是宋陪同去上海，临行前换成他的妻子。原来，他不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了，因为在他来那不勒斯之前，也就是十几年前，他在中国被判严重诈骗罪。哈尔滨警察局通过国际合作对他执行抓捕，1998 年他在天后监狱（Regina Coeli）待了 16 个月。不光彩的过去重新抓住他，损坏他的形象。中国市场的股东们把他开除出董事会。计划在码头旁边建造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厦项目被取消。最后连詹图科的商业中心也受到影响。

《共和国报》的两篇文章《那不勒斯发现中国人宋》和《宋先生的溃败》间隔不过三个月的时间。90 天，以中国人的速度，可以建起一座摩天大楼，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你跟他说，要尊重劳动者的权利，他会笑容可掬地说：

“正确，所有人都应该守法，我是一个严肃的生意人。”

跟他有关的最新消息是 2008 年 3 月底。三个杀手刺杀了惯犯克利斯戴洛（Rocco Cristello），就在他位于韦拉弄 - 布里安扎（Verano Brianza）的别墅门前。他曾向一个庞大的计划投了很多钱，计划打造欧洲最大的中国商品中心。在米兰慕久（Muggio）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4000 万欧元。他的中国合伙人，正是那不勒斯的宋志才。福希奥内（Francesco Forgione）领导的反黑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

“克利斯戴洛犯罪团伙想通过这项生意洗钱。”

最后没成。

中国人最恨的人，阿勒吉尼市场的老板

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星期，跟中国市场竞争的阿勒吉尼市场的一个公众人物也出事了。《晨报》（*il Mattino*）4月19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中国服装之王被捕》的文章，讲述严增（音译）是如何掉进自己设的陷阱的。一个税务人员在市场百来个摊位中查出一个小小的不合法事件，为了安慰这个税务人员，这位33岁的发言人把他约到办公室谈话，然后塞给他两沓百元钞票，以示好意。但上士没有交换好意，而是告发他行贿。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分量和华人社会的反应，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严增是那不勒斯华人企业主中出头露面最多、最遭人憎恨的一个。因为意大利语说得好，又懂得人的心理，他成为都凯斯卡市场的商会主席。他利用职权写信给市政府，说商人们都想离开这里，搬到在建的阿勒吉尼商业中心。

可惜的是相关的人都不知道。210家中国商店威胁说，要请律师否认这件事。他一点也不担心，继续带着两个保镖到处逛，其中一个保镖是意大利人，以前当过警察；另一个是黑人，1.9米的大块头：

“我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你们别跟我要滑头。”

华人社团里的支柱人物，年轻的吴（Salvio）面前放着一份《晨报》，他给我们解释说：

“这里的商人们说，那些在他看来最不听话的商店，果然受到警察更多的检查，是他去告的。”

我们坐在波里奥路的一家中餐馆里，人们对严增的被捕非常兴奋。隔壁 Minni 鞋店的老板坐到我们的桌边，拿起报纸，用手中的牙签不断戳点被捕人的头像：

“坏蛋，大坏蛋。”

吴给我们翻译说，那个人来过好些次，要钱“为了付给警察，得到清静”。这家鞋店的老板没给，后来受到好些检查，使生意瘫痪。他说，现在鞋子只能卖5欧元，长靴10欧元，能撑下来真是奇迹。

中国人做生意的传统领域被两把火烧了。一把火是第二个商业中心的竞争，另一把火是从中国国内运来的货物。结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商店从210家锐减为120家。每一家幸存下来的商店，以自己的方式庆祝那个破坏信任、激化矛盾的人被捕。

我是吴，我来解决问题

唯一让吴感到惊奇的是那个人栽在一点小钱上。吴不是个虚伪的人，他知道中国人，也知道意大利人是怎么回事。

“中国人的格言是：做生意以和为贵。不管是对付窃贼还是警察，最好不要告发，打开钱包解决问题。”

严增对贿赂的世界语掌握得很好。

“他们跟我说，这里都是付钱的，从来都是如此。”

吴说：“如果一个交警把你拦住，车上有不该有的东西，你在给他驾照的时候，里面夹上50欧元。他们说，星期天，在去往特兹格诺（Terzigno）方向的高速公路入口，哨卡能从小旅行车揩到不少油，那些车是去罗马送货的。”

我们还没有说到黑社会的保护费。

“头几次黑社会的人到店里索要保护费时，店主们假装听不懂意大利语。后来，为了把意图表示清楚，2005年，他们烧了我们七间店铺。即便如此，我们没有低头，上千名中国人一起上街游行，要求加大力度维护治安。”

经过那次事情，现年29岁的他，卖掉了自己的饰品店，创办了SiCiNa，一个“工会组织”，主要用来解决华人社团中最棘手的问题。

“我和其他三个年轻人不顾很多长者的反对，出庭作证，让一个敲诈分子绳之以法。那时候有很多担心，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自从那次成功以后，对我们的侵犯减少许多。”

但盗窃不是。

“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信任银行，兜里总是揣着现金。因此他们等到商店关门的时候，抢店主的手提包。”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更加胆大，甚至进入商店抢劫。萨开蒂（Maurizia Sacchetti），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授，最受华人社会尊敬的意大利人，对此也有了解：

“我一直生活在佛切拉，从来没被偷过。我去一个中国商店，却被抢了包。”

那是一个傍晚，她在跟她的学生平静地聊天，挎包放在阳台里，这时一个小伙子跳了进来，抓住包跳上一个摩托车跑了。她报了警，但中国人被抢十次，可能只报一次。

“他们认为报警没用，他们不喜欢干没用的事。”

最近冲突有所升级。位于都灵路（via Torino）和博洛尼亚路（via Bologna）之间的几家新商店，受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光顾。

吴说：“有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向店主索要5000欧元，以换取安宁。店主没答应，第二天发现门锁被胶水封住，不能用了。两个月内发生了三起。”

如果是他，就去报警。但受害者特别小心。他们更愿意找他帮忙做些不太麻烦的事。

“我在所有事情上帮助他们，包括找社区医生、水电合同过户、报名参加免费的意大利语学习班，等等。”

商人们联合起来支付一个很小的数目，以支持他的工作，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在法院和公共管理部门做文化中介的工作。

“以前我有自己的饰品店时，收入不错。这个区域，我是第一家。后来几个月内，新开了四家，卖的东西都差不多。两年内达到20家。以前我卖8欧元的东西，后来只能卖3欧元，低于成本。对他们来说也是灾难，但明白过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第 14 章

为中国人服务的那不勒斯保姆

——太多的活儿要做，孩子就由那不勒斯妈妈带大

颠倒的世界

对那些缝纫工人的“孤儿们”来说，“中国人”就是噩梦的同义词。六岁的萨拉（Sara）夜里突然惊醒，呜咽着：

“我要当意大利人！”

还有她八岁的“小姐姐”玛努艾拉（Manuela）。在温州机场，罗伯特（Roberto）紧抓着丽达（Rita）手上的挎包带子，似乎那是个救生圈。还是让丽达来讲吧，因为她给罗伯特当了八年的母亲：

“他要确定能跟我一起回那不勒斯，他害怕父母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把他留在温州。”

丽达是许多那不勒斯保姆中的一员，在自己家里照看中国小孩。只有在这里，只有跟中国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移民请一个当地人做保姆。

一个颠倒的世界。雇主是他们，保姆是我们。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因为那些女人，不仅仅是帮助父母照看孩子，而是替代

他们，直到他们有时间把孩子接回去。这些孩子，吃着普玛柔拉西红柿酱（pummarola）而不是饺子长大，知道马拉多纳的一切却没听说过毛泽东，把自己血统的文化当做奇异和威胁。“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记忆和痛苦的景象。在爷爷奶奶家，听不懂一句周围人说的话。在学校的宿舍，用洗脸盆盛凉水洗澡。孤独也像这水一样冰凉。亲生父母住的公寓里，没有保姆家那种好闻的香味，而是油烟和豆子的味道，很多人排队上厕所，说着让人听不懂的方言。如果这就是祖国，那收养的国家要好百倍。如果亲生母亲就是那个在留下烙印的关键几年里两个星期见到一次的人；那每天三餐都能见到，尤其是夜里帮着赶走噩梦的替代母亲要好上千倍。

但法官不这样认为。虽然是两厢情愿，可法律就是法律，这是“非法收养”。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推出新论题的机会，命名为“个人生活计划性的压缩”，海外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突出。换句话说就是：只考虑工作，排除一切影响工作的因素，包括子女，用钱外包出去。刚好那不勒斯人有一个专长，就是做保姆。有一位50岁的女士，子女都长大独立了，以每月500欧元的价格，把别人的小孩放到自己家里照看。现在价格增长很快。

吃、住和照看都包含在里面。客观地讲，它是学习意大利语、融入社会的最好的一个途径。也许儿童教育学家要颤抖了，但这就好比高中生到国外进行的文化交流，提前到了幼儿园。唯一一个副作用，也是很容易预见的，就是当长着杏仁眼的那不勒斯顽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时候，会爆发。这时候，对孩子来说，亲生父母就像是闯入生活中的外人，虽然未必是不喜欢，但毕竟搅乱了过去的平静生活。当然，并不总是这样。经常，亲生母亲和替代母亲琢磨出一套渐进的聪明办法，让孩子逐渐适应。

普玛柔拉西红柿酱的家

那两个非亲非故的小姐妹住在米兰路（via Milano），这是一条从加里波第（Garibaldi）广场延伸出去，挤满了小摊贩和土耳其烤肉店的街道。她们的家在一座20世纪60年代建筑的第四层，从门牌上看，里面还有一个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电梯需要投币10欧分才能使用。楼梯是裸露的水泥地面，曾经覆盖着地毯，现在只剩下过路人的影子和烟头，来来往往的有亚洲人和摩洛哥人。肩上扛着装满货物的纸箱子，是他们在街上卖的服装。女主人给我们打开门，把我们让进宽敞的房间。

客厅明亮而整洁，两个桃红色的沙发面对面摆着。安娜（Anna）55岁，1.6米的个头，硬朗，穿一身黑色，脸上和蔼地微笑着。她只差三门考试就能拿到海洋经济学的学位。那时她要照看自己的孩子，还要帮家里挣钱。因此她到一个交通信号系统公司工作，工作了很多年，直到公司关门，然后她不得不另想办法。

“我在家里给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办课外班，大家一起做作业。社区里都知道我的名字，一天一个中国人靠近我，问我能否给她照看女儿。”

空间是有的，她自己的女儿早早地让她当上了姥姥，独立在外面生活，她丈夫很久以前离家出走，没留下只言片语。中国小女孩的到来，可以让她意外地重获年轻的感觉，并且增加一些收入，因此答应了。

“玛努艾拉被送来的时候只有三天大。她妈妈跟男友大吵一架，分手了。她原来是普拉托的缝纫女工，刚来那不勒斯不久，

有时一天工作 18 个小时，主要是下午和夜里干活。怎么能照顾孩子？一个如此可爱和需要人疼的孩子，我每月 60 万里拉（约合 310 欧元）就答应下来了，虽然我知道，现在有些给中国人看孩子的保姆要 1000 欧元。那时是 2000 年，直到现在，这孩子还在跟着我。”

孩子的妈妈很少过来。一方面是路上要花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另一方面她的工作时间又长又古怪，很难找到合适的时间。后来她们发现，每次见面之后，玛努艾拉的情绪都要波动几天。面孔的改变、生活习惯的不同、安抚方式的陌生，使她感到不安。

玛努艾拉和萨拉，非亲非故的“小姐妹”

四年之后家里又增添了人丁，是萨拉，今年六岁。看着她们两个在客厅里嬉戏，谁也不会想到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她们长得太像了，都是乌黑发亮的长发，一样的紫黑色方格超短裙，是玛努艾拉爸爸给做的，后来他跟玛努艾拉的妈妈和好了，在特兹格诺的工厂不停地缝制衣服。安娜以自己的风格影响着孩子们，这是那些跟中国父母长大的孩子们所不知的。小的那个穿着一双红色的靴子，像是日本动画片里的一个超级英雄。让人特别高兴的是，她们的脸上总有灿烂的笑容。只需要一点点“阳光”就能让她们开心。她们用两条小细腿互相追赶着，躺倒在地，摆个姿势照张相，见到客人特别兴奋。

“把你在学校里得的奖品拿出来看看。”

安娜对缠着她的孩子们说。半分钟后玛努艾拉手里拿着奖品回来，是 Winx 笔记本。听写、抄写诗句、复写字母，几乎都是带惊叹号的“最好”。安娜很自豪。孩子们的圣诞朗诵会是她去参

加，并把孩子们给父母做的礼物带回来。每晚8点半，在孩子们看了一会儿海蒂（Heidi），或从她7岁的外孙那里拿来的卡通片之后，是她送她们上床睡觉。早晨，给她们做牛奶加燕麦片，然后送她们上学。这是每一位母亲都要做的事情，不同的是，她不是她们的母亲。

“在课堂上睡觉？有可能。但并不是因为晚上干活累的，他们那么说是为了给中国人抹黑。其实是因为听不进去，不感兴趣。有些是因为太超前了，比如数学，可能在中国已经学过了。有些是因为太落后了，刚到意大利就去上课，连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

但这两个孩子不是这种情况。她们的意大利语完美无缺，充满好意。然而中文却是个问题。2006年玛努艾拉在爷爷奶奶家生活了一年，到温州附近的一个农村小学上学。

“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而且忧伤。虽然是个小孩子，但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很多，她费了很大的力气从零开始学习中文。现在却很愿意跟别人练习这种语言。”

她虽然在一旁蹦蹦跳跳，但没错过我们谈的每一句话，这时她插进来给我们说了句中文“小便”，并跑进厕所。这是一个喜欢待在人堆里的孩子。但在课堂上，当回答“你们想跟谁坐同桌，原因是什么”的时候，她写“没有人”。后来她告诉安娜，因为人们还是叫她“中国人”；有时有些同学不跟她握手，“因为中国人臭烘烘的”。

法律无情

安娜让我们参观她家是因为汉学家萨开蒂，她了解那不勒斯

中国人的所有事情。她们许多年前就认识了，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社会服务人员来到安娜的家，是萨开蒂出面保证，让这件事谨慎处理的。

“有位法官听说有些小孩住在我家，但不是我自己的孩子。‘非法收养。’因此通知了市政府，那时候叫做 Dedalus 的组织，找到孩子的亲生母亲，吓唬她说：‘如果孩子留在那儿，就取消你的监护权。’在工作人员要来带走玛努艾拉的那天清晨，孩子的母亲突然来到我家，手里拿着一个行李：‘我留在这儿。’”

安娜无法拒绝，这样，妈妈住了一个月，正好从工作的辛苦中出来休息一下。遗弃的说法不成立了，危险过去了。

“法官能怎么办？那是法律，曾经有过糟糕的保姆，儿子吸毒。还有一次，一个保姆特别喜欢那个小孩，她有亲戚是黑社会成员，威胁亲生母亲不能再要回孩子了。”

虽然离得很近，但萨拉从不喜欢去她父母的家：

“没有意大利的电视，他们所有人都只说中文。”

“所有人”指的是八个人，共同分摊房租，用一块帘子隔开各自的隐私空间。

“卫生间很脏。”她抱怨道。当她在那里的時候，会说的几句中文也都不会说了。安娜去那里看过，她说没有那么差。但小女孩就是不习惯那种混居和降低的卫生条件，没有这里的香味。萨拉的妈妈总是很准时地支付托儿费，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学校要集资组织校外活动和一些旅游参观：

“她觉得那是浪费。还有玩具。一年只要差不多两件衣服，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

这样，那些多余的东西经常是安娜垫进去。圣诞老人送的 Nintendo 电子游戏，让“小姐妹”们兴奋不已。那些玩具女主人公、笔记本、卡通女巫等等都是意大利小孩子喜欢的。

“我是魔法俏佳人（Magic Winx）。”玛努艾拉自豪地说。然后给我们讲 Enchantix 的使命是在旅途中保护 Bloom、Musa 和 Stella 免受危险和敌人的伤害。

她大声地唱着，奇怪在座的人怎么都不会唱：

“一个眼神，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是 Winx 的新生力量；你是我的朋友；一个手势，我们还要再来。”

调唱得很准，微微带一点那不勒斯口音。她在唱的时候，笔记本从手中掉下来，翻开的那一页上画满了心形符号。安娜辅导她们做作业。还从折扣店给她们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让她们在公园里骑着玩。她们最喜欢的节日，就是邀请几个同学在麦当劳庆祝自己的生日。安娜看到翻开的那页纸，说：

“她们的感情非常丰富，她们总是要很多亲吻。但跟她们的父母不这样，她们的父母从不给她们亲吻。”

“Lubetto”，嘎归洛家的复活节

罗伯特已经离开很久了，但似乎还住在丽达家。进门处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卡索利亚（Casoria）的花园里照的，另一张是在客厅里玩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在卧室里的照片。

“他跟我们的联系还很紧密，”丽达确认，“如果我们想看到他的样子，就连接网络，这样，就好像他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她指给我们看橱柜旁边的计算机，堆满了网络摄像头。去年夏天，他们带他去帕埃斯图姆（Paestum）海边住了一个月。然后在埃尔萨（val d'Elsa）住了两个星期，她大女儿在那儿有一个带游泳池的家。

“我们尽可能地在一起，但肯定不像我们住在那不勒斯的

时候。”

对这位坚强而乐观的妇女来说，搬到恩波利（Empoli）^①来照顾刚出生的小孙子，最让她难以割舍的，不是那不勒斯的太阳和匹萨饼，而是一个中国小男孩，她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养育了四年，后来天天跟他见面又过了四年。

“我以前在市场广场（Mercato）的衬衣店工作。”

她一边说一边煮着咖啡，在这个新家的厨房里，透过广场上的树木，能看见阿诺河（l'Arno）。

“后来我母亲得了暴病，我放弃工作去照顾她。我重新能够工作以后，参加了一个公共卫生助理的培训，作为应召护理。有时候连续工作十个晚上，我的小儿子受不了了。一次跟安娜（照看玛努艾拉和萨拉的）聊天，她照看中国小孩，非常幸福：‘有很多需求，你也来做吧。’”

于是她跟丈夫皮诺（Pino）商量，但他不是很兴奋，措辞委婉。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还住在家里，没有觉得需要另一个陪伴。但是每月60万里拉（约合310欧元）的托儿费，正好可以支付房租。他给学校看门的工资，现在也不过是1000欧元左右，因此在那时，那些钱还是挺重要的。

“我一直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甚至有些强硬。我知道我会付出感情，但我不会被感情折磨，”她回忆着那时的感受。

小孩儿在复活节的那天来到嘎归洛（Gargiulo）家。他的母亲，珍，一周前跟他们见过面，是温州人，曾经离异。大儿子留给了男方，被父亲带到布达佩斯特生活。她来到意大利，认识了红旗（音译），生下罗伯特。他们沿街兜售望远镜、会叫的塑料

^① 位于联结意大利北部与中部的中间地带，亚平宁山脉的西边，属于托斯卡纳行政区。

鸟、多用改锥等等，在诺拉娜城门（Nolana）还有一个摊位。20世纪90年代，他们在中国人的流动商贩中算是前卫的，因此生意很好。

但他们的生活不适合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丽达。

“她到我们在诺瓦拉附近的家里来看，然后就决定了，因为他们都有点儿胖乎乎的，我们把她记作布达（Budda）。”

来到家里的第一天，激动的心情超过预料。丽达向朋友要了一个婴儿车，原以为有了三个孩子之后再也用不着了：

“我又重新感受到当妈妈的喜悦，而且没有太多担心。”

小男孩三个月，据说二十几天大就做过两次幽门手术。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才弄明白，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跟我说的‘鲁贝托（Lubetto）’，不是读错了的小狼崽（Lupetto），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罗伯特（Roberto）。而且，即便手术已经折磨过这么小的小身体，让他闭一会儿眼睛却很难，他几乎不睡觉。哪像我的孩子成天酣睡，连圣杰纳柔的烟花爆竹也吵不醒他们。”

“在温州，他们把我当马可·波罗招待”

亲生父母一周来看他两次。

“一开始我烦他们总爱往这里串门。他们离开中国之后，就习惯于跟其他两个家庭同住在一起：隐私已经是被遗忘的奢侈品了。有一次，他们拿着一个炒锅，就是那种圆形锅底的长柄煎锅，来到我家，还带着他们的特色菜，来庆祝小孩的百日。”

皮诺，是一个非常随和的男人，也被这个意外的节目搞得有

些厌烦。丽达买了一本中文—意大利语字典，以便跟珍更好地进行交流。儿子的出生，让罗伯特的父母加快提升他们社会地位的步伐，借助从亲友那里募集的资金，把摊位变成了商店。以前，他们去罗马的维多利奥广场的批发商那里进货，后来，他们直接从中国进货，以增加利润。泥瓦工、钣金工、电工都知道他们的东西好，价格便宜。

对罗伯特的联合管理进展得非常顺利。

“我从来不想给亲生母亲造成阴影，因为我记得我婆婆曾经让我感到竞争，那时候我在衬衣店工作，我儿子安东尼奥（Antonio）的头三年是婆婆照看的。”

1997年小男孩满一周岁。皮诺转到卡索利亚的一所学校看门，他们在学校的花园里有了一套住房。这样，60万里拉省下来了，小孩还可以在绿草地上奔跑。一切都好，除了星期天，他们乘公交车把他送到父母那里去：

“他抓着楼梯扶手不放，用脚勾着不肯走。现在他叫我妈妈，然后马上给他改正。管我的儿子们叫‘哥哥’。”

1998年珍和红旗在中国买了第一套房子。第二年为了感谢丽达，出资邀请她到中国去看看他们的根。

“他们带我去了北京和义乌，看到好多小商店，他们就是从那里买了货之后再转卖的。”

当然还有温州。

“她的家人招待我，就好像是马可·波罗。‘Zwa, Zwa,’一直这么说，意思是‘吃吧，吃吧’。因为珍跟他们说，在那不勒斯吃很多海鲜，他们不断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大虾，可是，得用筷子把皮去掉。这一次，是他们让我感觉到像是一家人。”

她给我们看那次旅行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赤脚坐在一架钢琴旁，她是珍的一个弟媳。如果不是因为杏仁眼，

可以认为那是一个米兰市民的家。镶木地板，漆色鲜艳的钢琴，摊开的总谱（“他们喜欢古典音乐”）。她哥哥，做加油站配件的出口生意，现在是亿万富翁，很有远见地提醒妹妹注意经济发展的趋势：

“干吗去意大利呀？如果你真想赚钱，就留在这里。”

样样都干的保姆，受命去中国

这次旅行也是一个测试。丽达跟小孩相处得特别好，但珍想检验一下她们之间如果天天相处会怎样。为她头脑中的过渡做准备：自己带罗伯特，他现在可以上幼儿园了，但别丢了丽达，雇她到店里，周末还是把罗伯特交给她带。

“我既要当店员，还要管财务，因为我比他们会写单据。上班时间是 7:30 到 19:30，工资是 700 欧元。激励是可以继续见到小孩。”

商店也进一些波兰的钻枪、铆钉枪、切割机来冒充俄国货，因为俄国产品的信誉更好一些。客人有巴基斯坦人、摩洛哥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各种移民，靠干小工勉强维持生活。珍唯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因为她认为他们是来窃取情报的，抄袭她的样本，然后以更低的价格销售，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丽达忙碌于会计、柜台和阁楼之间，小男孩在阁楼上认真地做着作业。

一年之后，当他们决定带罗伯特去见祖国的时候，有人帮他们照看商店了。给她当帮手的是他们一个年轻的侄子，当时还是非法移民。在他们回来前的十几天，罗伯特打电话来说，父母两个人因为车祸都躺在医院里。汽车被撞得稀烂。珍受到颅骨外伤，

眼睛也有创伤。红旗髌部粉碎性骨折。丽达说：

“这消息让我震惊，就好像出车祸的是我的兄弟，当听到珍在电话的另一头，用微弱的声音说：‘能来帮我吗？’我的情绪更加激动。”

她没问题，准备去中国（“当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强大”），皮诺把她拉回到现实：

“你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你怎么去？”

办签证还需要邀请函。当这些文件还在官僚程序的崎岖小路上蹒跚的时候，他们早就康复了。所以没必要去了，他们可以自己回来。但是两个瘸腿的父母，无法追上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因此把他放在爷爷奶奶家，这样总算可以开始学中文了。

当他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不会一句中文。宿舍很大很冷，根本无法和那不勒斯的席梦思床相比。公共厕所散发出可怕的臭味。他的军营生活过早地提前开始了。第一次丽达给他打电话，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他没接她的电话：

“也许在那个环境里，他不好意思让别人听见他说意大利语，他费好大力气，去跟大家打成一片。”

几次努力都毫无结果。丽达只能等到夏天，等他回来之后再去看他。

“我和珍一起去接他。剃了光头，长高了许多，当我问他过得好吗，他假装听不懂，用中文问他母亲：‘她说什么？’显得特别生硬。”

无论攻击他还是讨好他，都无济于事。就连他最喜欢吃的肉酱，也无法贿赂他。直到一天夜里刮起了很大的风，那风大得能把他们在温州的摩天大楼吹摇晃，也把他的固执吹走了。他吓坏了，在黑暗中，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到丽达的床上。这就是回来的危机。

他的意大利化？对妈妈不敬

2002年夏天一切回归正常，继续在楼下工作，楼上学习。丽达说：

“他在学校里的功课一直都很好，我继续照顾他。”

商店里的活慢慢变少。这个地区，中国人的五金店像蘑菇一样越来越多。珍去问过佛之后（“说是几年后会变好”），决定换个地方，搬到米兰路附近的火车站地区。还是没见好转，但根据大肚佛的说法，不用担心。丽达的儿子，就是小时候曾经抱怨过她不在家的那个，在恩波利找到当看守的工作，他的妻子有孕在身。

“妈妈，我们需要你来帮着看孩子。”

这样，她对罗伯特的使命结束了。2005年她丈夫获得工作调动，他们踏上了通往托斯卡纳的高速公路。但她的儿媳不习惯那里，分娩反应强烈，于是决定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回那不勒斯。可是他们却回不去了。

“如果不是为了小孩，我才不会来这里。”

她从家里的窗户凝望着阿诺河。想念罗伯特吗？这还用说。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了四下的纸，递给我们。

“你愿意跟我，只愿意跟我在一起，相拥而睡，平静地呼吸。多好啊，感到你在长大，你的拥抱使我的烦恼烟消云散。放开你的声音让空中充满回响，我是一个被爱的女人，为你，我付出很多心血，即便血缘也无法相比。但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把我忘却。过去的回忆是我的甜蜜，想到你现在，在别处幸福地生活，我感到迷失和孤独。原谅我，我的孩子，如

果这颗做母亲的心对你太爱。妈妈丽达”

她还是那样动感情，但即便像皮诺那样一个玩世不恭的那不勒斯人，也没敢批评她。

“在学校里功课一直很好。他不学中文了，现在在学英语。变得也太意大利化了，不好好跟他妈妈说话，我批评他的时候，他也不待见我，跟他的同学攀比，要名牌的东西，12岁是开始讨人厌的年龄。没看出来他能否比别人优秀。”

这是一个融合的例子，有好有坏。



第 15 章

最后一站，马泰拉

——在合法和违法之间

中国人做的沙发：马泰拉的另一纪录

从米兰往南走，经过普拉托、罗马、那不勒斯这些主要站点，马泰拉是最后一站，他们以移民的眼光在这里发现工作的机会。它是最后被发现的一片草场，但从一开始就是脱毛的。如果说伦巴第的首府集中了商人，托斯卡纳地区是手工业者，首都是进口商，那么这里就是最底层的工人。

马泰拉没有火车站，这里是意大利唯一不通火车的地方。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从 1906 年就开始讨论了，一定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搁置下来。非常遗憾，不仅仅因为它是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① 的第二大城市，还因为它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于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确认的“史前穴居遗址”石头城，史前穴居人在岩石上凿出洞穴为家，原始而美丽。

最近的火车站在费兰迪纳（Ferrandina），离这里 30 公里。来接我们的是阿尔巴内赛（Andrea Albanese），60 岁，光头，健壮，

^① 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行政区。

看样子像是一个生硬的人，但后来发现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他帮助过许多中国人，他们对他说“谢谢”。沙发，是马泰拉继石头城之后另一个出名的特产，中国人受到工作机会的磁场吸引，最近几年来了许多。“我在工会干了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样工作的人，对许多当地人来说，在家中待业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对他们来说就是被判死刑。”

他们不知道休息。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手里拿着工具，在工作台上忙碌。要不就是趴在缝纫机上干活。除此之外，倒在行军床上睡觉以恢复体力。小牛皮的沙发，昂贵，时尚，散发出富贵的气息，他们用手轻轻地抚摸它，寻找不完美之处，但从不坐在上面。以前，当纳突资（Natuzzi）还经常登上国际主流杂志的封面时，这个“客厅家具世界的引领者”想在巴里、塔兰托和马泰拉的工厂里，只用当地工人。

但后来财务状况越来越不好，只能申请破产保护。巨幅标语“纳突资行动了，现在该轮到你了”曾经贴满了普利亚（Puglia）^①和巴西利卡塔的大街小巷，号召企业进行招聘，仅仅五年之后，它变成了褪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回忆。应该重新写成“纳突资走了，现在轮到你下岗了”。从100人到2500人的下岗大军。危机没有放过其他几个大型沙发企业，包括尼科类蒂（Nicoletti）和卡里亚（Calia）。阿尔巴内赛回忆说：

“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人回家待业，如果有生意，也都外包出去。转给楼下的中国人去做，他们计件取酬，根本不敢讨价还价，否则就没活儿干。”

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活了。当你认为能省的都省了，生产成本再也无法节约的时候，总有浙江人向你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① 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南部。

声音迅速传开，兄弟、表亲、朋友的朋友接踵而至。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统计，1998年在马泰拉的中国人很少：2700名外国人中只有8个中国人。2000年危机的磁铁还没开始启动，当时有55人。2005年一跃成为434人，占移民总数超过10%。现在将近700人，在这个6万人口的城市里，成为最大的外国人团体，接下来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摩洛哥人和罗马尼亚人。

“开始的时候他们给意大利老板打工，他们抱怨老板的严重剥削，甚至想要去起诉。”阿尔巴内赛接着说。

他从意大利工会联盟（Cisl）的组织成员，成为帮助移民的“超越国界”组织在马泰拉分会的工作人员。于是，中国人自己当老板，订货人也觉得这样更好。因为如果老板是中国人，即便是“奴隶主”，也不会有员工去告老板。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不可思议，反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这里，我发誓，只有八小时一个班！”

在介柳照（音译）的“意大利沙龙”，离市中心几公里的地方，有24个工人。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只看到四五个人。这几天活儿不多，因为买方在下订单之前，先要看看米兰的家具展有什么新的流行趋势。老板的老婆，也是发言人，取名安娜，用很勉强的意大利语给我们解释说：

“客户给我们订单和所需用的皮子，我们按照型号裁剪，缝制，然后交回去填料。”

机器边只有一个女孩在做一些收尾工作。“动作有些慢。”这个娇小的女人观察之后说。她的短头发梳得很整齐，笑容固定在脸上，口红描得完美无缺。还有两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坐在一

张大工作台上，一点儿不受干扰地，连头都没抬一下，在下象棋。棋盘是用笔在填充沙发的漆布上画出来的。安娜看着他们笑着说：

“你看，我们没有总在工作！”

不用我们问，她就先回答了：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8:30 至 13:00，午休之后从 14:00 至 17:30。工资纯收入是 800 欧元，没活儿干的时候，就像今天，也要付钱的。”

她领我们看食堂，一个房间，有两个用木条钉起来的桌子，十几只白色的塑料椅子。有一个特大的中国式的压力锅，用来煮很多米饭，一个红色的塑料漏筐里面装着筷子。这里准备早中晚三餐，下午 4 点钟的时候还有下午茶。菜单内容总是同样的：白米饭，蔬菜，一点肉。只是各餐的量有所不同。老板一家也是吃这些，三个孩子在上学，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改变一点节食的菜单，去北京餐馆吃晚饭，那是城里唯一的中餐馆，老板是介柳照的兄弟。

楼上的宿舍

不到 8 小时一个班，合同制的工资，干净的环境和厕所，员工在上班的地方玩游戏：是否我们应该改变对中国“奴隶主”的印象了呢？只要移动几公里，景象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帕依普（Paip）工业加工区，唯一一个像是中国城的地方，虽然是静悄悄的，没有红灯笼，但走进去之后会感觉到这里是中国人的地盘。一座小楼房，在一个卡车车行和一个物流公司之间，半地下室用来生产，给尼科类蒂（Nicoletti）加工，楼上用来睡觉，像是地震灾民的住所。在一个房间里放了五张行军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遇到一个憔悴但小巧玲珑的小妇人，她认识我们的陪同。她

正坐在一个用塑料布隔开的小床上，看录制下来的 CCTV4 的电视节目。是她给大家做饭。到处都是塑料口袋，装满了可长期保存的储备物。一个巨大的工业冰箱，就像在科恩（Cohen）兄弟制作的电影里储存尸体用的冰箱，放在过道房间的中央。厨房的一个池子里泡着一大块肉，满是红色的血水。

转悠完，我们让人去找老板，我们是来跟他见面的。楼下的生产比前面那个工厂要忙碌许多，但和通常的“蚂蚁窝”比起来，还是轻松一些。一个挂着“办公室”牌子的狭小屋子，里面只有老板的老婆，薛玉（音译）。她有孕在身，目光柔和。她正在准备送货单，这些单据和使用说明书，根据目的市场的不同而不同，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在沙发出厂时随货物一起运走。在那个给“蚂蚁”用的小书桌前，用胶带贴着她第一个孩子的照片，是一个漂亮的七岁女孩。在一张照片中，她一跃而起自豪地显示手里的芭比娃娃，另一张照片上穿着校服，背景经过奇怪的彩色处理：

“她在中国，住在爷爷奶奶家，从两岁起就把她放在那儿了。这样的工作我没法带她。每天我都跟她通电话，当她哭着说‘我要回家’的时候，我的心都紧了。但没有办法。”

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有这样的无奈，虽然眼睛还是那么明亮。也许对她来说还好一些，毕竟她是老板的老婆。

奢侈的橄榄油

比如说英（音译），正在用各种方式向这个命运抗争。她的家在靠近马路边的一座楼房底层，一个 50 平方米的房子。当我们敲她的房门兼窗户时，她正在休息，刚给九个月的女儿赤露（音译）吃完饭。

“对不起，家里很乱。”她开门对我们说。

36岁的她显得年轻十岁，直直的长发，身上的毛衣因多次清洗而褪成淡紫色，都起球了。她看起来身体还不错，虽然没有遵从中国传统的坐月子规则，据说刚生完孩子的母亲要有一个月的恢复时间，在这个月里要喝姜汤，头上缠一块头巾防止着凉，还有严格的哺乳规定。

阿尔巴内赛是在几年前他单位组织的意大利语免费课程上认识她的。当时他发现她的手指严重感染，并送她去急诊，她的手指在做沙发时被针扎破，洗碗的时候没戴手套因而感染，她不想浪费时间去治疗，以为可以挺过去，结果医生说，需要一个较长的消毒过程和一个星期的休息，以免那个手指头得败血症。她想拿点东西招待我们，迅速清点了一下家里有什么，尴尬地放弃了。她也有一个共同的故事：

“2002年来的意大利，开始是在恩波利，那里有我的亲戚，后来朋友告诉我说，这里有做沙发的工作，我就来这里了。”

当地人下岗的又一个受益者。

“我认识了一个工友，2006年我们回福建结婚，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家人，而且花费低很多。”

不久她就怀孕了，因此辞掉了工作。她的工资情况跟安娜说的不一样。

“我丈夫跟他妹妹合伙开公司才几个星期。在此之前，他每个月拿500~600欧元，算上没活儿干的时间，一年5000~6000欧元。自从生了女儿之后，我们在五个月里就花了5000欧元。我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对大人来说，他们可以想尽办法节省。从不开暖气，在床上也穿着大衣。如果钱还不够，他们可以更节省，以等待转机。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这么做。

“这个婴儿推车花了很多钱，奶粉也很贵。”说着她取了一些奶粉加进奶瓶。

“我们只用菜籽油，但儿科医生说，给她要用橄榄油，幸运的是，我以前的老板匹娜（Pina）送给我一小罐，我算着能用六个月。我生孩子那天，匹娜在医院里守护了一夜，她是一个特别的女人。”

房租 230 欧元确实很低了，但对于他们的收入，却是将近一半的支出。英想去教堂请求帮助，哪怕是一点捐款，帮助度过最困难的头几个月，但她丈夫不同意：

“靠我们自己能行。”

显然她得尽早出去工作。那赤露呢？她尝了尝奶的温度，不很烫之后喂给孩子。她比一般的中国妈妈更加勇敢。

“我已经给孩子申请了幼儿园，从 9 月份开始。这样我至少可以从 7:30 工作到 15:30。如果能说服我表妹到这里来，其他时间可以由她来照看，我把我的一部分工资转给她。”

如果计划实现不了，她就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如果那样，这里的生活已足够悲伤，会变得更加酸楚。至少现在，把她抱在怀里摇着，感觉幸福。

“我在家乡的时候，当裁缝。一个月能挣差不多 300 欧元，房租只有 30 欧元。”

声调就像是在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但在这里，我不能干黑活，因为我要证明有收入，才能延长居留。”

为了帮助她增加收入，阿尔巴内赛在四处寻找二手的缝纫机。

几个星期前，地方新闻报道了一起帕依普地区中国弃婴的事情，让我们的陪同感慨万千：

“一个七天大的女婴，包裹得严严实实，放在一个装鱼的塑料盒里，在开门上班之前不久，摆放在一个中国人的工厂门前。医生根

据血糖推断，一个小时之前喂过奶。后来查出，她母亲是一个27岁的单身女人，父亲在等待家庭团聚。母亲一个人没有能力养活孩子。现在被寄养在波腾托（Potenza）的一户人家。人有的时候会很绝望，但从来不是坏心肠。怎么能不希望他们过得好呢？”

“印度人”、工会和老板

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老板。中国人也一样。游明瑞（音译），人们都叫他“印度人”，因为他有印尼血统。在马泰拉整个行业约300名中国工人中，他就雇用了50多人。在福建，他当了几年船长。二十几岁时离开石油行业，去俄罗斯做服装批发。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不像是能做大生意的气氛，他就离开莫斯科去了罗马尼亚，然后又去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付了4000美元，乘偷渡船进入意大利，成为非法移民。他最初是在佛罗伦萨，后来听人说马泰拉是一个可以淘金的地方，这个勇于冒险的人没有犹豫就来了这里。他在前面的生意里攒了些钱，经过许多动荡的国家，他学会了欣赏平静的日子。

“我在这里待了几乎20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待在这里。”

他站在他的一个厂房前面这样说。他至少有1.85米的个头，一只眼睛比另一只更靠里，因此给人一种恶狠狠地斜视的印象。头发短而黑。他戴首饰的品位像是纽约哈莱姆区（Harlem）的花花公子，一个很粗的镶着绿宝石的戒指，三倍粗的手链，星形耳环盖住整个耳垂。极黄的金子，14K，耀眼的闪亮弥补纯度的不足，在他烟草肤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突出。

“我曾经是船长，”又摆出自己的门第，“我抛弃了一切就为了挣点钱。”

不是这样的，但跟许多企业主一样喜欢哭穷。另一个喜好，跟他的意大利同行们一样，就是低下头向工会发起进攻。对他来说，工会的思想路线不正确：

“他们帮助那些不想干活的人。我忍受不了懒汉，我对我的人说：‘如果我不给你们发工资，你们到哪里去找吃的，工会人员的家里吗？’”

他说在中国不是这样，在那里干活，别说话。他的一个意大利朋友去上海，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前面正在盖的楼一夜之间长了一层。他的两个工人，一个胳膊骨折，另一个拄着拐杖，头发凌乱。城里盛传着各种“印度人”对劳动关系的解说。有人多上一次厕所，就被威胁解雇，有人甚至无缘无故就被告知不用来上班了。他摇着头说：

“在这里我们都是朋友。工作的时候我是头儿，下班之后我们是弟兄。他们遇到问题都来找我，我们还经常一起玩麻将。”

显然，是工会在制造不和。他说“工会毁了意大利”，这口气跟特雷维索的小老板一样，跟反全球化的热衷分子同出一辙，跟北方联盟一个腔调。他还说，如果有选举权，他会毫不犹豫地投给贝卢斯科尼：

“他是一个愿意低下头、努力工作、不断进取的人。”

如果不是几天前刚刚进行了选举，左派管理了15年的马泰拉，跟全国各地一样，中右派赢得胜利，也许他说话会谨慎一些。

似乎“印度人”并不需要政治。他开始把意大利制造出口到中国。

“橄榄油和葡萄酒，上乘的 Primitivo di Manduria，就是有点儿太贵，我在深圳附近买了一个分销中心。”他自豪地说。

他知道公共关系有用，但现在还没起作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他走向他的宝马，7万欧元的车。他的工人——兄弟——五年

的工资。

“你们认识打印居留的人吗？”

“印度人”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但马泰拉的中国老板，不是只能在工厂里遇见。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们聊，但不愿说出他的姓名。他是个中年人，有一个小企业，正在全速前进。他雇用家乡的人，受到员工们尊敬，回到浙江的时候，老朋友们给他不一样的待遇。他喜欢让人看到他的重要性，邀请记者吃晚饭。

“但是不知今晚能否结束其他会面……”

没必要跟推土机先生磨蹭：

“6点钟再确认吧。”

6点钟准时打来电话，焦急地问：

“我们在哪儿见面？”

定好8点在中间距离的一个地方见，然后带我们去餐馆。他带了儿子一起来，因为儿子的意大利语讲得好。正好两代人可以作对比。成功华侨开着显示身份的宝马车来了，儿子开车，他不停地抽烟。刚踏上餐馆门前的台阶，他烦躁地把手里的烟蒂扔掉。餐馆未必是城里最好的，但肯定是最贵的。

8点钟，餐厅里几乎是空的。大堂经理已被提前告知，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舒适的桌子。服务员礼节性地问我们要点什么。儿子做主说：

“你们看着办吧，拿些好吃的，你们最拿手的。”

有章鱼、鱿鱼、墨鱼仔。中年人穿一件无可挑剔的灰色西装，卷起的衬衣袖口从西装里露出来，一个临时的折边，肯定不是裁缝做的。北京、罗马、长城、斗兽场，言论自由，漫无目的地信

口开河。而且让我们亲自体验了那个被认为是种族诋毁的、某些中国人的吵闹。他说话声音很大，近乎喊叫，所有顾客都注意到了。餐馆老板请他放低音量，但没奏效。

突然他问：“你们认识打印居留的人吗？”

我们没明白，以为听错了。

“你是说批准居留的人吗？应该是警察局里的某个人吧？但是，哪个城市呢？”

他恼火地看着我们。儿子插进来作可靠的解释：

“不是的。批准居留的是内务部，然后有一个制作的地方，给全意大利打印居留。我父亲在问你们，是否认识某人在那里工作。”

字面意思明白了，但用意还是不清楚。企业家在吃海鲜面，用手撕开龙虾的钳爪。他只有眼睛是自由的，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是傻瓜还是什么？他用餐巾擦擦嘴，喝了半杯酒，觉得要解释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很烦：

“居留被批准之后，制作的人有权决定先印哪个城市的。如果我们能跟里面工作的人说上话，我们可以说服他们先印我们的，让我们节约些时间。”

他的意思是想贿赂工作人员，提前拿到他们和他们朋友的居留。

“想都别想，这是违法的。”

我们的异议让他笑起来：

“没有违法。我们请他们吃饭，交交朋友。”

“200 欧元？那不是贿赂，是伤人面子”

聊天进展得很流畅。我们问他是否听说了那不勒斯中国市场



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贿赂一个税务人员而被捕的事。

“当然听说了。但是200欧元不是贿赂，伤人面子。他应该给两万，就不会进监狱了。活该他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做实事的人，最害怕官僚程序制造的种种障碍。

也许可以测试一下海外中国人莫谈政治的格言。父亲没接话，摇着手像是在赶蚊子。儿子说：

“如果我去投票，我肯定投给贝卢斯科尼。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是一个会干活会挣钱的人。他会让我们这样的企业主日子好过一些。可惜我没去投票，因为我没时间。”

他的选择跟其他企业主的一样。但弃权的理由却不充分：

“你们没有意大利国籍，所以不能投票选举。”

他踌躇了一下但不后退：

“他们跟我说可以的，我可以选举。”

他甚至不知道，如果获得意大利国籍，就没了中国国籍，因为北京不承认双重国籍。年轻的代理长官从云端掉下来，他的18个人生年华，有15个是在我们国家度过的，他却没听说过。从来没有，即便高中、初中和小学都是在这里读的。他只是说：

“如果花钱，就可以有两本护照，钱越多，国籍越多。”

我们想说：“哎，醒一醒，这么些年你生活在哪个国家？你看了些什么电视？你读了些什么报纸？”但是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幼稚的是他，还是我们。

原青田县长的兴衰

社会主义者花了很长时间，消除差别，让人们穿一样的衣服，但是邓小平之后的30年，出人头地是海外华人最主要的追求。林

竹青（音译）也是一样。他个子矮小，不到1.6米，头发极黑且浓密，不顾51岁的年龄，一点不松懈地工作着。

他在他厂房末端的一个阴暗小室里接待我们。来自他家乡农村的工人，把皮子粘到泡沫橡胶上，再用尖针钉起来。他想，这么多的企业，对记者来说很难感兴趣。因此，他马上拿出他的第二个身份，《欧洲华人报》的政治主编，我们在萨勒匹路遇到过的报刊。

“从早晨很早到晚上6点，我要控制工人们的生产质量。晚上6点以后，我变成记者，阅读和修改各个编辑部发来的文章。”

主编实际上是他在米兰的同事。他是临时编辑，主要是检查是否有得罪北京的内容。

“中国领事馆经常给我打电话来抱怨，”他自豪地笑着说，“但我们是为了真相，我们写事实。”

这种把握分寸的外交辞令，是他年轻时当了五年青田县长期间练就的（“我有司机和保镖”）。如果今天炫耀自己，在二十几名中共中央常委中有七个朋友，说明权力已经给他刻下永久的烙印。

听他讲起来，简直出身名门，在中国人们还都记着他。最近，他陪一批意大利企业家去中国，受到的接待“就像是贝卢斯科尼，前面一辆车开道，后面跟着另一辆车。我认识所有的人，如果你们去那里，告诉我，我能把所有问题摆平”。

林竹青是一个务实的人。他于1984年来到威尼斯，从县长变成刷盘子的，这种社会地位的急转直下似乎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影响。学了一点意大利语之后，买了一张单程车票去了米兰。然后是佛罗伦萨和普拉托，裁剪皮革。最后是马泰拉。他一个人经历了中国人移民意大利的整个发展过程。

对每个地方，他都知道很多特别之处。比如说普拉托的吉佩尔的营业额，他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就像意大利人对国家队

教练的了解一样。很多我们遇见过的人，几乎都要重新整理他们的履历，大部分是要往坏处写。他获得社会地位的钥匙跟他的国人一样：吃苦耐劳。

“有时候，有些集装箱要在夜里发货，你们说，谁会在夜里3点半起来开大门呢？意大利老板会这么做吗？这里当地的工人，你就是给他100欧元的外快，也没法让他从床上下来。”

两个工作还不能让他筋疲力尽，他又找了第三份工作，就是凤凰卫视欧洲台（Phoenix Chinese News & Entertainment）的意大利联络人，香港的一种CNN，在伦敦播放，创建者刘长乐（音译）以前是解放军的上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政府创作宣传标语。

“意大利的可爱之处是，”他不得不承认，以评论员的表述方式说，“骂总统或骂贝卢斯科尼，不会进监狱。”

然而最终他还是要回到中国的。60岁转眼就到。他心里明白，因此，虽然他可以，却从未申请意大利国籍。因为北京还很嫉妒它的子女。

经历了这些年，以后打算干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在脑海里翻找，最后说“散散步，看看朋友”。过了一会儿又说：

“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当过：政客、知识分子、企业家。”

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划分，投机型的和生产型的，他集于一身。几句话概括了中国人获得成功的信条：拼命，能吃苦，动脑筋。这么些年来，白天黑夜，心里念叨的就是这首单调的曲子。也许不久，他的日子能过得轻松一些，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花钱，享受，生活。

第 16 章

他们，我们

——最后的面孔和启示

终点

终于，我们快把它完成了。从皮埃蒙特出发，我们到达了巴西利卡塔，追随中国移民的足迹，跨越整个半岛。确实累坏了，尤其是刚开始，连确认一个见面会谈都不容易。后来我们找到了好办法。他们朋友带朋友，搞得我们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给我们打开家门，谈他们的隐私，讲遇到的困难、问题和梦想。最封闭的移民团体，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孔。让我们了解了这本书里写的那些故事。但是写一本书就像编辑一个电影：我们转了那么多地方，走了那么多路程，不是所有的都写进了书里。原始资料都进行了删减，许多珍贵的场景因为太沉重而没有采用，有些人物本可以成为主人公却不得不去掉。因此在这里，在旅行的终点，杂乱无章地说说那些面孔和事情。

中国人喜欢钱，这一点我们在巴纽洛 - 皮埃蒙特的时候就明白了，一直到马泰拉，我们也没有改变看法。一件小事可以证明：米兰最受欢迎的《欧洲华人报》经常刊登文章，介绍如何利用自

己的商业才能赢得经济利益，刊登具有教育意义的国内工商业巨头的传记。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透露其成功经验时说：“比别人快十分之一秒。”刊物的栏目标题，以从未见过的直截了当，非常浙江地命名为“富人”。

年轻的汉学家帕囊奏内，也总是跟我们谈钱，她在罗马的美国海外学校执教，她说中国富裕家庭的子女到这所学校来上学的越来越多。

“这种状况出现在最近两三年，现在每天早上两辆校车分别从维多利亚广场，或靠近戈多尼亚（Guidonia）的蓝色公园（Azzurro）出发，满载而归。”

他们都是中国企业主的子女，他们认为意大利学校不够严肃，教得不好。

“父母一般不来学校，可能是没有时间。只有交学费的时候才来，非常守时，而且一律是现金。”

学费不是几张票子，一年从1万欧元到1.4万欧元。

“记得有一位母亲到秘书处交钱，从包里拿出一大捆，用橡皮筋绑着的钞票，收银员点过钞票之后，认为少了一些，这位母亲强硬地说：‘不可能，你再数。’最后发现她是对的。”

在意大利中国学者联谊会（Ascri），没有找到钱的证据：他们是工程师、医生、职业经理人、大学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他们来意大利留学，然后留在我们国家工作，成家立业。他们的中国人气质，主要是严肃认真和一种细腻的感恩，他们记得刚到意大利的第一天、第一位教他们的教授、指导毕业论文的导师，等等。

我们根据水稻专家王学仁的介绍，见到一些中国学者，我们发现，他们是不同的中国人：很少有人来自浙江。而且，他们对这些来自东南部地区的表兄弟颇有微词。他们很清楚意大利中国

城以及其商业能力的秘密：

“这些人来自农村，计划生育在农村，不像在上海或北京那样严格。因此他们有很多孩子，很多兄弟姐妹，他们互相帮助，力量更大。”

意大利中国学者联谊会（Ascri）的学者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学习，职业，融合。而钱，只有在给安徽洪水灾民募捐的时候，才会谈到。

经济学家文燕陶窦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她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显示出我们的反应跟不上变化的速度：

“下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出于礼貌，用日语跟我打招呼，因为我穿着讲究，会讲意大利语。对他们来说，我就自然应该是日本人。这让我很反感。”

不能忍受降低自己的身份，被误认为是亚洲宿敌更加气恼。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般不赌博。而其他人都赌博。我们不仅去了威尼斯赌场，还去了普拉托的拉-普乐斯蒂杰（La Prestige），1200 平方米的面积，更像一个车行。在这个位于郊区的赌场，有很多意大利客人，但谁也不像移居到这里的中国人那样痴迷。

“不可思议。”卡媚洛（Carmelo）说。

他 60 岁，是西西里血统的阿根廷人，他跟儿子迭戈（Diego）于 2007 年开了这家赌场。

“他们专心极了，就像是钢琴家在开音乐会，而不是在玩游戏机。”

同样的赞誉是，当钱币倾泻而出的时候，他们的欢呼比普拉托人热烈得多。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来对付机器。仔细研究机器的行为软件之后，他们发现，如果不马上取走赢的钱继续赌，一定时间后，

比如两三个小时，机器就会“投降”，付出两三百欧元。”

他们一般玩50块钱左右。重要的是守住位置。因此有时，会看到他们筋疲力尽，沮丧地拿着装满钱币的黄色塑料杯，最后的欢跃让他们重新振奋精神。赌场从中午开到早晨6点，他们总在那里。

“他们只停下来吃点东西。奇怪归奇怪，但我没法儿不说他们的好。他们从来不惹麻烦，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奋，这个钟点，我早该回家睡觉了……”

意大利的中国小姐

李雅（音译），2006年意大利的中国小姐，我们在那不勒斯见到她，她在圣彼得音乐学院学习歌剧，来自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东部，她毕业以后要去上海：

“因为在那里，音乐家的生活更稳定。我可以在大学里教演唱。”

李雅的男友是一个那不勒斯的音乐家。那他们的关系会怎样？

“我们谈过。他虽然毕业了，却失业两年，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我劝他到我们那里去，可是这些年，他一点中文都没学，英语也不会。我们只能分手，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待在这里，就会从一个失业者变成两个。”

柯雅（Irene Coia）和刘岩飞（音译）结婚两年了。她是普拉托人，他是郑州人。她是学生物的学生，他是银行职员：

“在普拉托，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柯雅说，“但是到了中国，我真的感觉很累：我只能对小孩子们直呼其名，公婆和妯娌都要尊称为爸爸、妈妈、姐妹。全都特别特别正式。”

岩飞28岁，在意大利七年，他感觉还是很难跟上这个星球的、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

“我们在看希区柯克（Hitchcock）的所有电影。我从来没见过。”

然而让他难以保持镇静的，还是当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人永远不死”。

第一代移民，专注于工作和攒钱，似乎体力和精神都没有余量去幻想文化交流。但在巴纽洛-皮埃蒙特，方瑞和方雪爸爸的两个回答，让我们知道我们想错了。原以为他的脑袋里只有石头和钞票。我们问他：你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

“是春天，春天突然到来，就像下一场雪。”

你最喜欢意大利的是什么？

“是教育。”

在特雷维索地区的卡萨阔巴，一个纺织厂老板说，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边界，不存在思想障碍：开始是罗马，然后西班牙，后来威内托，明天谁知道在哪里……他的意大利语讲得很好，像个学者而不是生意人。唯一的一个走调，证明他喜欢改变语言和国家：他有很明显的德国口音，如果闭着眼睛听，像是教皇拉辛格（Ratzinger）的侄子在说话。原因是“来意大利之前，在德国待了几个月”。那里生意不多，但至少留下了语音的纪念品……

我们遇到的中国人，似乎都是坚忍顽强的，因此，当感觉到他们的痛苦，看到他们的懦弱时，会印象深刻。安娜，一个20岁的美丽姑娘，我们在马泰拉她的服装商店里遇到她。她本该有很多梦想，却假装成熟地无动于衷。

“梦想？我不知道什么是梦想。我们中国人不会停下来的。哪儿更好，我们就去哪儿。”

更好是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的。哪怕生意只好一点点，也值得打起行装。好像非常灵活机动，但从安娜的声调里听得出来，这不仅仅是力量的表现。

“我不会留恋这个地方。我在这里生活了14年，但终究是个过客。”

只是似乎她也不很清楚，哪里是目的地。





当代中国研究译丛

I CINESI NON MUOIONO MAI

LAVORANO, GUADAGNANO, CAMBIANO L'ITALIA
E PER QUESTO CI FANNO PAURA

*Raffaello Oriani
Riccardo Stigliani*



为什么是“不死的中国人”？这是意大利人的说法。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因为“据说”中国人……还是自己去读这本书吧。

这本书原本是写给意大利人的，让他们了解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他们在意大利做生意，开工厂，改变着意大利。但意大利对中国人的了解几乎一无所知，无知滋生出偏见和谣言，进而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共处关系。

作者是意大利最重要报纸的两名记者，他们从北到南贯穿整个亚平宁半岛，追踪中国移民的足迹，做了大量实地考察。这本书收集了他们的采访和调查记录，包含大量信息，涉及中国移民在意大利从事的各行各业以及生活、教育、投资等方方面面，并且对意大利人自己的问题提出反思。

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中国人了解一下欧洲人的视角，至少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不带种族偏见的视角，了解一下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说法以及中国人在意大利的真实生活。

ISBN 978-7-5047-2635-8



9 787509 726358 >

<http://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2635-8

定价：39.00元